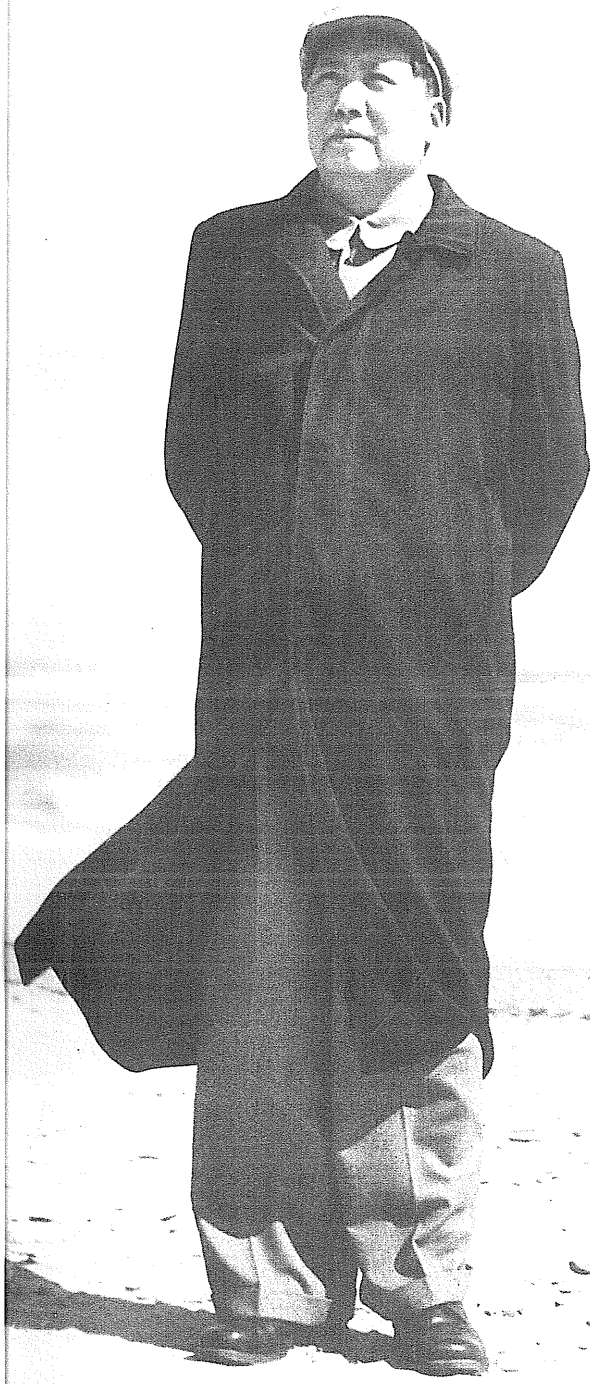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湖南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形* ……1
（1927年6月22日）
中央农运讲习所给各省党部函*……12
（1927年6月）
考送学生章程*……13
（1927年6月）
中央农运讲习所招生计划 ……18
（1927年6月）
全国农协对于农运之新规划 ……21
（1927年6月）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25
（1927年7月4日）
目前农民运动的总策略*……27
（1927年7月20日）
中央委员宣言 ……33
（1927年8月1日）
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 ……40
（1927年8月7日）
湘南运动大纲 ……45
（1927年8月）

湖南民众组织更需要武装 ……47
（1927年8月9日）
关于土地问题的意见 ……48
（1927年8月18日）
湖南秋收暴动要有军队帮助 ……49
（1927年8月18日）
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50
（1927年8月19日）
湖南致中央函* ……51
（1927年8月20日）
湖南常委来信* ……53
（1927年8月30日）
不打长沙转兵向南 ……54
（1927年9月20日）
给杨开慧的信 ……55
（1927年9月）
给中共湖南省委的信 ……56
（1927年12月18日）
西江月·秋收起义 ……57
（1927年）
题军旗联 ……71
（1927年）
到安源时之报告* ……73
（1927年）
题遂川公审土豪劣绅大会联 ……79
（1928年1月）

为井冈山群众题春联 ……83
（1928年）
给江西省委和中央的报告 ……84
（1928年5月2日）
给湖南江西省委转中央的信 ……94
（1928年6月16日）
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 ……99
（1928年7月4日）
湘赣边界特委致湖南省委信* ……102
（1928年8月）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104
（1928年10月5日）
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18
（1928年10月5日）
挽王尔琢联……128
（1928年10月）
西江月·井冈山 ……131
（1928年秋）
井冈山的斗争……133
（1928年11月25日）
（井冈山）土地法 ……172
（1928年12月）
红军第四军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76
（1928年12月16日）
和何长工应对联……184
（1928年）

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187
（1929年1月）
共产党宣言* ……191
（1929年1月）
筹款公函……194
（1929年2月13日）
告商人及知识分子……196
（1929年3月16日）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9
（1929年3月20日）
敬告士兵群众书……204
（1929年3月27日）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205
（1929年4月5日）
四军军部命令……216
（1929年4月10日）
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218
（1929年4月13日）
（兴国县）土地法 ……219
（1929年4月）
农民协会章程* ……222
（1929年5月）
红军第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227
（1929年6月1日）
给林彪的信……234
（1929年6月14日）

红军第四军司令、政治部布告……249
（1929年6月）
清平乐·蒋桂战争 ……252
（1929年秋）
采桑子·重阳 ……254
（1929年10月）
从蛟洋到达汀州后给中央的信……263
（1929年11月28日）
给李立三的信……266
（1929年11月28日）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269
（1929年12月）
告全国士兵弟兄书* ……314
（1929年）
告绿林弟兄书* ……319
（1929年）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325
（1930年1月5日）
中国红军第四军告国民党军队士兵书* ……344
（1930年1月）
如梦令·元旦 ……351
（1930年1月）
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354
（1930年2月）
土地法* ……358
（1930年2月7日）

关于占领吉安建立江西苏维埃政府……364
（1930年2月14日）
联席会议的结论并宣告前委成立* ……370
（1930年2月16日）
分兵争取群众的意义及工作路线* ……373
（1930年3月18日）
关于第一次攻赣州的经验教训的训令……379
（1930年3月19日）
整顿军风纪的训令……381
（1930年3月21日）
关于官兵考绩的训令……382
（1930年3月29日）
征募和教育新兵问题的训令……386
（1930年3月29日）
宣传员工作纲要* ……388
（1930年4月26日）
加强体力与提高射击技术的训令……390
（1930年4月）
反对本本主义……392
（1930年5月）
寻乌调查……403
（1930年5月）

湖南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形*

（1927年6月22日）

（一）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甲）发展的情形：湖南农运为时不久，然据本年四月份报告全省有组织的有六十三县，会员达五百余万人，农民起来者近千万人。其分布区域，以湘江流域为中心，滨湖各县及资江流域次之，因此等地带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占重要〔地位〕，湖南农民运动为准备北伐工作计，也不能不首先着眼此处，至于湘西一带，因交通不便，又长时间在军阀——袁祖铭等统治之下，所以至今还在开始的时期。（乙）发展的原因：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起,完全是封建军阀统治的结果，军阀政治建筑在剥削农民上面，其赖以维持政权的最大饷项，即出于田赋、盐税、杂税、厘金，这四项完全直接或间接是农民负担的。湖南农民在张敬尧、傅良佐、赵恒惕、叶开鑫等军阀统治下之惨受提征田赋、加设厘金、增加杂税等，一切层出无穷的剥削，差不多八家九家弄到家空业尽。军阀为贯彻其剥削起见，复勾结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以为爪牙。厘金局、榷运局为官吏竞取之美差，六个月知事可得数万元，如此等类的事实归结为加倍农民的痛苦。至于土豪劣绅，为军阀政治的下层基础，政治上垄断乡村政权，利用团防武装实行屠杀，经济上重租重批高利借贷，农民生活乃更堕于万劫不复的地位。整个的封建势力——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层层剥削，

决定了农民只有两条出路：革命与死亡（饿死、冻死、为匪而死等）。在北伐过程中，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对于农民的利益——组织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废除苛捐杂税、禁止重租重利等曾有广大的宣传，于是湖南农民在饥饿困顿中便蹶然兴起了。（丙）农民革命中的主要力量：贫农是农民中最受痛苦、数量最大的群众，他们没有土地，生活毫无保障，简直早上不知道晚间。在封建政治下面，他们的地位又属于最卑贱，饿与死是他们不可逃的两个命运，因此他们天然富于革命性。富农中人对于革命起始是不生兴趣的，只有贫农才一开始便十分相信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对农民的宣传，毫不犹豫地赞成革命，毫不犹豫地加入农民协会。因此贫农实在是农民协会的发起人，是参加北伐的战士。换言之，贫农是湖南农民的领导者，这也就是湖南农运中的主要力量！

（二）湖南农民运动的功迹。（甲）参加北伐：湖南农民运动在革命中第一个贡献，即是领导了农民北伐，湖南农民参加北伐与省港罢工有同样的意义。省港罢工封锁香港，革命政府才有“闭门捉贼”，将陈炯明、邓本殷、杨希闵、刘镇寰等根本肃清，进而举行北伐的机会。湖南农民参加北伐，即使北伐军在极短时间通过湖南，能养精蓄锐而克复武汉。要是说省港罢工创造了北伐，那末农民运动即促成了北伐，当北伐军从衡阳下来的时候，醴陵、浏阳、平江、临湘、华容等地的农民曾以锄头、梭镖实际参加战争。组织侦探队、慰劳队、冲锋队援助北伐，因之农民阵亡者极多，至于送茶、送粥慰劳兵士更普遍全省。（乙）反抗土豪劣绅：军阀政治的下层势力建筑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把持乡村政权及团防武装以从事封建式剥削的上面。因此不求打倒封建军阀政治则已，否则除努力为打倒军阀本身外，必须进一步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专就农

民解放而言，也必须先从其直接统治者——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之下解放。

湖南农民对于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比任何口号都容易接受，因土豪劣绅为农民直接的统治者！湖南农民指土豪劣绅为“长牙齿”“坐长板凳的”，这都是形容土豪劣绅剥削农民血汗，垄断乡村政权的事实。尤其是农民对于此等“长牙齿”“坐长板凳的”所把持的乡村自治机关，比贪官污吏所盘踞的县政府及一切征收机关更属畏惧，更属痛恨，所以就有“打头张衙门”“铁门坎”的称呼。

湖南农民革命目前的对象仅有土豪劣绅，因主观的力量还不能与整个的封建势力作战，因此贪官污吏在湖南有些地方可以存在，他们队伍中间也没有打倒几个。至于土豪劣绅被农民打倒的，在数量上，可就比其他封建势力多了。但是实际说来，湖南农民打倒土豪劣绅也没有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闹得太凶”，统计全省为农民打倒的土豪劣绅也不过几十，倒是土豪劣绅两年未满的时间，惨杀农民实有可惊的数目矣。所以湖南农民目前只在反抗土豪劣绅，还不能算是打倒土豪劣绅。可是这种反土豪劣绅运动，也就已给湖南封建势力以不少的打击，如宁乡之刘昭、杨致泽，湘潭之晏容秋，华容之梅实，长沙之俞敕华等，均为土豪劣绅队伍中坐头一把交椅的。从这几个巨子明正典刑后，湖南的封建势力可算是挫折了锐气，这一点湖南农民在国民革命中实在建了伟大的功迹。（丙）建设了太平盛世的乡村：任你把湖南农村的骚扰现象说得如何动人，但即算是一个土豪劣绅的巨魁，在心里头或者竟致于口头上，也不能不承认目前的湖南农村，比他们这些“老爷”（湖南农民对地主的称呼）当权的时候，倒有太平气象。

满清末年起，政府即三令五申地禁鸦片，但事实上，在军阀统

治之下，禁烟局本来即是卖烟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哪怕你拿着烟枪躺在十字街头，也没有人问，被查处罚的却尽是一些小烟鬼和没有势力的，请看武汉市上的特别雅室、广州的谈话处之多，便可想见禁烟的滑稽。然而禁之二十年不但不曾禁绝，反而有长足发展的鸦片，湖南农民已起来的地方，以最短的时间，却一点一滴都禁绝了。

土豪劣绅的烟枪给农民劈尽了，区乡农民协会议决，发现秘密吸食的罚款游乡，果然有许多颇有面子的绅士先生唱了几出戴高帽子的把戏，从此湖南农村谁也不敢在虎头上捉虱，再干那吞云吐雾的勾当了。

至于赌博，农村童子团挨家搜索麻雀牌及其他赌具，当场付之一炬。旧习新年，乡村照例大开赌局，喝雉呼卢闹个不休，可是现在的新年娱乐，旧有的却留下的龙灯狮子着换，新增的却有演讲会、提灯会、群众大巡行等类，著名赌痞们，也只好跟着大家丢手。

三寸金莲，在北方以至于九省通衢的武汉还不算稀奇的事，湖南的穷乡僻壤，过去本也不少，可是现在农民协会的女会员，已经穿起草鞋，跟着大众背起梭镖进城游街了。还不止此，湖南农村女子公然有些自办小工场，下田耕种的了。

乡间还有几件事，连最凶的土豪劣绅也背着在啧啧称赞的，即是修塘坝、筑道路、垦荒土，任何人（包括地主）的塘坝要是壅塞，农民协会即下令开挖，工程完后，即与地主交涉，照实数给工钱。乡村道路素来不注意的，可是现在差不多每一处都给修好了。羊肠小径已变成丈多宽的通衢，真算是行旅称便，地主们惯于把持荒山荒土任其荒芜，农民协会便出名租借交会员开垦。

从事这三件工程，修塘坝、筑道路、垦荒地的，尽属贫农，这

是区乡农民协会议决安插贫农的方法。乡间因没有过分失业的危险，偷盗案件也就绝迹了，人们所梦想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湖南农村是一步紧一步地向这个现象走的。

此外办教育（捐钱设夜学）、破除迷信（观音殿、财神庙变了会场，神像抬开换了孙先生遗像），已成为农村极踊跃的工作，高贵的士大夫，一味空提倡，却不如平凡的农民马上见诸实行。

总而言之，农民运动已给湖南农村一个新的气象，民主主义的新气象，振兴工业生产、改良风俗习惯、救济失业，这都是湖南农民已有成绩尚不曾稍懈的工作呵！

（三）湖南农民运动的趋势。土地问题的解决，一切农民们急迫的要求是四个大字："土地国有"，根本推翻封建势力的经济基础，完成国民革命中的经济革命。农民是竭诚参加革命的，可是他在革命中不会忘记他的目标，倒是因革命更使他对这个目标增加了渴望。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跨过了先进的广东，因此他比其他各省更早、更明地告诉我们，他前列的战旗，即是"土地国有"，根本铲除封建势力。过去几个月农村中即流行一种口号"平均佃权"，这纯粹是贫农阶级喊出来的，这个农民式的口号的意义，即是反对垄断土地。农民协会会员中占多数的贫农分子，多主张按当地农民人数平均佃种，这个办法当然是行不通的，于是发生了"禁佃"的纠纷，这个现象完全是贫农丧失土地所致。还有个流行更为普遍的口号，在一般知识分子看来，简直是笑话，即是"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平等"。农民口中所说的不平等条约，不是什么南京条约、辛亥条约，而是关于苛刻征取地租的"佃约"，如最流行所谓"东七佃三"及"无息押金""田鸭""田蛋""田草"，逢时逢节送"人情"（即礼物）给地主，遇地主婚丧，有做工不受工资的义务等苛例陋规。这

些在农民尤其是贫农，以为便是国民党、国民政府所宣传要废除的不平等条约，看来真是好笑！可是这其中却含有贫农要求土地的意义，因所谓不平等条约的“佃约”、苛例、陋规，贫农固受害不浅，尤其是使贫农永不能有佃田的机会，贫农丧失土地，生活陷于极困苦的地位，是其能踊跃参加革命，胜过其他农民的唯一原因。农民自定之“平均佃权”，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即万一能够见诸实行，也完全是治标的办法，而不能将土地问题根本解决，因土地仍归为大地主所垄断，农村经济仍停滞于封建状态中，因此农民乃进一步发出所谓“平等”的呼声，即孙总理所谓“耕者有其田”，孙总理可说是预先看到湖南农民运动的趋势了！

湖南农民对于土地已经有二十分的急迫，在“平粜”“阻禁”两件事上更表现得显明。西欧农民的希望是产物价格增高，然而在市场上时常是产物还不及工业品的高贵，而发生所谓“剪刀”问题。在湖南却是相反的现象，农民协会普遍地抑平谷价，阻止谷米出境，实在说来这不算稀奇，不过是一个土地关系。西欧之农民都是有土地之小农（在机械生产的农场耕种的，只能算是工人，自当别论），所以他总希望谷价增涨，湖南农民也可以说中国农民，可就不然了，农民中贫农占百分之九十，这种贫农都是丧失土地，或者有土地而不足的，他们的食谷是要从地主富农手里用重价购买的，因此对于农产物价格的态度恰与西欧农民取一种相反的形势，就是希望谷价更贱更好，根本原因是高租重利的关系。“平粜”“阻禁”的确能给其他有土地的农民以不利，对于农产流通、政府财政的妨碍也毋庸讳言。

然而这完全是一个土地问题，要解决也只有土地问题解决以后才有可能。只要每一个农民都能够有够耕种的土地，那时农民站在

小农的利益只会希望谷价增涨，决不会发生“平粜”“阻禁”，否则任你如何救济总是徒然。湖南农民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对于“平粜”“阻禁”，曾有“按照当地所需食谷存仓外”“一概放行”的议决，省农民协会更三令五申实行禁止，但结果依然。因贫农嗷嗷待哺，饿肚皮使他在没有更好的方法而存仓又事实上做不通的时候，便以群众的力量，继续维持“平粜”“阻禁”的老法子，不能给与土地，要禁止这种农民式的方法，谁也不能够的呵！中国农民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所以总理说“国民革命成功在农夫工人之参加”，但是怎样使农民参加革命？给农民以所需要。农民的向背，是国民革命成功与否的标准，湖南农民运动已显示给我们，土地问题实在是国民革命议事日程中最先待解决的项目。

（四）湖南农民运动的障碍。土豪劣绅之进攻——我始终相信湖南农民目前还够不上说打倒土豪劣绅，而只能说是反抗土豪劣绅，许多人尤其是不明湖南真相的外省人，惯于一口咬定湖南农民闹得太凶，杀土豪劣绅太多了，事实告诉我们却是相反的。上面说过湖南被杀之土豪劣绅不过几十人，而农民被土豪劣绅残杀的却有可惊之数目，赵恒惕时代，以土匪为名，共杀了一万以上。除开我们有意抹杀事实，人人知道湖南农民的革命，可是很少有人知道湖南土豪劣绅的残酷狡猾，比任何省区都厉害。湖南农民运动当前的最大障碍，即是整千整万的土豪劣绅，湖南农民与此等土豪劣绅的中间，只有一个你死我活的关系，整个的土豪劣绅的阵线，是拼命地在向湖南农民进攻呵！

他们进攻的方法，最阴狠、最残酷的，分析起来一共有六个：

（1）利用团防实行屠杀：团防局、保卫团、民团、警察所，在湖南本来露骨的是地主的镇压农民武装，在赵恒惕时代更为军阀政

治的真实基础，如宁乡大地主童氏为赵氏岳家，童氏在宁乡可以任意调遣全县团防。这种地主的武装，在军阀时代是实际的乡村政府，是统治农民的直接机关，逮捕屠杀农民简直变成这些“局长老爷”的家常便饭。只要土豪劣绅鼻子里哼一声，农民便有“进局”的危险，宁乡杨致泽办团防时，并杀四百余人，并没有罪状。刘昭办团防的时候，有一次两个乡村竞玩龙灯，刘昭唆使所住乡村的乡人与其他乡人争斗，一铁匠骂刘昭的娘，过了许久，刘昭带团兵去外查案，路遇铁匠上山进香，刘昭即喝令团兵捆缚，挖眼截舌，又割断阳物插铁匠口中，大骂：“你还骂娘吗？”牵走五里，始行枪毙。各县团防私用非刑更属普遍，农民稍不如命，即以土匪之名，实行“挂半边猪”“踩杠子”“坐快活凳”“断脚筋”“鼻熏辣椒”“倒挂”等使人战栗的刑法，因此农民不“进局”则已，否则不死也成残废。

北伐军经过湖南时，而宁乡、湘乡、安化团防预备齐集雪峰山为赵氏作最后挣扎，湖南团防在土豪劣绅指挥之下，纯为反农民运动的工具。益阳泉交镇团防局不参加区党部成立典礼，大队巡行之农民，经过团防局时，质问局长不参加理由。团防局毫不答话，即开排枪，当地立毙农民百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嘉禾团防局长王泽民在团局大开赌局，被农民禁止，即枪毙农民王老四，并抄掠农民财产多家。茶陵团防局秘密将假期回乡宣传农运学生一人，以洋油、柴薪活捉烧死，尸首粉碎，丢弃灭迹。此外团防局勾结土豪劣绅以武力企图消灭农协的事实，差不多月有数起。

（2）勾结土匪：农民运动兴起，土豪劣绅所把持之乡村政权已大半倾颓，因之其所有之武装——团防局渐次失其统治的效力。许多团防局已自行解散，存者又为正绅所管理，土豪劣绅为继续进攻

农协计，便不得不舍弃团防而寻找新的武器——土匪了。安化土豪劣绅勾结土匪杀农民二百余，差不多在省农协的卷宗十件中有九件报告着，土豪劣绅聚合匪类，饮雄鸡血酒，指天发誓，打倒农协，杀尽特派员的举动，湖南农民在土豪劣绅勾结土匪这一个方法之下，的确牺牲了不少。

（3）组织反动团体：利用团防，勾结土匪，还是一时的行动，土豪劣绅进一步企图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动，便组织反动团体以团结势力，并以为指挥反革命的中枢。湘乡有镇乡维持会，衡阳有白化党，醴陵、浏阳有三爱党，醴陵有打狗会，所谓狗者即指农民。保产党更为湘中普遍组织，这些团体专在对付农民，凡各县惨杀农民、捣毁农协等举动，都是出自这些反革命、反农民运动的参谋部的计划。有些地方这种计划虽为民众破获，但其组织，并不曾解散，千方百计进攻农民正在一天天猛进呵！

（4）混入农协：这是一个更阴毒的进攻，在许多力量薄弱、指导者没有力量的地方，狡猾的土豪劣绅便戴着一副假面具混进了农协，从中捣乱，侦探虚实，尤其是故意提出过高的口号，做出越轨行动，以破坏省农协一贯的政策，或转害革命的农民。农民运动失却革命民众的同情，十分之九是出于这班土豪劣绅的奸细所赐。

（5）组织御用农民协会：土豪劣绅知道农民运动万难用武力阻止，继续以团防、土匪、反动团体明目张胆地进攻，只是以卵击石，惹火上身。聪明的土豪劣绅决不做这样“猪头式”的勾当，于是转而满口赞成农民运动。有一个时期，差不多每天都有几批肠肥脑满、尖口利嘴的人物到农民协会来索取简章，要求组织农民协会。他们是打着两树大旗——家族主义、地方主义，以号召家族，农民协会在各县曾不断地发现，团结一姓、反抗外人是他们的口

号。此外土豪劣绅多声称入其所号召之农协，可吃便宜食谷，或可得金钱以号召同姓或佃户，并千方百计愚哄上级机关承认其为特别区乡农协，以遂其利用窃取的阴谋，而从容置农民运动于死地。

（6）造谣中伤：湖南土豪劣绅，第一等逃往上海，第二等逃往汉口，第三等逃往长沙，这是湖南土豪劣绅在农民反抗以后的普遍行迹。他们是犯了滔天大祸，幸逃法网的罪犯，可是在逃亡中，他们还是不曾放弃他们反农民运动、反革命的工作，最大的最厉害的方法即是到处拼命造谣。这个阴谋实在比上面这些方法更来得严重，什么农运是共产公妻，兵士六个月不回家，妻子便由农协公去，某军长、师长的家财被充公，父亲被杀等无稽之谈，以挑拨革命军人与农民的感情，并使农民在革命民众面前失却深厚的同情，而陷于孤立的地位。目前在汉口，这种反宣传即极其发达。

（五）湖南农民运动的缺点及今后的方针。革命者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他只有从不断的进行中，了解他的错误，以求补救。湖南农民运动决不会有像土豪劣绅在各地反宣传那些奇怪的事实，如公妻共产之类，错误就是革命的联合战线！问题就是从反抗土豪劣绅大地主中间，稍忽略了小地主、小商人的利益。但是这个错误的原因，革命政党，尤不能辞其咎。几千年压迫下面的农民一旦起来，他的行动自不免带种种幼稚的行动，要是革命的政党能够取得农民的领导，农民在革命的政策之下作战，定不会有这样的错误的。可是现在农民运动如飞的发展，党在事实上落了后，以湖南言，几百个农民中不能找一个农民党员，所以革命的政策决不能深入农村而为农民作战的目标。今后的我们，唯一的方法只有在农村极力发展国民党的农民，努力地取得对农民的领导，继续实行下面的六个政策：

一、没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的财产。

二、保护革命军人的土地及财产。

三、保护中小地主、小商人的利益。

四、从速实现中央关于农民运动的政策。

五、建设革命民主的乡村政权。

六、武装农民。

中央农运讲习所给各省党部函*

（1927年6月）

迳启者案奉中央党部决定续招第二届学生，贵省党部□□□□生□名，兹将考送学生章程奉上，即希查照办理。惟须有特别声明□□□□一招生经验届各省考送，学生有未能按照考送学生章程办理，致□□□□窒碍，及不经□之事实：如学生身体之未详细检验，入所旧病即发□□□□能上课，这回则白费川赀；学生并无农运决心，不能接受严格军事□□□□途他去，服装被帐之不带整齐，入所即感缺乏。供给为难。此皆由□□□□慎，通知未周，致办理者与考送者，皆蒙不和。此届考送学生，务□□□□个，即能训练成材，有一个作用。特此函达，即希察照见复□荷。

考送学生章程*

（1927年6月）

一、名额　（各省名额见招生计划）不能超出规定数目，学生分配，以注重交通为要，政治中心，农运需要的地域，将该省总名额分配于各县。由县党部按照本章程，考送省党部。

二、资格　学生以由各县考送，来自乡间者为最好，其资格如与下列不合者，到所时绝不收录，并不负责遣回。

甲、思想　革命观点确定，无反动思想。

乙、学历　中等学校毕业或肄业者，高小毕业常识较优者，小学教师。

丙、决心　向党部填具志愿书，决心入所后服从本所纪律，接受严格训练，毕业回到本省乡村做农民运动，无他臆想者。

丁、身体　强健耐劳，确无肺病、痔病、神经衰弱、花柳等病，及其他痼疾，在所能服严厉军操，到乡能走远路（省县党部须负责行个别严格检验）。

戊、年龄　十八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

己、性别　一概男生。核

三、考试　由县党部考送省党部，省党部加以复试，以定去取。考试分笔试、口试。笔试科目：国文、□□、历史常识测验（本所□□复核如认为不合格即行遣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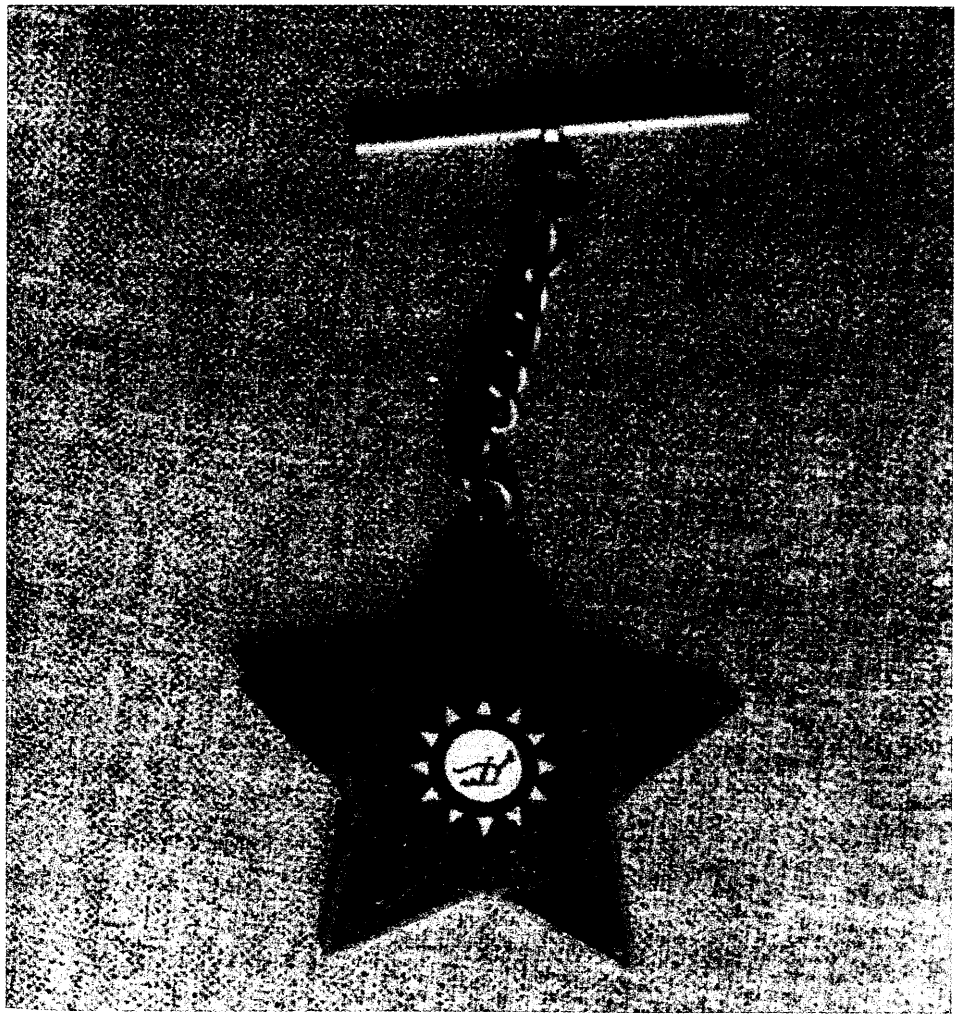
四、待遇　来往川资，由所供给，每人□□元，不收学费。制服由所供给，单制服两套。毕业后派赴乡村，担负农民运动工作。

五、学习期间　九月一日开学。

六、到所日期　限八月二十七日起到三十一日止，为到所时间，迟到早来，均不收纳。

附学生须自行携带之物件表：

一、面盆、手巾、漱口盂、牙刷。二、短夹裤、短棉衣、棉裤、换洗里衣。三、鞋袜、皮鞋。四、棉被褥全副。五、小箱□口。六、笔墨。七、洗衣剃头零用。上列各物必须自行携带齐全，如有缺乏本所概不供给。



1927年6月18日，农讲所学员毕业，大部被委任为农民特派员，或回乡从事农民运动。图为农讲所发给学员的毕业证章。

《送学员》（油画）

《红日照征程》（中国画）

中央农运讲习所招生计划

（1927年6月）

一、学额　一共六百名，第二期学额分配，应注重北方各省尤应多招直鲁豫三省学生，湘鄂赣农运人员已有相当准备，暂不招生，其他各省，则酌量支配。

省　别	学　额
鲁	八十
直	八十
豫	八十
陕	五十
晋	五十
川	五十
皖	三十
苏	五十
奉	三十
热	十五
察	十
绥	十
闽	二十
浙	二十
其他	二十五

二、开学日期　定于九月一日。因第一届须六月底始能结束，结束后，须稍有休歇时间，整理一切，且北方各省招生，亦须相当时间，故须九月一日，始能开学。

三、招生办法　学生仍由各省党部依据第一期招生章程，负责考送。

四、课程训练　根据第一届所定办法办理。

五、学习期间　仍定为四月，即今年十二月底毕业。

六、班数　仍为四班，依第一届之经验，每班学生人数过多，管理训练，极形不便。故二届学生，应酌量减少，第一届每班二百人以上至二百五十人，第二届应减至一百五十人，故六百人仍为四班。

七、经费　第二届经费支出及收入，均与第一届有不相同处，即第一届经费有四万元，系湘鄂赣三省党部负担，第二届经费，须完全由中央负担，因北方各省，尚无能力分任也，又第一届学生来所，并无路费，支出回籍路费，□比较不多，第二届学生则来所回籍，均须发给路费，故路费支出，为数甚巨，来往路费共三万元，预算如下表：

省　别	每名数（元）	共计（元）
鲁	五十	四千
直	五十	四千
豫	三十	二千四百
陕	七十	三千五百
晋	六十	三千
川	八十	四千
皖	二十	六百

省　别	每名数（元）	共计（元）
苏	十四	一千二百
奉	八十	二千四百
热	七十	一千零五十
闽	四十	八百
浙	三十	六百
察	七十	七百
绥	七十	七百
其他		一百零五

经常费共六万六千元。

（说明）依第一届经验每学生一人四个月需用费一百一十元，六百人六万六千元。

以上两项，共需九万六千元，拟由七月份起，仍按第一届，向中央支领一万四千元之数，则中央每月支出之预算，仍然不变。

全国农协对于农运之新规划

（1927年6月）

为令遵事：前此蒋、夏诸逆，相继叛变，均以反对农工运动为旗帜。此虽反革命派一贯之口号，而非农工运动本身真有所谓过失与否之问题。但一方因革命潮流飞涨，初期农民运动之原始现象，未能完全免除，他方面上级机关之指导能力，不能与需要相适应，确为不可否认之事实。中国农民运动，已进到一个新时期，必须采取新政策，更能顺利执行起见，再指出下列五事，务望各省农民协会，并转各级农民协会，切实遵照办理：

一　注意强固组织严肃纪律

各级农民协会，过去因为发展甚速，难免有土豪劣绅等不良分子乘机混入，以遂其破坏农民运动之企图。他们每每假借农民协会名义，做出种种妨害大多数农民利益及农民协会名誉之事实。现欲改正此种不良事件，必须多数农民积极参加各级农民协会，各乡区农民协会更当尽可能地随时召集代表大会，审查过去工作，监督会员行动。如发现不良分子，必须立即执行革命纪律，予以严厉制裁，并为执行新政策起见，各级农民协会，应即日召集代表大会，增选新职员，增加新的指导工作人员。同时使耕田的贫农、佃农、

雇农及自耕农，成为农民协会之坚固的社会基础。

二　注意革命同盟者的利益

农村中的小商人为流通金融之主要分子，并与农民同立于被压迫的地位，农民协会应即领导农民，与之建立亲切的革命联盟。煮酒熬糖，以及其他商品，虽为商会之利益，同时亦与农村经济有关，农民协会必须予以保护。农村谷米，在乡村自治机关未成立时，应由农协计算农村需要，使有余的谷米尽量流通，使小地主及富农不致感受不便，而军米亦得充分的供给，农村中之其他重要出产品，未宜与城市商业发生良好的经济关系，使中小商人之贸易，得以无障碍地发展。以前有些地方，因为抽捐派款及其他原因，遂使城市商业与农村之关系日益恶化。今后对于此种情形，亟宜纠正，并当有组织地扶助商业之发展，以防奸商过度之剥削。对于革命军人之家属及财产，本会临字第一号训令，已明令各级农民协会指导农民，予以切实保护，此项工作，目前尤须与慰劳救护革命军人之运动，一致加紧进行。

三　注意改良乡村旧习惯之步骤

乡间禁酒席、禁斋果香烛，反对一切迷信及宗法社会之旧习，改良乡间妇女之地位等运动，因为打破封建社会恶习之必要的行为，但必经过长时间的宣传，使一般民众俱能了解，社会文化上已提高，方可行之而无碍。倘必操切从事，则不惟得不到良好效果，及使反动分子利用落后思想，造谣煽惑，向进步的农民运动进攻，

以破坏乡村的革命联盟。

四　开始乡村建设事业

乡村自治机关之建立，为镇压反动封建势力，巩固农民已得胜利，消灭乡村无政府状态而使农民运动适应于革命新环境之重要工作。已由本会呈请国民政府早日颁布乡村自治条例，各级农民协会，应即联络乡村革命平民，努力进行，务于最短时间，使乡村自治机关，完全建立起来。农民银行、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及其他建设事业，各级农民协会，亦应与其他革命平民，共事建设。

五　加紧宣传工作

农民运动一有相当发展，土豪劣绅等及封建势力，除一面集中力量，残杀农民外，一面复收买走狗，捏词诬陷，造谣煽惑，贫苦农民，初得相当自由，对于组织协会，既无经验，幼稚行动，万难全免。土豪劣绅更复小题大做，以耸听闻，夏逆叛变以后，其行动尤为猖獗。各级农民协会，过去对于宣传工作，非常懈怠，土豪劣绅颠倒是非、淆乱黑白之宣传，遂得以充满于乡村城市，甚至革命同志，亦受其影响而怀疑农民运动，以后各级农民协会，不但要切实将贫苦农民受土豪劣绅压迫摧残之事实，充分呈露于革命同志、革命民众之前，用以解除土豪劣绅进攻农民最大之武器，并真实地将农民运动详细情形，尽量发展出来，使上级农协得以随时指导其工作，纠正其错误。对于本会临字第一号训令，更须作一度很普遍的宣传，使一般农民俱能彻底明了农民运动的新方向，而积极按照

本会所示径途，努力工作。

凡此五端，均为巩固革命联盟，促进国民革命之要务，各省农民协会必须领导各级农民协会，切实遵行，倘有奉行不力，或阳奉阴违者，本会必当伸以革命纪律，立予改组，其有反动派假借农协名义，滋生事端，或捏词诬陷者，各级农民协会，转请政府立予扑灭，毋使滋蔓是为至要，切切此令。

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常务委员

谭延闿　谭平山　邓演达　毛泽东　陆沉

1927年上半年，毛泽东一家在武汉的住处。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1]

（1927年7月4日）

一

长沙事件为何键夺唐生智政权。唐生智本欲拉我们反何，但见我们没有力量，遂拉拢何键部下打何，故唐不能打许克祥。

二

在国民革命军中有几个师和军反蒋，应促成唐生智和何键分化，拉唐反蒋。

三

有两策略：（一）改成安抚军合法存在，此条实难办到。（二）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讨论湖南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讨论联合唐生智反对蒋介石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三是毛泽东关于省农协策略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此外尚有两条路：（1）上山，（2）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目前农民运动的总策略*

（1927年7月20日）

（一）近年农民运动的进展，已表明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土地革命只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的进展，需要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和工农武装。这一革命在中国目前已经受了一个挫折，其原因：（1）无产阶级的领导尚不强健，换言之，即无产阶级主观上的组织力尚不能领导工农小资产阶级这一革命联盟；（2）工农武装没有建设；（3）我们党动摇不定政策的错误；（4）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以及所谓革命军的阶级性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不能担任新的历史使命——土地革命，他们由限制工农运动而进到反对、屠杀工农的整个的反革命，这种叛变是历史的必然，证明了革命的深入丝毫不足惊奇，我们党的责任只有坚决地与这种新的反革命奋斗，积聚一切革命势力，开展这一革命的新阶段——土地革命。这是目前革命的客观情势，要求我们一个新的策略上的答复。

（二）现在全国农民，整个的在新旧军阀之下喘嘘地活着，十几年新旧军阀战争的负担和帝国主义经济的侵略，最大部分架在穷苦农民身上，在北方，苛捐苛税的繁重已经迫使大多数的农民抛弃土地，得不着生活，南方各省，农民的痛苦与北方无异，屡经奋斗所得的些许自由，又重新完全被剥削。无论南北大多数遭受过度的压

迫的穷苦农民（佃农、半自耕农、雇农、失业农民以及大部分自耕农）他们已经觉悟起来，到处和他们的敌人奋斗，尤其在南方自李济琛、唐生智之屠杀以来，农民之反抗奋斗，更加英勇而坚决，同时新旧军阀因为他们彼此间的冲突和内部矛盾，不仅不能建设一个统一的反动政权，反而一个一个很迅速地正在继续崩溃下去。因此全国的革命潮流，表面上虽似一时的低落，实际却是继续往上涨。目前的反动局面只是革命转到解决土地问题这一阶段时阶级冲突的反应。我们的党只有坚决地站在这个土地革命的立场，才能领导这一革命潮流前进，怎样开发土地革命的潮流呢？只有敏捷地认清客观情势，抓住每一个机会，提出适当的口号，领导广大的群众继续不断地争斗才能达到此目的，此时，“不缴苛捐苛税”“不缴预征钱粮”“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取消高利贷”“没收大地主、土豪劣绅及反革命的土地”“没收祠堂、庙宇等及一切公共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新旧军阀”“实现革命民权”“实现乡村农会政权”“民选县政府”“解除反革命的武装”“恢复农民协会”“实行农民武装”“农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抗租、抗税之自由”等口号，应当是开发土地革命的总的动力。

（三）在北方各省如直鲁晋豫等，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多数，他们苦于繁重的税捐日益破产，流为土匪或逃亡他省。在这里我们要以自耕农、贫农、佃农、雇农为中心联合一切农村穷苦民众及小地主结成斗争的联盟，反抗一切苛捐苛税及预征钱粮，反抗一切战时的征发，实行减租二五，同时从这种斗争的发展中夺取乡村政权、夺取武装以至于没取豪绅大地主反革命及一切祠堂庙宇等土地，无代价分给农民及地户。

在南方湘鄂赣粤等省则佃农占多数，次之为自耕农半自耕农，

佃农受地主重租的剥削，同时自耕农、小地主则受军阀税捐的剥削极为繁重，我们应立即于实行二五减租，反抗苛捐苛税预征钱粮的口号之下实行罢租罢税，一面借以揭破武汉南京政府减租减税的伪善面具，一面以佃农自耕农贫农为中心团结一切农村穷苦民众以至于小地主，进行严重的打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夺取农村政权武装于农民协会之下，以至于没收豪绅大地主反革命及一切祠堂庙宇的土地以开展土地革命。这是我们现在应用全力宣传聚集农民群众力量而实现之的口号。

无论在什么地方，反对超过年利百分之二十的高利贷的争斗应彻底进行，因为这是一般被压迫民众的共同要求。

（四）土地革命只是一个过程，政权争斗是这一过程的主要特点。必有夺取政权的争斗，才能推翻封建地主的乡村统治，才能促进土地问题的爆发而且给他以解决的权力机关。在南方各省如广东湖南，虽则农民运动的主要特点已经进到没收大地主，其实农民如果没有取得政权，单纯地解决土地问题是不可能的。依湘粤的经验，这个分析是丝毫没有错的。

所谓政权的争斗，就是要建设农民的革命政权，换言之即农会政权之建设。在中国农民运动的历史上，农民协会已经不是一种职业组织，而是以穷苦农民为主干的乡村政治联盟，因为农民协会，事实上不仅团结了一般农民（耕地的或失业的），包括了手工业者、小学教师和小商人，就是一部分脱离大地主影响而对农会表同情之小地主也经联合在农民协会之内。所以农民协会在现时就是乡村中穷苦农民联合其他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政治联盟——农会政权。这是乡村政权的一个正确的形式，要开始在各地实现起来。

（五）根据两湖农民运动的经验，应当指出在农民协会组织上要

特别注意的几点：

（1）每一省农民运动要把我们的人力财力集中在政治军事或交通占重要的区域，以树立领导全省运动的中心基础，宁可为求这些区域的深入而暂缓扩大，万不可只求扩大而忘记了中心基础工作。

（2）农民协会既团结了一般农民群众、手工业者、小学教师、小商人，并且在一定条件之下，小地主也包括在内，则农协各级领导机关的成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大概小地主一般的不吸取在领导机关内，此外在区执委内，佃农、自耕农、贫农、失业农民至少各占五分之一，在区执委内小学教师的当选是有必要的。

（3）各级农协设立妇女部及青年部，乡村儿童运动及儿童团体完全受农协青年部之指挥，农妇概加入农协不另组织女界团体。

（六）农会政权的斗争和土地革命必需革命的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但是现在所谓革命军实际是在代表地主阶级的反动军官领导之下，到处屠杀农民，武装冲突已成为农民运动中极普通的现象，因此在现时阶段中农民运动确是最严重而紧迫的问题，每一个农民运动者如果没有十二分注意这个问题而谋给予正确的答复，便等于没有准备农民革命得到胜利。各地党部应当用种种方法使农民接受军事训练，获得武装，今指出几项大要的办法如下：

（1）用种种方法夺取地主阶级和一切反革命派的武装，武装农民。

（2）勇敢的有训练的农协会员有组织地投到军队中接受军事训练并用种种方法时时进行破坏其组织夺取其武装的工作。

（3）对团防局、保卫团等地主阶级的武装在不能即刻夺取其武装时亦采用上项的办法。

（4）农民武装现时没有以“农民自卫军”“农军”这类名义公开

存在的可能，只能在下面三种形式之下存在：A. 以合法的名义存在如“挨户团”“保卫团”“联庄会”之类；B. 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遇战事则随时集中；C. 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

（5）在北方红枪会、大刀会等武装团体，党要派适当同志打入其下层群众，领导他们为他们的利益而争斗以取得他们的信仰——让他们渐次脱离反动领袖成为革命的武装，万不可一开始便去攻击其反动领袖或提议改变其组织形式，破除迷信，这种机械的性急的手段是不能取得群众拥护的。同时如过去只知联络其领袖或借军事领袖的招牌去号召也是不能收效的。

在南方一般以“劫富济贫”为标语的会匪，在农民革命的高潮中又输入了“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同时他们的行动也能与农民协会接近甚至团结在农协之下。本来他们多半是失业农民或将近破产的农民，他们的经济口号如“劫富济贫”就和“没收大地主土地”接近，他们自然是地主阶级的仇人，是城市反动军队的敌对者（在没有被他们的反动领袖拍卖以前），假使能领导他们上正确的革命的轨道，一定可以成为土地革命之有力的帮助者，但是他们的生活和环境是异常之恶劣的，他们的领袖多半是带有候补军阀的性质，因此他们得不到正确的政治的领导走上革命正轨为一定的目标而奋斗，而以“打家劫舍”为惯常生活，其行动与思想完全随其领袖为转移，因此我们要懂得会匪在农民革命中的积极作用，一面又要明白他们走向反动的可能性，我们的目的便是要增进他们的革命性和革命训练，使之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之下而成为土地革命的有力的帮助者，其方法与上项大体相同。

（七）党在农民中的组织，过去是没有能够相当地尽其领导责任的，许多地方虽然能有十万几十万的农民群众的争斗，但每每只是

几个同志在那里活动，而党的组织在那里尽其领导责任，有些地方虽然有党的组织，但没有深入群众（都只在区协没有到了乡协）或者虽有组织而不起作用，或者便是农运负责同视党和集体的领导而习于个人的活动，因此，我们党在农村中的一切工作感觉到“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之概。党在平时既不能尽其组织上积极的责任，□时，自然更不能希望其成为唯一的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如果本党的领导能正确地在农民中建立起来。那末，第一，要使党的支部能够深入到乡农协，并□□正成为群众争斗的核心。第二，党对农民的指导必须经过党团（改正过去□□领袖的错误），党团要绝对服从党的指导。第三，各省党部的农民都要□地建立起来，对一省的农民运动每次定出一月或两月的计划，督促并□各级党部切实执行。

中央委员宣言

（1927年8月1日）

同人等受全国同志之重托，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任为中央委员以来，根据本党主义政策与总理遗教，为国民革命前途奋斗，赖全国同志之协同努力，虽历经党国危急时期，幸能无大陨越。今者党国危机，更等于昔日，故同人等不得不将最近事态之真相，与全国同志唯一之奋斗途径，掬诚敬告我全国同志。溯自去年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以来，具见革命进程中仍不免有少数拥有武力之野心家，企图勾结反革命势力，以逞其□党自重之私意。当其时也，同人等顾念革命全局之利益，冀能促成北伐发展广大民众势力，则必能裁制野心家之阴谋于一日，故一年之间不惜降志辱身以与蒋中正等相周旋，未敢稍自离弃全国同志，置革命前途于不顾，一走了事自命清高。迄至今年春间，蒋逆中正始则欲移党部政府于南昌以遂其反动独裁之私；继则公然叛变，割据东南，勾结军阀买办，残害同志，屠杀民众。如是全国同志为党国存亡计，始发动恢复党权之运动，而第三次全体中央会议，亦于是举行，通过各项巩固革命势力之决议，本党主义政策与总理遗教危而复安者，间不容发。唯此恢复党权运动，全赖全国同志之一致努力，始能与蒋逆中正以重大之打击，重振革命之前途。但唐生智等武人亦起而投机，借口拥护此种运动，以遂其倒蒋而自增势力之私，同人等明知此等武人对于

革命毫无诚意，将来难免危害党国。然亦只有根据总理遗训，使本党获得广大农民群众参加革命，始能巩固革命之基础。故对于两湖广大农民运动之发展，以及农民群众进入为解决土地问题及建立乡村自治之革命行动，认为不但不应加以压抑，而且认为系本党“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渐得广大农民之认识。广大农民有此认识与运动，方能摧毁封建之残余势力，以为本党革命势力及民治民有民享之新中国取得切实之保障。不图第二次北伐出师以后，唐生智部将何键即开始谋叛。嗾使夏斗寅等潜袭武昌，暗令许充祥等发难长沙。当此危急时机，武人之与勾结者拥兵坐视，不肯协力剿办。中央党部少数软弱领袖，震于反动之声势，不免动摇软化，对叛逆武人不敢毅然加以相当之惩治。同时，江西朱培德因谋于蒋氏妥协，有驱除革命分子停止工农运动之事。此少数领袖，亦曲予优容，视为当然。冯玉祥入豫以后，更公然赴徐州与蒋逆会议，致电威胁中央罢免军队中一切政治工作人员。此少数领袖亦无制裁能力，且不能不虚与委蛇决定，以自乱其步趋。中央党部在此少数软弱领袖指导之下，威信完全坠失，但知仰武人鼻息，以中央神圣之决议，徇其私利。于是武人之气焰大涨，党与政府完全成为武人之一种工具，唐生智回湘，更任意改组省政府、省党部，并将屠杀政策推行不已，全湘忠实能奋斗之党员与农民断腰折躯者数以万计，全鄂以五千计，而武汉中央对此数万同志之被害，一则曰此多共产分子，再则曰彼辈不服从中央命令，自由行动，三则曰“耕者有其田”“应以政治与法律来解决”。今则事实显然，无可掩饰。两湖之被害者，其一部分为加入本党忠实革命之共产党员外，未加入他党之本党党员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此万数党员，均系根据本党农工决议总理遗训，在农工群众中艰苦工作，今为反动武人如此残杀。武汉中央

则加以违背中央命令之罪，其卖党、卖同志，一致于此！总理遗训谓不以政治和法律来解决“耕者有其田”的问题。今武汉中央则以政治法律保障唐生智等屠杀党员及工农，亦即以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屠杀农民问题。此是总理之本意?！唐生智、何键等复在武汉首都横行无忌，包围中央党部，占据民众团体，劫掠中央银行，逮捕中央委员，搜查总理夫人宋庆龄同志、外交部长陈友仁同志住宅。中央党部复在此种反动武人威胁之下提出分共之议，欲借此排斥一切忠实党员，以便于武人反革命之企图，卖党无耻，如斯其极！分共之议，在中央常务委员会未能通过。彼等仍欲号召八月十五日之中央全体会议。同时在武汉及一切在彼等权力以下之各机关已开始捏造曲解种种事实，大为反共之宣传，企图强迫中央委员通过彼等所提出之议案，以掩饰其非法谋叛之逆迹。同人等目睹此等情形，知武汉少数领袖已甘心受武人挟持，卖党卖身。若犹隐忍不与奋斗，助成其叛逆之计划，将何以对全国同志托付之重，何以对总理与本党先烈？是以决意先后离汉，为革命与本党前途，将尽力所能及，以领导全国同志为保持本党革命的正统而奋斗。尤可痛者，汪精卫同志向居本党领袖地位，此次竟以模棱两可致受群小包围，终屈服于军阀武力之下；屈服以后，犹复巧鼓簧舌，淆乱听闻，言辞矛盾，举止反常。凡其所为，与其回国之初，迥若两人。总理临逝世时，虑党中领袖或不免受敌人软化。总理逝世不及三年，党中旧的领袖竟大半为敌人软化以去。言念及此，痛心何极！同人等顾念总理四十年造党之艰难，与全国百万革命同志期望之远大，不能坐视本党荣誉之历史为此等少数旧领袖所断送，兹特郑重申明，近日武汉少数中央委员假借中央党部名义所发布之一切训令决议，同人等概未同意，不能负责，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

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与陈炯明、杨希闵、冯自由、谢持、邹鲁之辈实殊途而同归。北伐之牺牲，必须能达本党总理之遗志，拯救民众疾苦，解放工农，以发展革命势力，倘如今日新旧军阀相缘为奸，以屠杀工农，压迫民众，则不仅北伐之牺牲为无代价，其结果必仍旧造成军阀割据之局，使中国战乱循环起伏，永无止境。同人等自今以后，唯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决不敢有所瞻徇，以贻误革命大局。全国同志在此时间，均应一本总理创造本党之精神，与一切假冒本党革命名义者坚决奋斗，尤望在本党指导之下的忠实将士，能一本总理百折不回之勇气，使一兵一卒皆能不受假冒本党革命名义者之所利用，为本党真正之革命主张奋斗到底。凡我同志，丁此时艰，务宜团结一致，以为下列之主张奋斗：

（一）反对武汉少数中央委员假借中央党部所发布之训令决议。

（二）拥护总理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社会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反对一切曲解或背叛主义政策之主张。

（三）共同努力为革命获一新根据地以便在新旧军阀势力之外，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集中革命势力继续革命工作问题。

（四）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由各省党部代表，推举全党信任之领袖组织临时的革命领导机关。

（五）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一洗武汉少数中央委员妥协迁就之怯弱态度，须正确而勇猛地以此种革命主张□号天下，唤起民众。

（六）尽力可能，以废除苛捐杂税，革去一切秕政弊端，以实现本党代表平民利益之主张。

（七）积极预备实力以扫除蒋冯唐等新式军阀为国内一切帝国主

义北洋军阀与封建社会之势力。

以上种种，同人等以为当前急务，唯有全党一致坚决为此等主张奋斗，然后中国革命运动才有成功之望，凡我同志，希鉴察之！

孙宋庆龄　邓演达　谭平山　彭泽民　林祖涵
恩克巴图　吴玉章　于树德　恽代英　柳亚子
杨匏安　高语罕　谢　晋　白云梯　毛泽东
董用威　江　浩　韩麟符　夏　曦　许苏魂
邓颖超　屈　武

一九二七年三月—八月全國各省因革命而犧牲者的數目之統計表（全國實際調查）

省名	被殺者	受傷者	被捕者	逃亡者	家屬人口
浙江	一五〇〇	二〇〇〇	五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三〇〇
江蘇	九〇〇	五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八〇〇
湖北	五〇〇	二〇〇	一二〇〇	一四〇〇	四〇〇
廣東	二〇〇〇	三〇〇〇	五〇〇〇	八〇〇〇	一六〇〇
廣西	五〇〇	三〇〇	四〇〇	五〇〇	四五〇
湖南	二〇〇〇	二五〇〇	五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
河北	一二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一〇〇〇
江西	五〇〇	四〇〇	三〇〇	一〇〇〇	四五〇
安徽	二〇〇	一〇〇	三〇〇	一〇〇	一五〇
四川	二二〇〇	一五〇〇	二〇〇〇	三〇〇	二二〇〇
雲南	八〇		三〇〇	一〇〇	八〇
貴州	五〇		二〇〇	一〇〇	五〇
山東	三〇〇		五〇〇	四〇〇	三〇〇
直隸	二〇〇		五〇〇	四〇〇	二〇〇
河南	五〇		六〇〇	八〇〇	五〇
山西	五〇		五〇〇	一〇〇	五〇
陝西	五〇		四〇〇	一〇〇	五〇
甘肅	五〇		二〇〇		五〇
東北諸省	一〇〇		五〇〇		一〇〇
總計	二九四三〇	四三〇〇〇	二四九〇〇	三三二〇〇	二八二八〇

一九二七年三月—八月全國各省因革命而犧牲者的數目之統計表　七七

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反共”，中国共产党成为非法党派，大革命失败。图为当时被杀的各省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统计表。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发起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图为江西大旅社，起义前周恩来等曾在这里开会讨论起义问题。

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1]

（1927年8月7日）

国际代表[2]报告的全部是很重要的。第一，国民党问题在吾党是很长久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未解决。首先是加入的问题，继又发生什么人加入，即产业工人不应加入的问题。实际上不仅产业工人，即农民都无决心令其加入。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其后有一部分人主张产业工人也加入，闻湖北亦有此决定，但仅是纸上空文，未能执行。过去群众中有偶然不听中央命令的抓住了国民党的下级党部，当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直到现在，才改变了策略，使工农群众进国民党去

---

[1] 这是毛泽东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举行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的一次发言。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归于失败。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这个紧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

[2] 国际代表，指罗米那兹（1898—1934），苏联人。1927年7月下旬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中国，在8月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

当主人。第二，农民问题。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曾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1]走了。甚可怪的，唐[2]军还仅承认只有八处军官家庭被毁，我党反似乎承认不知有多少军官家庭被毁。总之，过去群众对于党的领导的影响太少。第三，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3]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

---

[1] 许克祥（1891—1967），湖南湘乡人，1927年春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同年5月21日（马日），他在长沙发动反革命事变，捣毁湖南省总工会、省农会及其他革命团体，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史称马日事变。

[2] 唐，指唐生智（1889—1970），湖南东安人，1927年4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不久改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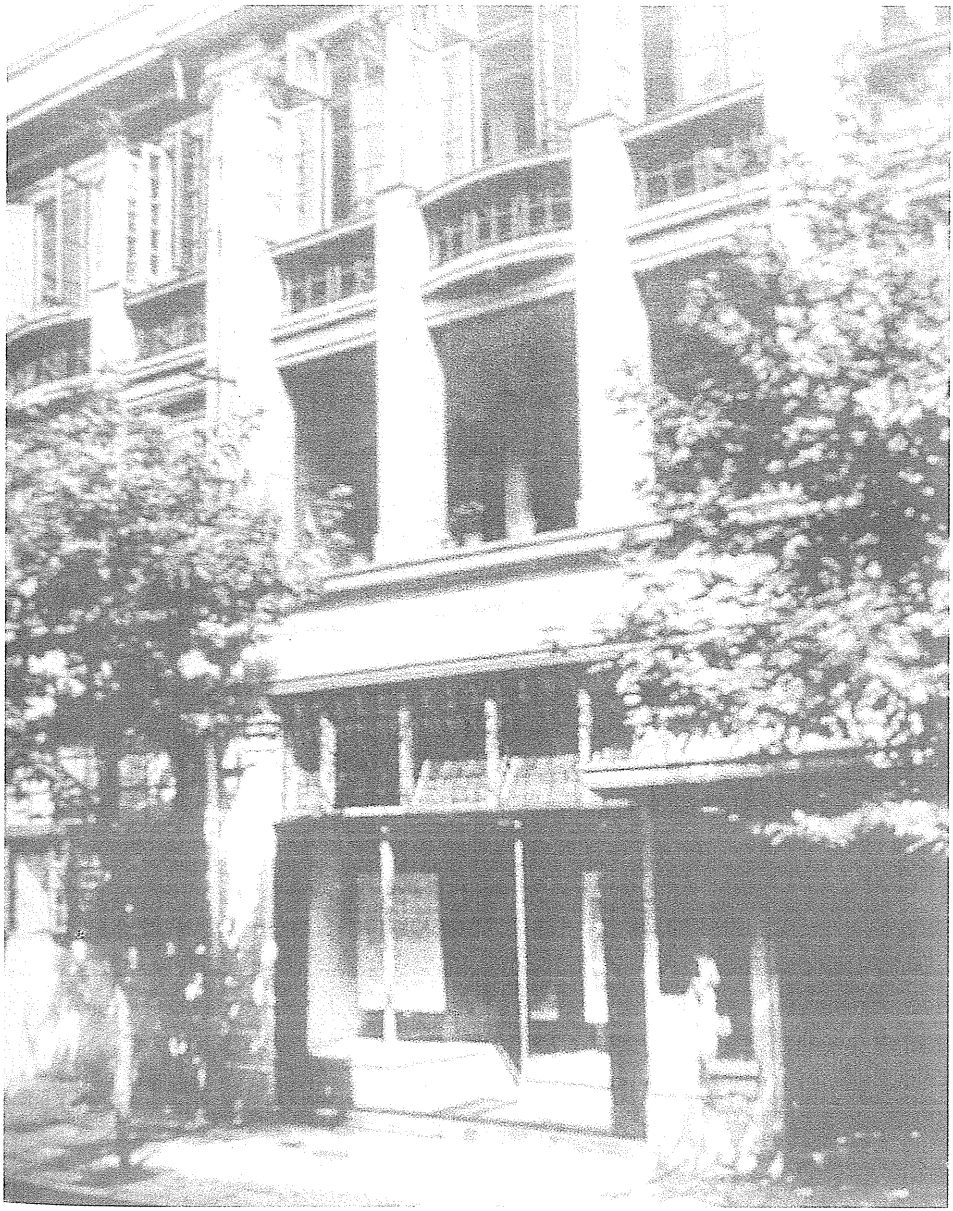
[3] 蒋，指蒋介石。唐，指唐生智。

中取得的。[1]第四，组织问题。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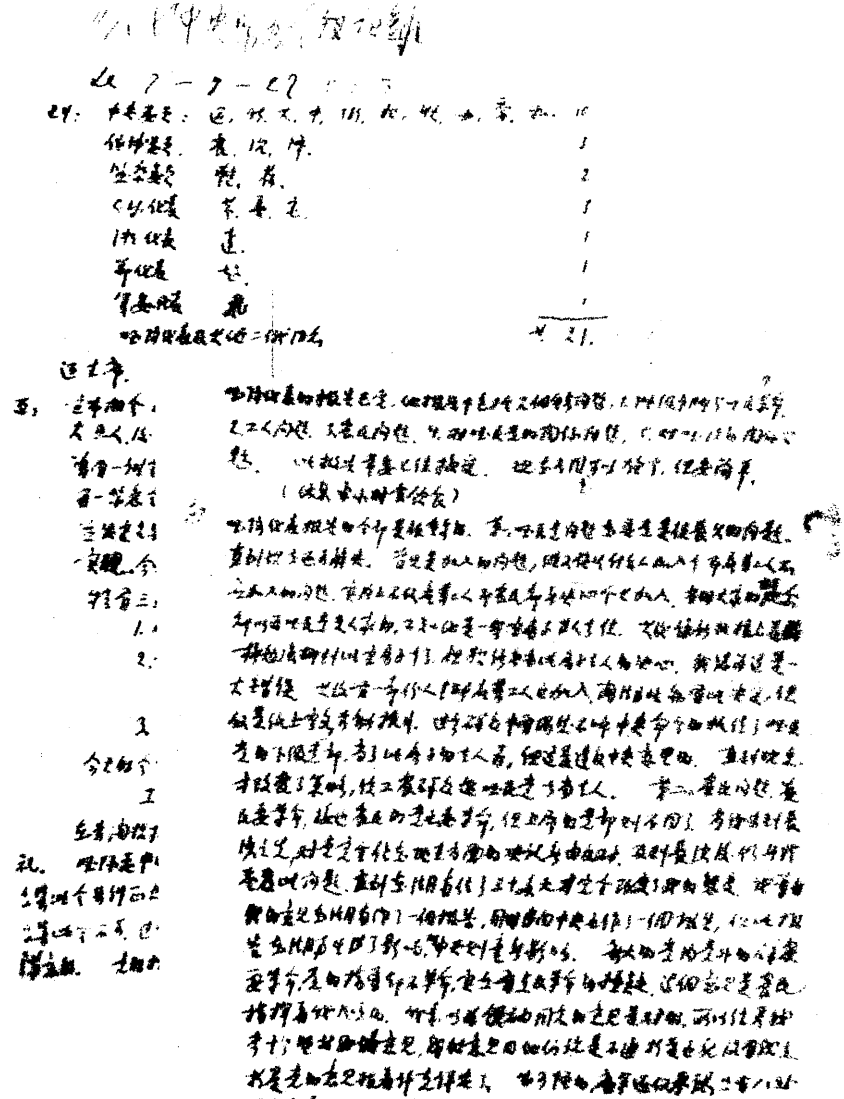
八七会议会址（内景）。

---

[1] 1927年8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对这个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一、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暴动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二、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图为八七会议旧址。



八七会议的会议记录。

湘南运动大纲[1]

（1927年8月）

一、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2]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联络。此湘南政府之作用有三：

（一）使唐在湖南本未稳定之统治，更趋于不稳定，激起唐部下之迅速分化。

（二）为全省农民暴动的先锋队。

（三）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以达推翻唐政府之目的。

二、军力方面：

（一）请中央命令彭湃[3]同志勿将现在汝城之粤农军他调。

---

[1] 这是毛泽东起草的经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在湘南开展武装斗争的计划。这之前，毛泽东在1927年3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提出“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这是使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应大力普及。7月4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农民武装如何发展和保存的问题时，毛泽东又提出有两条路线：“(1)上山，(2)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2] 唐政府，指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省政府主席唐生智。

[3] 彭湃，中共中央委员，曾任广东省农民协会副委员长，当时是南昌起义中共前敌委员会成员。

（二）浏平军[1]千人立即由郭亮[2]率领赴汝城。

（三）江西革命军中调一团人赴汝城。

右三部分共兵力约一师，以革命军一团作中坚，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

三、湘南须受江西革命领导机关的指挥，革命的粤政府成立，则受粤政府指挥，并供给其需要。中央应命令江西方面执行此计划。

四、党的湘南特别委员会，受湖南省委的指挥，在交通阻隔时候得独立行使职权。

---

[1]　指湖南浏阳和平江的农民武装。

[2]　郭亮，1927年马日事变后曾代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同柳直荀等部署发动长沙附近各县农军进攻长沙。

湖南民众组织更需要武装[1]

（1927年8月9日）

组织一师往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已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2]，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现在的省委是在事变[3]后收拾残局的，成立不到两月，他在恢复湖南组织上是建了一点功劳的。以后省委应增加工农同志的指导是很对的，以前党内群众对党的负责人是不满的。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讨论湖南问题时的发言。

[2] 即《湘南运动大纲》。

[3] 指马日事变。

关于土地问题的意见[1]

（1927年8月18日）

一、没收土地必有没收的对象，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有好多被没收者，被没收的土地即少，贫农要求土地的又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住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二、没收土地的办法，要由革命委员会（我们的党）制定一个土地政纲，将全部办法要农协或革命委员会执行。三、这个没收土地的政纲，如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方法安插。因此主张在不能工作或工作能力不足及老弱的地主，应由农协在农业税之内征收若干农产物平均分配给此等分子。四、宣布废除对农民的各种苛税，征收农业税。

[1] 这是毛泽东在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讨论湖南农民问题（土地问题）时发表意见的一部分。

湖南秋收暴动要有军队帮助[1]

（1927年8月18日）

一、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要来制造这个暴动，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暴动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二、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1] 这是毛泽东和易礼容在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讨论湖南暴动问题时发表意见的一部分。易礼容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

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1927年8月19日）

世荣兄：

湖南的秋收暴动在现在客观环境上看，确是到了一个很好的时机，现在此间决定办法于下：

一、湖南的秋收暴动决定以长沙暴动为起点，湘南、湘西等亦同时暴动，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

二、长沙暴动以工农为主力，决调陈烈、李隆光两团做暴动的发火药，只要能破坏反动的政府的其他一切方法尽量实行，实现暴动。

三、夺取长沙时即建立革命委员会，执行关于工农兵政权的一切革命行动。

四、湖南现在因许克祥对唐生智的叛变，唐的军队均开往前线抵许，现在湘南与长沙事实已经隔绝，因此，另组织了一个湘南指导委员会指挥湘南暴动，目的在夺取湘南，至万不可能时，决夺取桂东、汝城、资兴三县，建立工农兵的政权，湘南等革命委员会坚决实行土地革命政策。

以上是此□，对湖南暴动的原则，具体详细情形由资深同学面告，接到此信后请即批准赐复，并帮助一切为盼。

湖南致中央函*

（1927年8月20日）

（上略）……（三）某同志来湘道及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跳跃三百；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从前总以为这是在一九〇五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立，必须迅速地取得全国之胜利。望中央无疑地接受国际训令，并且在湖南实行。

因国际这个新训令，影响到我们对国民党的意见，即在农工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从前我们没有积极地取得国民党领导权而让汪、蒋、唐等领导去，现在即应把这面旗子让给他们，这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我们则应立刻坚决地树起红旗，至于小资产阶级，让他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客观上也必定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

（四）土地问题

我这回从长沙清泰乡（亲到）湘潭韶山（有农民五人来省）两

处乡村的农民调查中，知道湖南的农民对于土地问题一定要全盘解决。昨日与乡下来的几位农民同志会商，征询他们意见的结果，拟出土地纲领数条，大要是：

（一）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归之公有，由农协按照“工作能力”与“消费量”（即依每家人口长幼多寡定每家实际消费量之多寡）两个标准公平分配于愿得地之一切乡村人民。

（二）土地分配时由区协命令乡协按户造册，造好交于区协由区协按册分配土地。

（三）土地分配以区为单位不以乡为单位，人口多于土地之乡，可以移于人口少于土地之乡。必如此而后分配略得其平，至于甲区移住乙区暂不可能。

（四）土地没收之后对于地主（无论大地主）家属之安置必须有一办法，方能安定人心，办法分为……（中略）四等：一等收百分之四，二等收百分之三，三等收百分之二，四等收百分之一。

此草案昨日虽在省委会讨论一次，尚待多征询农民同志意见然后再请兄处作最后之决定，兹先将草案录上借供讨论资料……（下略）

八月二十日

湖南常委来信*

（1927年8月30日）

某某兄：

湘字五号信收到，关于指出此间两点错误，事实及理论均非兄所说，兹将答复于下：

（一）夺取长沙与秋收暴动在革命的整个意义上说，是发展土地革命，长沙暴动与秋收暴动是一回事。长沙暴动是秋收暴动的起点，秋收暴动的发展是土地革命夺取政权，我们计划夺取长沙的主要战斗者是工农，要调某某两团进攻长沙意义是辅助工农力量之不足，不是主力，是掩护暴动的发展，不是唯一的重要的暴动成分。兄处谓此间是军事冒险，令将长沙暴动计划取消，实在是不明了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

（二）兄谓此间专注意长沙工作，而忽略各地，这并不是事实。此间没有将各地已有相当准备之事实，向兄陈述这是一个错误。（请看湘中暴动计划）关于湘南工作问题，也该说明一句，我们是以向长沙暴动为起点，并不是放弃湘南，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所以我们决定不以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但是湘南各县的暴动计划及暴动准备均已令有组织的各县切实执行，长沙暴动开始，各县随之同时发动。

八月三十日

不打长沙转兵向南[1]

（1927年9月20日）

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这次秋收起义，虽然受了挫折，但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武装斗争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难。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继续勇敢战斗，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

---

[1] 1927年9月20日早晨，毛泽东在里仁学校操坪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全体人员讲话，宣布中共前敌委员会关于不打长沙转兵向南的决定。这是讲话的一部分。

给杨开慧的信

（1927年9月）

我亲爱的霞[1]：

我去了，不管去的有多远，有多久，我总是要回来的，我们不久就会团聚的。要坚信两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大家团结努力，革命一定会成功！

润之留笔

[1] 霞，即杨开慧。

给中共湖南省委的信[1]

（1927年12月18日）

部队行动，由朱德、陈毅、张子清、宛希先、余贲民、袁文才、毛泽东七人组成前委，请批准。如系驻军，则应组织湘赣特别委员会，指挥军事及交界八县党务、农村暴动等，人员除上述七人外加江西的刘真，请呈报中央批准。又朱云卿应加入前委和特委。

[1] 1927年12月18日，毛泽东致信中共湖南省委，提议改组前敌委员会，表示朱、毛两部建立联合领导的意向。这是该信的主要内容。

西江月·秋收起义[1]

（1927年）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2]。
匡庐[3]一带不停留，
要向潇湘[4]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

[1] 秋收起义，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决定发动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武装起义。毛泽东在湖南省东北部和江西省西北部领导农民、工人和一部分北伐军，成立一支工农革命军，9月9日起在修水、铜鼓、平江、浏阳一带举行武装起义，遭到敌人围击。10月，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成功地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2] 斧头，中国共产党党旗上的锤子当时常被误认为斧头。

[3] 匡庐，首次发表时原作“修铜”，1986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根据作者修改的抄件改为“匡庐”。传说商、周间有匡俗（一作匡续）在今江西庐山结庐，因称匡庐或庐山。参见东晋慧远《庐山记》（一作《庐山记略》）。

[4] 潇湘，首次发表时原作“平浏”，1986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根据作者修改的抄件改为“潇湘”，借潇水和湘江指湖南省。

农民个个同仇[1]。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2]。

《秋收起义》（中国画）

[1]　同仇，同心合力打击敌人。《诗·秦风·无衣》："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2]　进、动，按《西江月》词律，上下阕末句末字当与二、三句末字同韵异调，即第二、第三句押平声韵，第四句押原韵的仄声韵。这里没有按律押韵，而依湖南方音用进、动两字隔阕押韵。

秋收起义口号宣傳

一、暴動打倒虐生紳　法精神

二、暴動打倒有政者

三、暴動推倒國民政府

四、暴動殺土豪劣紳

五、暴動農民奪取政權

六、暴動退收土豪劣紳的財產

七、暴動實行農民協會主政

八、暴動組織革命委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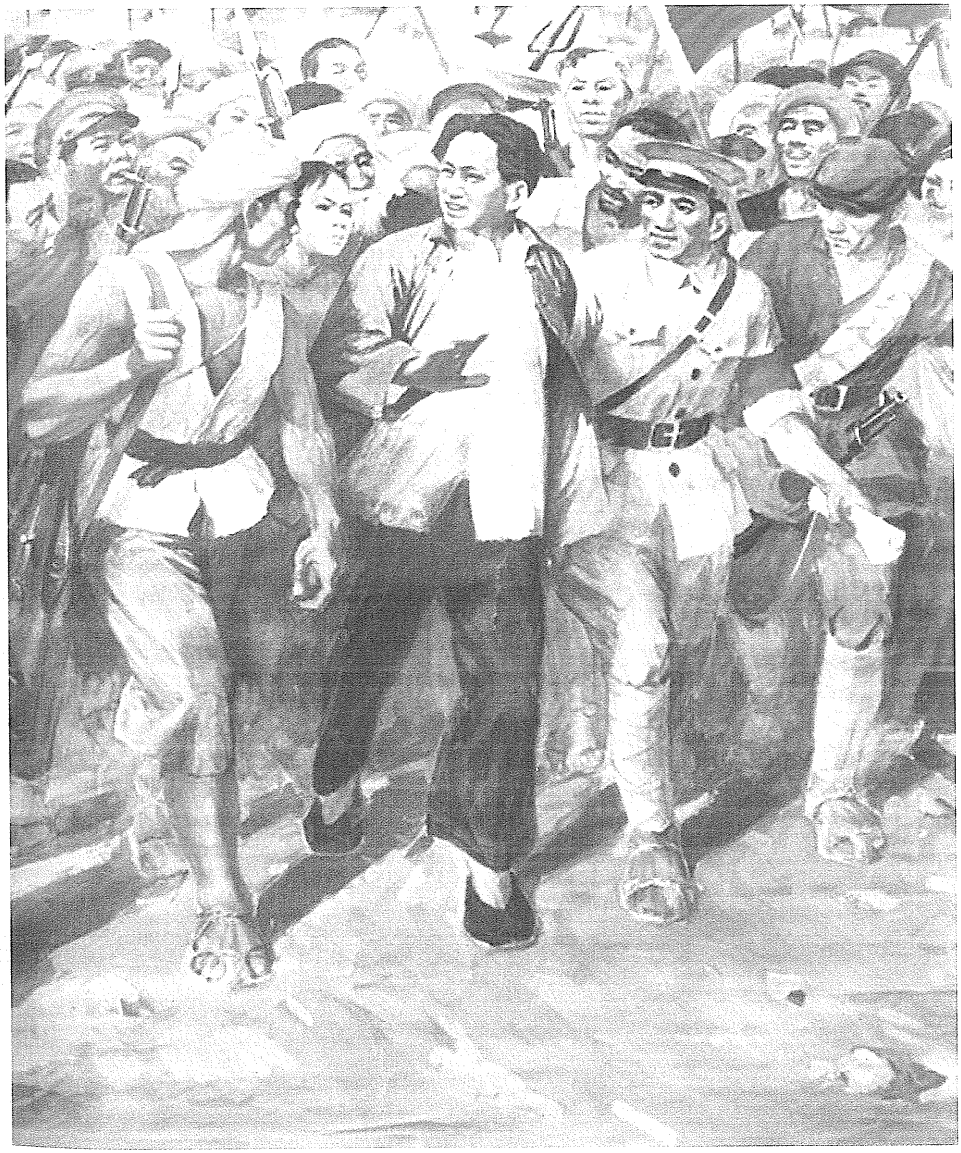
九、農民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

十、暴動勝利萬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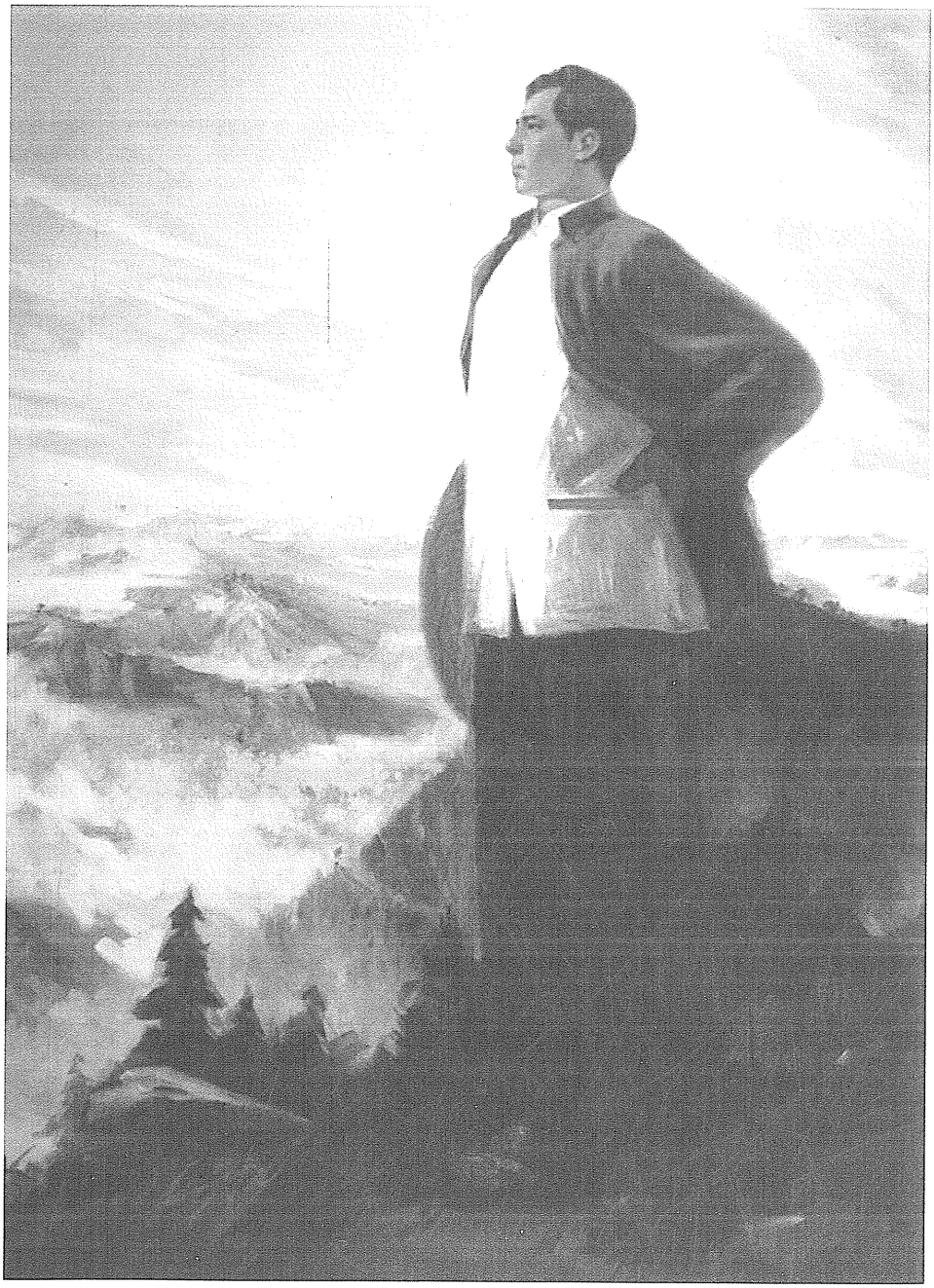
秋收起义口号。

《秋收暴动》（中国画）

《秋收起义》（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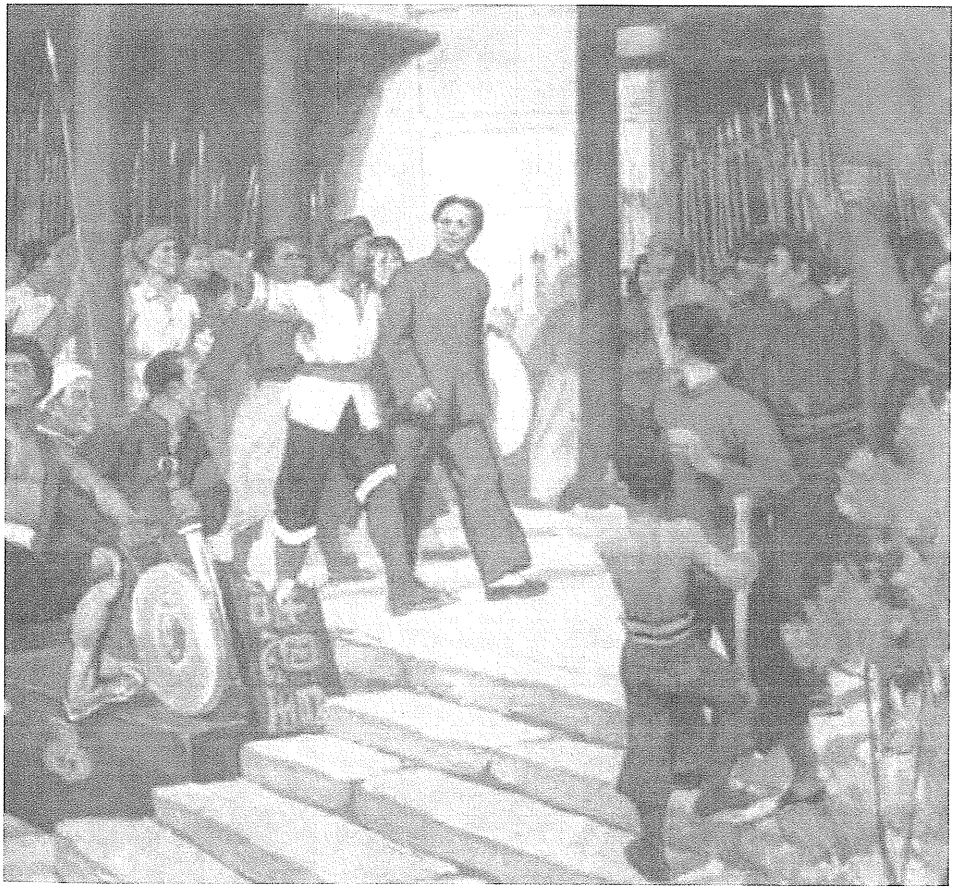
《秋收起义》（油画）



《秋收起义》（油画）

《毛泽东在秋收起义誓师大会上》（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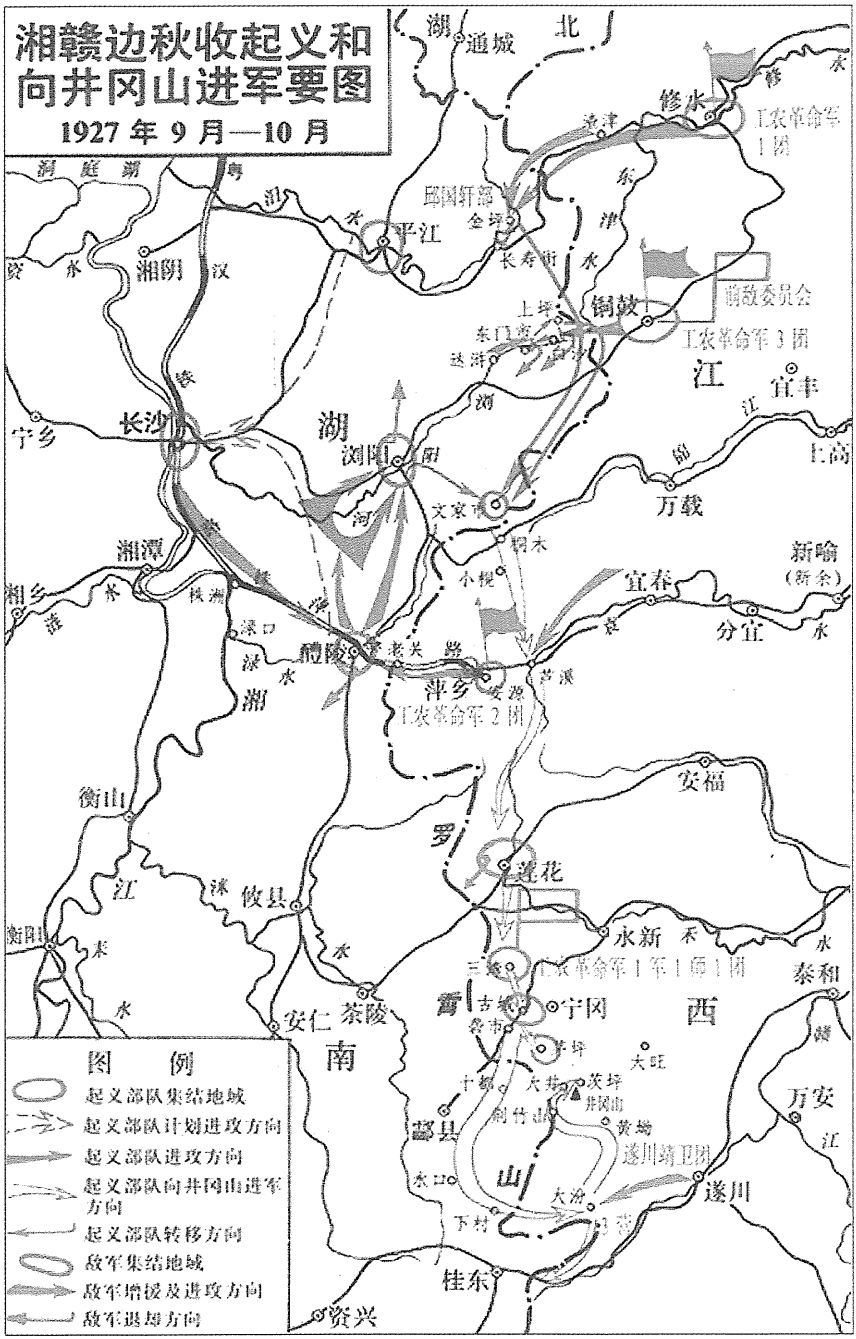
《秋收暴动》（油画）



《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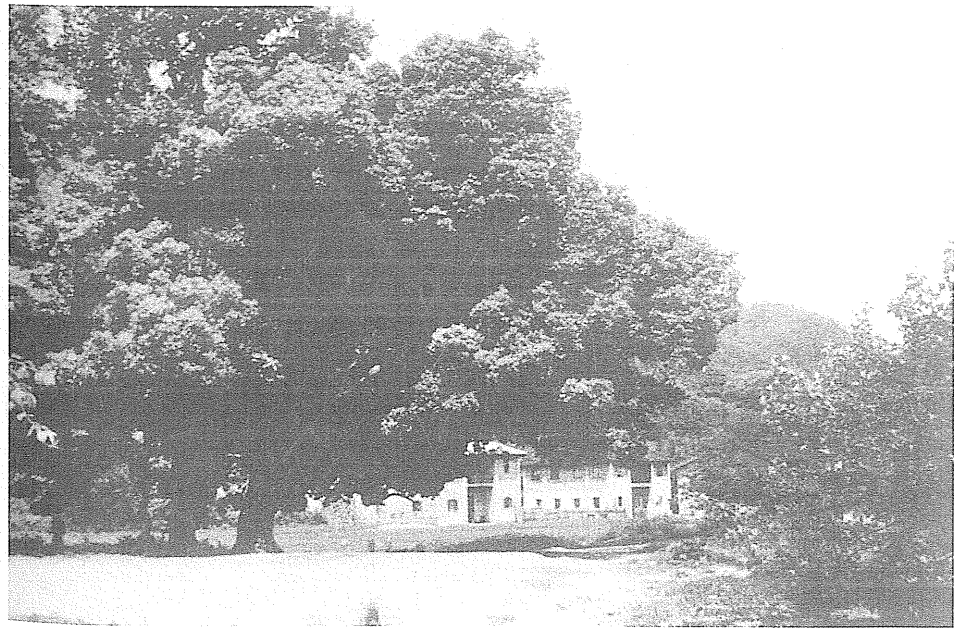
《秋收起义》（油画）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宣传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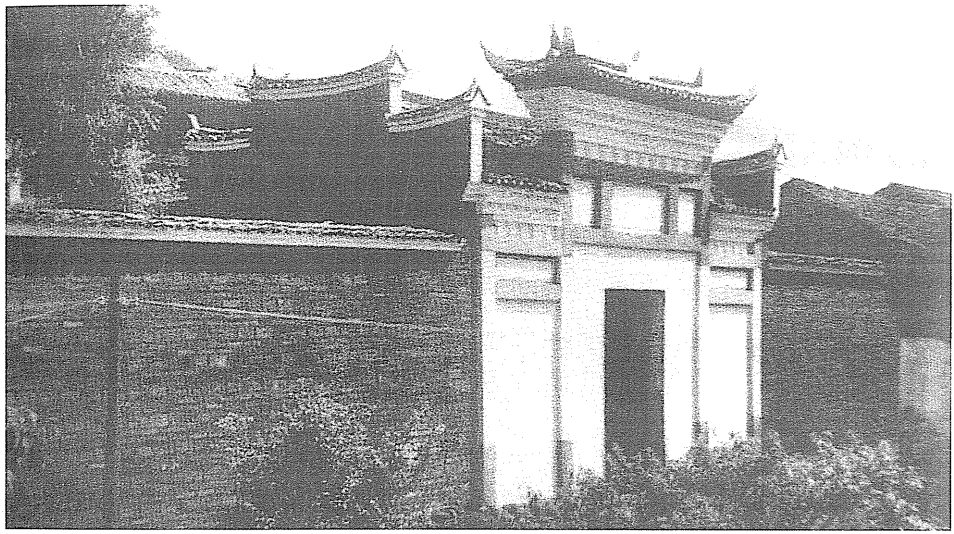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秋收起义爆发。图为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要图。

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在里仁学校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放弃攻打长沙，向井冈山进军。图为文家市里仁学校旧址。



1927年9月底，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在这里对部队进行了改编。图为三湾枫树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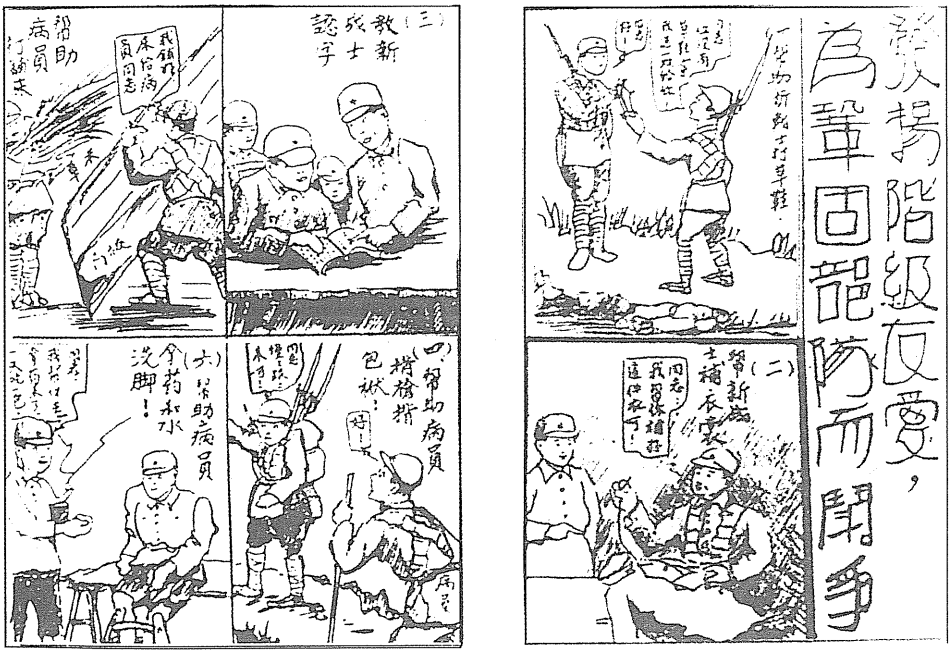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领导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在部队中建立中共各级党组织和民主制度，把党支部建在连上，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图为三湾士兵委员会的旧址。



1927年10月3日，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省宁冈县古城。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图为会议旧址——联奎书院。

《三湾改编》（油画）

《毛主席在文家市》（油画）



三湾改编提出了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改变军官欺压士兵的旧风气，为建立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图为红军当年的宣传画。

题军旗联[1]

（1927年）

旗开得胜；

马到成功。

[1] 1927年9月9日，在湘赣边界的浏阳起义。为了加强对起义军的宣传鼓动工作，毛泽东独出心裁，亲自在中国工农革命军的军旗上书写了这副对联。

1927年9月，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奔赴安源，部署秋收起义，并决定正式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图为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由何长工设计制作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

到安源时之报告*

（1927年）

两湖的秋收暴动是我在中央时决定的。湖南指挥暴动的机关，分为两个：一个是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以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一是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同志为书记，以各县负责同志为委员。长沙暴动以人力车工人及近郊农民为主力。并可组织五百左右之伤兵。各县都已准备农民暴动，各地电线、铁路都已准备拆毁。我并带有中央介绍信，要贺、聂军队中调两团人来做暴动的武力，现在他们既绕道闽边，他们来了更好，希望潘心源同志将军队的情形作一详细报告，并开会讨论平、浏、醴、安各地的暴动布置工作。

《伟大的进军》（油画）

《向井冈山进军》（油画）

《向井冈山进军》（油画）

《向井冈山进军》（油画）

荆竹山雷打石。1927年10月毛泽东在这里宣布了“三大纪律”。

1928

《井冈山会师》（油画）

题遂川公审土豪劣绅大会联[1]

（1928年1月）

你当年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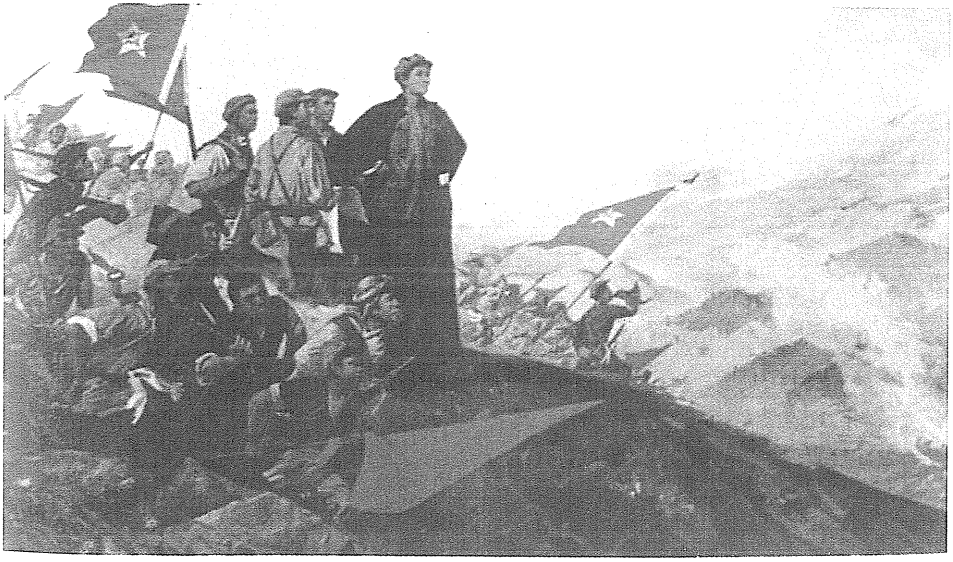
我今日宰杀土劣[2]，怕不怕，刀上加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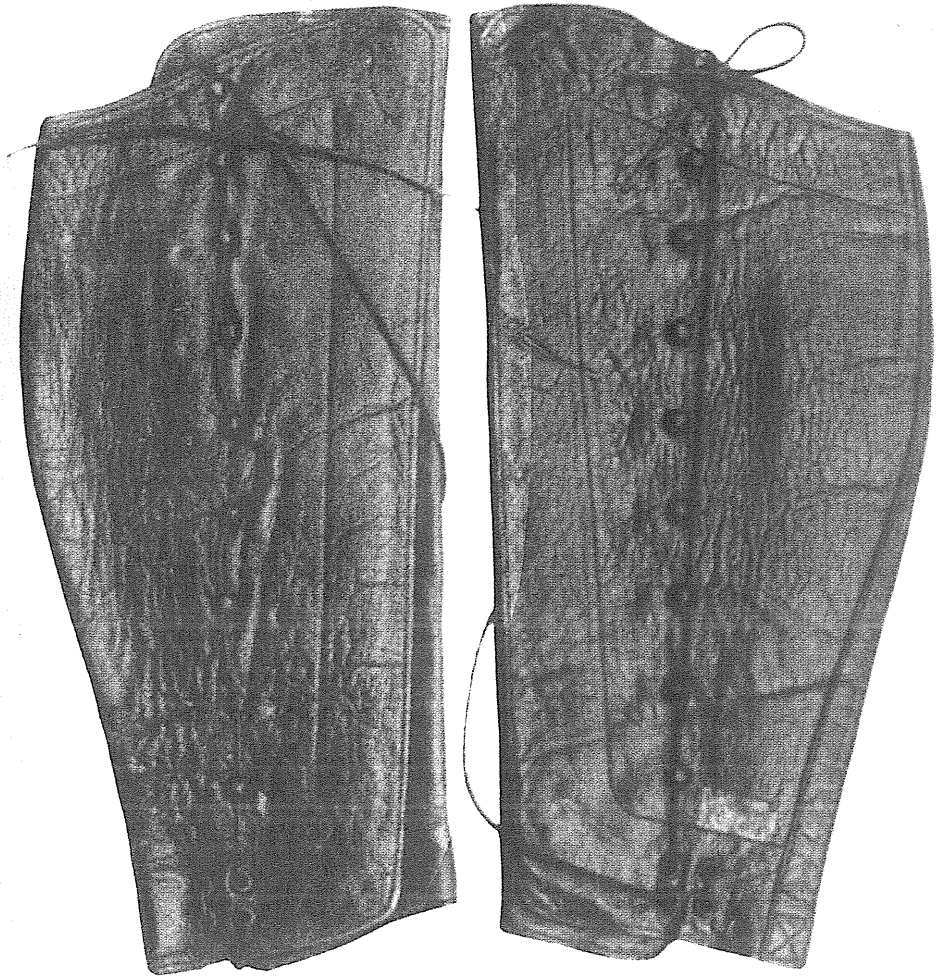
[1] 1928年1月5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队攻克江西遂川县城，1月24日召开成立县工农兵政府的群众大会，公审土豪劣绅郭渭坚，并处以极刑。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并为大会亲笔书写了这副对联。遂川，县名，在江西省西南部，赣江支流遂川江上游，邻接湖南省。

[2] 土劣，土豪劣绅的缩称。

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极力争取、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两支武装。图为袁文才（左）、王佐。



1928年2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取得井冈山斗争的第一个胜仗，攻克宁冈县城新城，打破国民党军对井冈山的第一次“进剿”。图为油画《新城大捷》。



毛泽东送给袁文才骑马用的裹腿。

《王佐迎接工农革命军》（中国画）

为井冈山群众题春联[1]

（1928年）

大刀梭镖铲除旧世道；

斧头镰刀开创新乾坤。

[1] 这是1928年春节，毛泽东在井冈山茅坪给井冈山群众题写的春联。

给江西省委和中央的报告

（1928年5月2日）

中央：

（一）我们失败后——由湘南（军队无甚损失，不过是湘南政权和茶陵政权被破坏了）退至赣边。岂有此理的湖南各县委和县政府带了一大批农军，一起跑来，现在有一万八在这里。

（二）占领的地方是永新、宁冈、遂川三县，不久将会扩充地盘。

（三）追击毛部之杨如轩师，结果反被毛部赶至赣边，其八十一团被击溃于遂川之五斗江。七十九团前被毛部缴械之营，现在也被朱部击溃于永新。现在毛部之三十一团亦由宁冈开来了，永新敌兵已溃退吉安，此次缴械三百支。

（四）所以不直下吉安者，因采取对内对外都使深入的策略。以永新为中心而附近各县发起暴动，对内建立党军队筹款子，做衣服；对外帮助地方发起工农暴动，建立工农政权，与分配土地。因此决定把打吉安的功夫来做这些事，比较有意义的多。

（五）前湘南特委决定朱、毛两部合编为第四军，指定朱德为军长，毛任党代表。朱部编为第十师，毛部编为第十一师，湘南各县农军编入两师中，朱兼十师师长，宛希先党代表；毛兼十一师师长（本任张子清，因他受伤，毛兼代），何挺颖党代表。另一教导大

队，陈毅任大队长。机关炮略备。以朱部二十八团，毛部三十一团为较有战斗力，马马虎虎的军队来很可一打。

（六）一万人的群众拖泥带水纪律太糟（一部分除外），刻正大加整顿，日益良好。

（七）军委、师委、团党、各支部开了党的训练班，日益良好。

（八）吃饭大难。一个月来大多数每天除米三分洋外，别的不消说。不过现在永新这几天筹了些款子。

（九）两省边界距离仅十余县，两省省委历次管不到手。因同志们努力，党的组织活动都在天天发展中。但从三月间周鲁同志（湘南特委代表）来宁冈取消前委后，顿失中心，各自为政，起了不良之现象。去年十二月前委会即有建议组织边界特委，湘省委及中央最好请另派得力同志来此做书记，毛同志任军中工作很难兼职。

（十）我们的永久通信处：宁冈袁文才；大小五井，遂宁界金竹山王佐。

（十一）政治分析、党的重要文件，请时时寄来。

（十二）请将别区不能立足的暴动分子大批送来，不论军事、政治、技术的，愈多愈好。前委之搅事做无骂词又骂受不办呢？睡不觉，现未免是罪恶，现于吉安来信之后，大略意思即把特委组织起来。你以为如何？听兄处明示，组织一是，组织，这以宁冈为中心罗霄山脉政权之建立，党之强有力，军力去造就实在湘赣两省之革命根据地之一，此理毛同志等累次呈明在案。由湘南特委转湖南省委转中央多次，未见奉准驳明文，间以安源市委来信中偶有湖南省委已核准的话，并非省委明示，前两日接吉安县委的信，又有江西省委亦核定的话，并毛同志任书记的话，仍非省委明示，这怎么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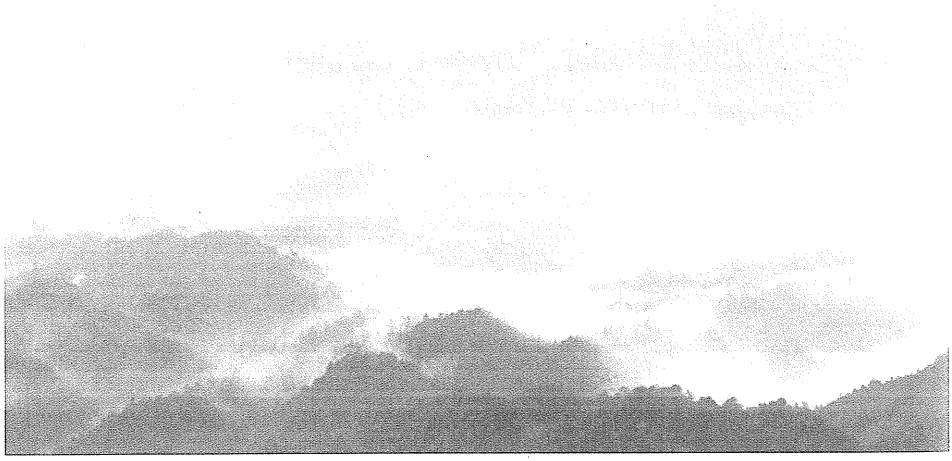
来呢？又怕挨无味的骂。完了。

此致

敬礼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　毛泽东

五月二日于永新城内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图为位于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

1928年，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农军和毛泽东部在宁冈砻市会师。图为砻市龙江书院，毛泽东、朱德曾在这里长谈。

《排头兵的故事》（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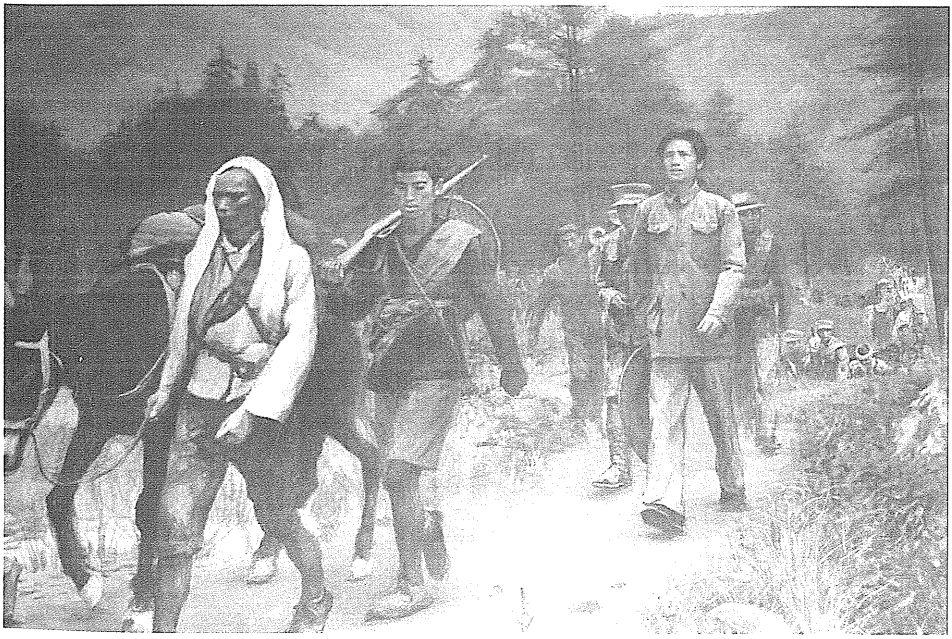
《井冈山会师》（油画）

《井冈山会师》（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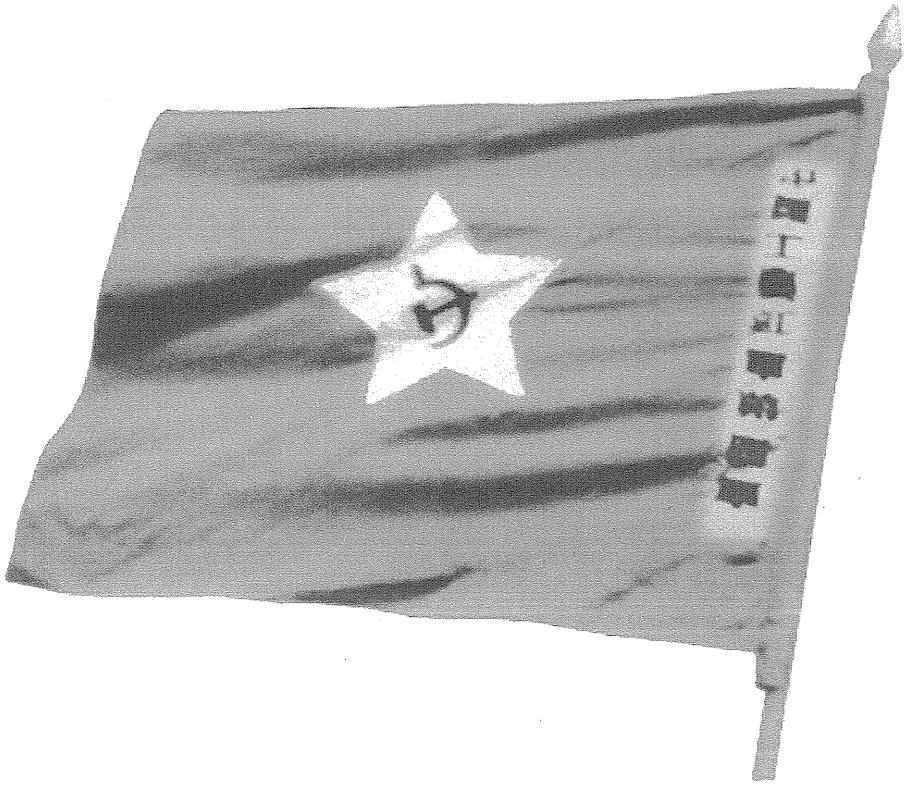
《井冈山会师》（油画）

《井冈山会师》（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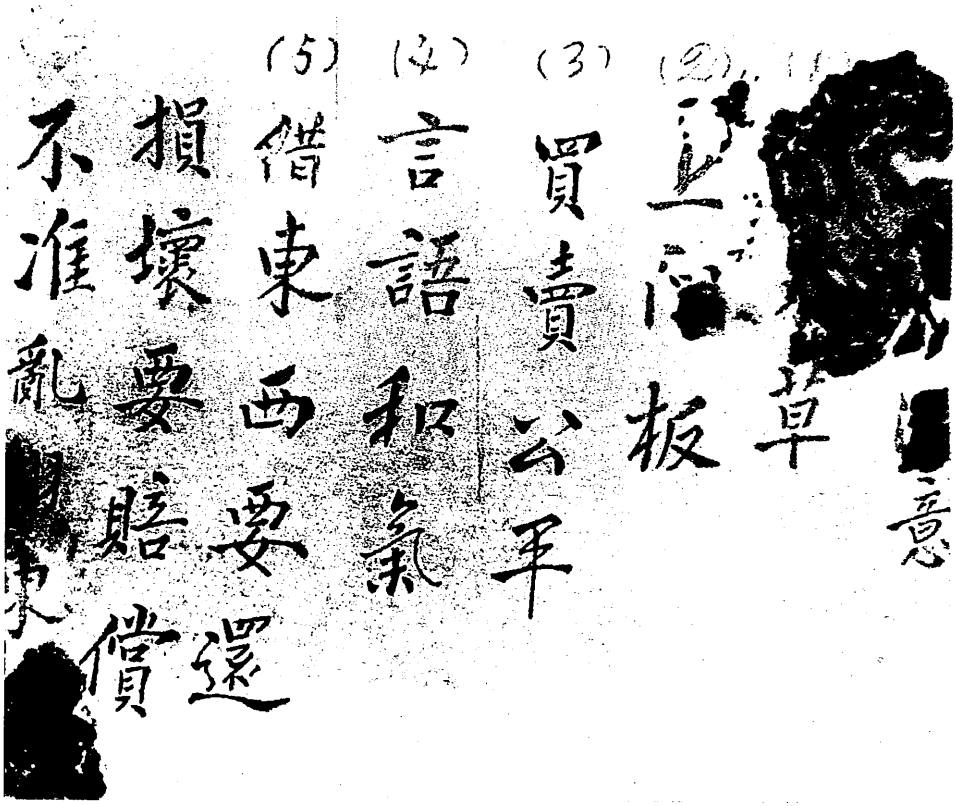
《一九二八年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井冈山会师》（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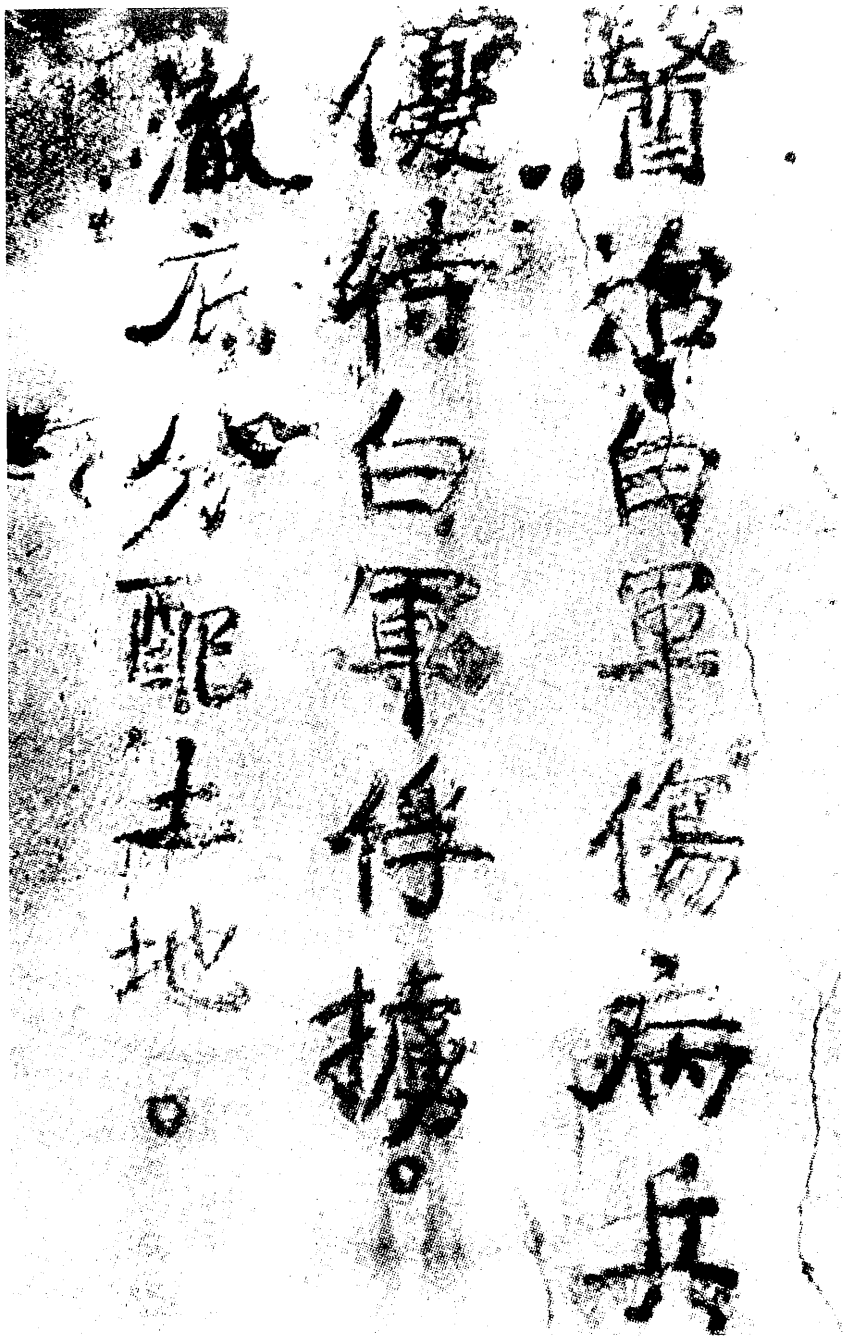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行军途中》（油画）



1928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后，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图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旗。



1928年，毛泽东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图为红军战士写在包袱皮上的“六项注意”。



井冈山斗争期间，毛泽东为部队制定了正确对待俘虏的政策。图为红军战士写的优待俘虏的标语。

给湖南江西省委转中央的信[1]

（1928年6月16日）

一、此间争斗已到很剧烈很阔大的时候了。敌人以十团之众（杨如轩[2]四团、吴尚[3]六团）向我们进攻，地主的挨户团[4]当然在外。茶酃两县的广大的农民群众业已被压下。白色清乡把我们党的组织压得粉碎，茶陵的好些勇敢做事的同志被杀，酃县县委负责人被害。第八军最近与我作战四次，一败三胜，但敌人顽强抵抗，已占领之茶、攸只得完全退出，湘南已无寸土。最近有一次军事胜利[5]，五月杨如轩七十九团及二十七团一营，工兵，大炮队，机关枪连，师部，卫生队，输送队，被打得落花流水，虏获颇多，杨已逃吉安（一说负伤），刘团长（二十七团）死，夺获迫击炮七尊，山炮二尊，光洋二十余担，但敌精锐两团仍是在附近永新县城一带，不

---

[1] 这是红军第四军反对国民党军连续“进剿”期间，毛泽东在江西宁冈茅坪写给中共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转中央的信的一部分。

[2] 杨如轩，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三十一军第二十七师师长。

[3] 吴尚，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集团军第八军军长。

[4] 挨户团，是当时农村武装的一种，它分常备队和非常备队两部分。“挨户”是形容几乎每一户人家都要参加的意思。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地方的“挨户团”被地主所夺取，变成了反革命的武装组织。

[5] 指1928年5月中旬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反对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三次“进剿”期间的草市坳战斗和重新攻占永新县城的战斗。

敢穷追。此间军事布置对湘取守势，对赣取攻势，但目前数日按兵未动，俟查明敌情再行决定。军队中一部分下级军官军事投机的心理尚未除去，常想逃避斗争，跑到赣南去，这已成为党内的一种奋斗，及特委成立，用特委命令才把他们勉强的制止。以宁冈为大本营，其理由有三：A. 此间系罗霄山脉中段，地势极好，易守难攻。B. 党在此间是由无组织进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赤卫队、赤色游击队组织了），弃之可惜。C. 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因此三个理由，我们只有用全部力量与敌人争斗，决无退却抛弃。但山上粮食万难，款子万难，伤兵医药万难，正随时解此难关。

二、吉安来信，始知江西省委已批准湘赣特委之组织（茶陵、攸县、酃县、宁冈、莲花、永新、遂川），批准于五月二十一二两日召集各县代表大会[1]，议决政治问题，政治纪律，暴动口号，政纲，选举负责人（工农分子占多数）。宛希先、毛泽东为常委，朱德、陈毅、刘辉霄为候补常委，暂推毛为书记。泽东此刻在学习时期，实在不能担任。以后两省委及中央之派人即可召集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1. 普遍发展六县之党。2. 发动当地农民的暴动。3. 改造军队变成真正的红军。4. 在军队中建立健强的党。5. 办军校及党校。盼望政治消息，请湘东特委担任政治消息传达，三日一次。取报纸在高陇牺牲营长一、连长二、兵士五十人以上，最后因朱德会攻才获着胜利。6. 四军军委书记今日开始负担。

---

[1] 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中是1928年5月20日。

1928年4月至6月，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打破了国民党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二、三、四次“围剿”。图为红四军第四次反“围剿”龙源口大捷旧址。

1928年5月，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图为湘赣边界党的“一大”会址——茅坪谢氏慎公祠。

1928年5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最高政权机关——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宁冈茅坪成立。图为苏维埃政府旧址。

《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油画）

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

（1928年7月4日）

湖南省委：

袁、杜二位同志于六月三十日同时抵永新，所携省委通告及中央对湖南工作决议案均收到，在省委两信中所指示的前后颇不同，前者要我们继续建设罗霄山脉中段各县政权，以为军事根据地，不更变一个月前中央及省委的指示；后者要我们于攻永新后冲往湘南，以避敌人“会剿”及解决经济上之困难。此间，六月二十三日击溃杨池生后，四军已大部来永新向莲花、安福及吉安之西南端游击，筹款并发动暴动，即于六月三十日晚上由特委、军委、永新县委开联席会议，讨论省委来信，袁、杜二同志皆参加，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做深入的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有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地方巩固，不易为敌人消灭。其理由分述如下：

（一）在四军本身有许多过去习于流寇式的生活，极不愿住定一处艰苦地做群众斗争工作，充满红军冒险的遗毒。近一月来经多方洗刷，同时永新、宁冈二县群众已普遍起来，他们才渐渐死了心，懂得中央及省委上次主张建宁冈大本营的政策是对的。如现在又马上改变使四军重行走徒游动的道路，四军之改造必更困难。前次省

委来信指出四军转战千里，近于流寇，必须择地休息以资改造，此意非常正确，正在遵照执行，不宜轻率变动。

（二）在敌情方面，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赣敌被我连败四次，其胆已裂，且受我释放俘虏影响，军心大摇。计尚能作战者仅王钧之第七师，一师与一团驻萍乡，二团分驻九江、南昌，料其难于抽调，抽调来后且补可用适当战略战而胜之。湘敌则不然，与我交手在五、六次以上，仅能将其小部分击退，而敌毫无所损，顽强如故。故为避免硬战斗，此时不宜向湘南冲击反转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现在湘南敌军所有桂系两师，二十一军，尚成杰一军（三千枪），许克祥一师，吴尚一军，敌乃大于赣西七八倍，我军纵可以胜尚、许，决无法胜吴、桂，我军一去马上在吴、桂、尚、许的包围中，有立被消灭之虞。此点省委似未曾虑及。

（三）宁冈能成为我军事大本营，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且敌人绝对无法把我围着。若加上各县党与群众的基础，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军非常危险。

（四）此种主张绝非保守观念，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此皆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之故。我们此刻力矫此病，一面为军事建立一大本营，一面为湘赣两省暴动前途建立一巩固基础，现我们全力在永新、宁冈工作，日有进步，并向莲花、安福及吉安西南端推进，深入土地革命，创造地方武装，再能有一月工夫，敌人再来进攻，颇有胜利的把握。

（五）从经济上说，四军人数如此之多，每日菜金节俭需要现洋

七百元，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朱部自二月抵耒阳时起，即未能筹到一文，仅靠卖烟土吃饭，此刻到湘南去解决经济困难，乃是绝对的不可能，真正解决目前经济困难，只有在湘赣边才有法想。

（六）伤兵增至五百，若冲往湘南去，则军心瓦解，不去又不能，此亦最大困难问题之一。

根据以上六种实际理由，在新军阀战争未爆发之前，尚不能离开宁、永、莲往湘南。一俟此间基础略固，外面有机可乘，四军自可出茶、攸、浏参加湘省之总暴动。至此时与湘南通讯息，当竭力设法做到，以期彼此呼应，互相为之犄角。

上项意见，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是为至祷。关于军队与地方详细报告容后奉呈。

特委　军委

七月四日于永新城

委来信指出四军转战千里，近于流寇，必须择地休息以资改造，此意非常正确，正在遵照执行，不宜轻率变动。

（二）在敌情方面，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赣敌被我连败四次，其胆已裂，且受我释放俘虏影响，军心大摇。计尚能作战者仅王钧之第七师，一师与一团驻萍乡，二团分驻九江、南昌，料其难于抽调，抽调来后且补可用适当战略战而胜之。湘敌则不然，与我交手在五、六次以上，仅能将其小部分击退，而敌毫无所损，顽强如故。故为避免硬战斗，此时不宜向湘南冲击反转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现在湘南敌军所有桂系两师，二十一军，尚成杰一军（三千枪），许克祥一师，吴尚一军，敌乃大于赣西七八倍，我军纵可以胜尚、许，决无法胜吴、桂，我军一去马上在吴、桂、尚、许的包围中，有立被消灭之虞。此点省委似未曾虑及。

（三）宁冈能成为我军事大本营，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且敌人绝对无法把我围着。若加上各县党与群众的基础，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军非常危险。

（四）此种主张绝非保守观念，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此皆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之故。我们此刻力矫此病，一面为军事建立一大本营，一面为湘赣两省暴动前途建立一巩固基础，现我们全力在永新、宁冈工作，日有进步，并向莲花、安福及吉安西南端推进，深入土地革命，创造地方武装，再能有一月工夫，敌人再来进攻，颇有胜利的把握。

（五）从经济上说，四军人数如此之多，每日菜金节俭需要现洋

七百元，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朱部自二月抵耒阳时起，即未能筹到一文，仅靠卖烟土吃饭，此刻到湘南去解决经济困难，乃是绝对的不可能，真正解决目前经济困难，只有在湘赣边才有法想。

（六）伤兵增至五百，若冲往湘南去，则军心瓦解，不去又不能，此亦最大困难问题之一。

根据以上六种实际理由，在新军阀战争未爆发之前，尚不能离开宁、永、莲往湘南。一俟此间基础略固，外面有机可乘，四军自可出茶、攸、浏参加湘省之总暴动。至此时与湘南通讯息，当竭力设法做到，以期彼此呼应，互相为之犄角。

上项意见，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是为至祷。关于军队与地方详细报告容后奉呈。

特委　军委

七月四日于永新城

湘赣边界特委致湖南省委信*

（1928年8月）

湖南省委：

（1）杜同志来及来信均悉。五月卅日此间军委召集扩大会，由杜同志报告政治情形，并宣读省委来信，扩大会完全接受，对杜同志综合各地实际斗争的教训之报告，亦极重视。关于省委信中应解释者有下列几点：A. 实力……但以游击战争汇合湘南湘东赣西赤色努力，唯力是视，不过行动应侦察敌情，才能决定。B. 以少数武装编成独立团营的错误，亦极接受，不过此间并未曾做过。C. 此间系朱毛部及湘南农军而成，现在湘南农军已回去活动，原系□师编制，后改为□团，取消师部，组织军部，直接指挥。

（2）省委指出焚烧城市的错误，此间决不再犯。

（3）军中的党在形式上已普遍组织，组织形式上照国民党革命军的党之组织。

（4）军中CY组织，在过去湘南特委指示要成立，数月的经验，在工作方面感觉许多不便，在四军CY第二次大会决定合并。此次扩大会亦认为有合并的必要，不过非局部所能解决，须有省委作最后之决定，但此主张与取消派不同，CY有干事会，可以尽量参加工作。

（5）改造军队，洗刷流氓无产阶级当尽力去做。

（6）废除饷银制度，此间早有计划，但事实上兵士生活困难，兵士之耐劳艰苦，颇属难得。

（7）请派大批安源矿工来此当兵。

（8）军委成立，省委指定泽东为主席，此节似无必要，因此间地方工作，需人尤其迫切，军委组织亦无完善，书记为陈毅同志，此节未执行。

（9）湘南特委随军到资兴，取道安仁回衡阳，宜郴负责人已回去。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

（1928年10月5日）

一　国内的政治状况

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2]，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

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3]，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一部分，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

[2]　毛泽东在这里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在1935年12月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1939年12月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于买办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曾作了详细的说明。

[3]　蒋派指蒋介石派。桂派指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派。冯派指冯玉祥派。阎派指山西军阀阎锡山派。他们曾经联合对张作霖作战，于1928年6月占领了北京和天津。

一个对张作霖[1]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

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从广东出发向长江发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暂时的失败。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此次失败中，受到很大的打击，中国资产阶级（非买办豪绅阶级）也受了打击。但最近数个月来，工农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组织的城市罢工和农村暴动，在南北各地发展起来。军阀军队中的士兵因饥寒而酝酿着很大的不安。同时资产阶级在汪精卫、陈公博一派鼓动之下，亦在沿海沿江各地发展着颇大的改良主义运动[2]。这种运动的发展是新的事实。

---

[1] 张作霖（1875—1928），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首领。1924年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打败后，张作霖成为北方最有势力的一个军阀。1926年他联合吴佩孚入据北京。1928年6月，他从北京退回东北，在路上被向来利用他做工具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炸死。

[2]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及蒋介石公开对日妥协之后，曾经追随蒋介石参加1927年反革命政变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因为自己的利益，开始逐步形成蒋介石政权的在野反对派，他们既不满意蒋介石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统治，又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他们发动了一个改良主义运动，幻想在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之外，另找一条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当时，同蒋介石争权夺利的汪精卫、陈公博等政客，曾在这个运动中进行投机活动，形成了国民党中的所谓“改组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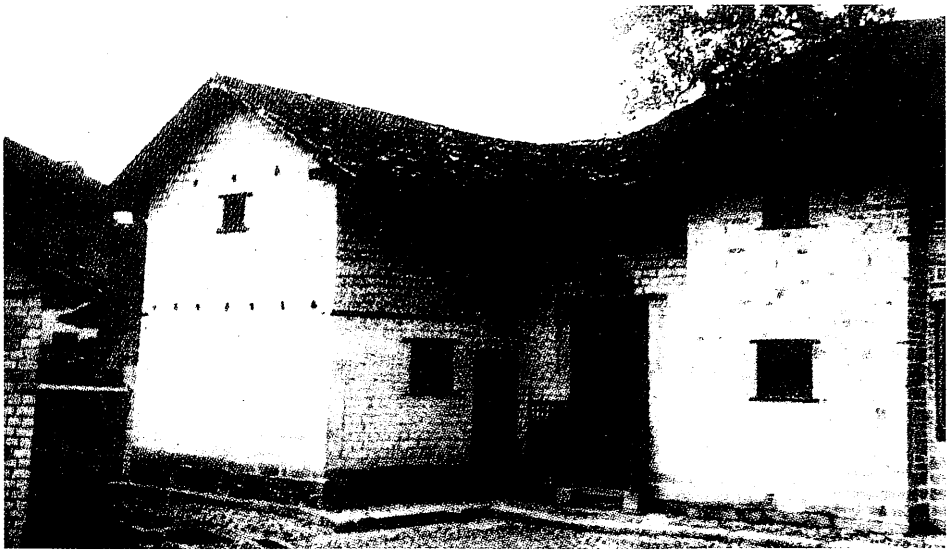
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这种革命的实际运动，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以后，是一天一天在发展的。

二　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1]，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

---

[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原来属于英、美、法、荷各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方许多殖民地，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占领，那里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及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共产党领导下，利用英、美、法、荷各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组织了反法西斯侵略的广泛统一战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已开始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政治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逐出，英、美、法、荷各帝国主义企图继续原来的殖民地统治，但各殖民地人民已在抗日战争中锻炼出了一种相当有力的武装力量，他们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而由于苏联的强大，由于除美国以外的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在战争中或被推翻或被削弱，更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帝国主义阵线在中国被突破，因而使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已在世界上发生很大的动摇。这样，就使东方各殖民地至少是某些殖民地的人民也和中国差不多一样地有可能长期坚持大小不一的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有可能长期坚持由乡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并有可能由此逐步推进而取得城市、取得该殖民地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根据这种新的情况，毛泽东于1928年对于在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条件下这一个问题上所作的观察，已有了改变。



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部著作。图为毛泽东撰写这两部名著的地方——茅坪八角楼。

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

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所以广州产生过三天的城市民众政权，而海陆丰、湘东、湘南、湘赣边界、湖北的黄安等地都有过农民的割据[1]。至于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分来。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

---

[1]　这是指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各地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最初爆发起来的对反革命势力的反击行动。在广州，1927年12月11日，工人和革命士兵在一部分市郊农民的配合下联合起义，建立过为时3天的人民政权。广东省东部沿海的海丰、陆丰等地的农民，在1927年5月和9月举行起义，都曾经建立过革命政权；在这年10月举行的起义中建立的革命政权，一直坚持到1928年3月。在湖南省东部，1927年9月，起义的农民曾经占据过浏阳、平江、醴陵、株洲一带，醴陵农民并于1928年2、3月间建立过农村革命政权。湖北省东北部的黄安（今红安）、麻城等地的起义农民，曾经在1927年11月占领黄安县城，建立革命政权20多天。在湖南省南部，1928年1月，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等县的起义农民，建立过革命政权达3月之久。

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1]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第五，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三　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的失败

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但军阀之间的战争不是每天不停的。每当一省或几省之间的白色政权有一个暂时稳定的时候，那一省的统治阶级或几省的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用尽力量来消灭这个

[1]　赤卫队是革命根据地中群众的武装组织，不脱离生产。

红色政权。在为建立和坚持红色政权所必须的各种条件尚不完备的地方，便有被敌人推倒的危险。本年四月以前乘时而起的许多红色政权，如广州、海陆丰、湘赣边界、湘南、醴陵、黄安各地，都先后受到白色政权的摧残，就是这个道理。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军队，随时都有八九个团以上的兵力，多的到过十八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的组织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原因就在于湘赣边界的共产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党的特委和军委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1]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因为这些策略的适当，加上地形之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军队之不尽一致，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中的各次胜利。虽以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并且不能阻止此割据的日益扩大，此割据对湘赣两省的影响则有日益加大之势。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侯，反而采取统治阶级政治破裂时候的战略，分兵冒进，致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同志不察当时环境，不顾特委、军委及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意见，其错误实在

[1] 罗霄山脉是江西、湖南两省边界的大山脉，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

非常之大。这种失败的形势，因为九月以后特委和军委采取了纠正错误的步骤，而挽救过来了。

四　湘赣边界的割据局面在湘鄂赣三省的地位

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使边界土地革命和民众政权的影响远及于湘赣两省的下游乃至于湖北；使红军从斗争中日益增加其数量和提高其质量，能在将来三省总的暴动中执行它的必要的使命；使各县地方武装即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的数量增加质量提高起来，此时能够与挨户团和小量军队作战，将来能够保全边界政权；使地方工作人材逐渐减少依靠红军中工作人材的帮助，能完全自立，以边界的人材任边界的工作，进一步能够供给红军的工作人材和扩大割据区域的工作人材——这些都是边界党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任务。

五　经济问题

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1]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

[1]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小资产阶级，是指农民以外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各种自由职业者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中国的这类社会成分主要在城镇，但在乡村中也占有相当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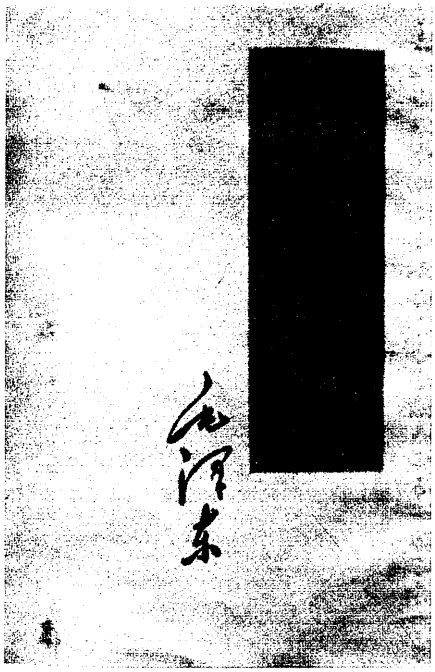
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这种困难，在全国总政权没有取得以前当然是不能免的，但是这种困难的比较地获得解决，使生活比较地好一点，特别是红军的给养使之比较地充足一点，则是迫切地需要的。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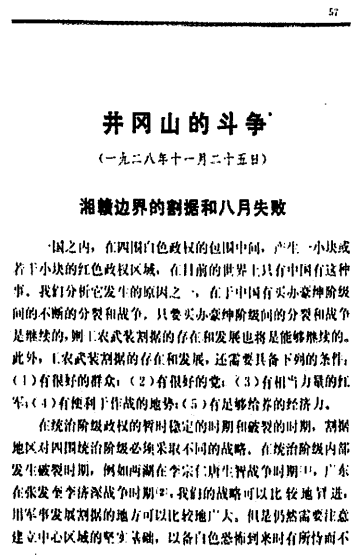
六　军事根据地问题

边界党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大小五井[1]和九陇两个军事根据地的巩固。永新、酃县、宁冈、遂川四县交界的大小五井山区，和永新、宁冈、茶陵、莲花四县交界的九陇山区，这两个地形优越的地方，特别是既有民众拥护、地形又极险要的大小五井，不但在边界此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就是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的将来，亦将仍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巩固此根据地的方法：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把这三件事切实做好，是边界党应该努力的。

---

[1]　大小五井山区，指介于江西西部的永新、宁冈、遂川和湖南东部的酃县4县之间的井冈山，井冈山上有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等地。





57

井冈山的斗争*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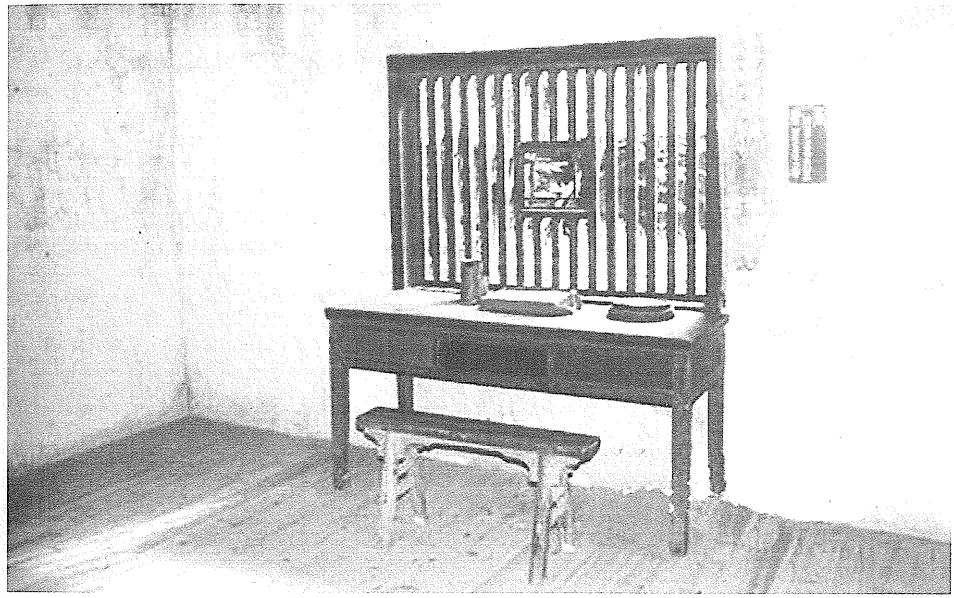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我们分析它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在统治阶级政权的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割据地区对四围统治阶级必须采取不同的战略。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例如两湖在李宗仁唐生智战争时期中，广东在张发奎李济深战争时期中，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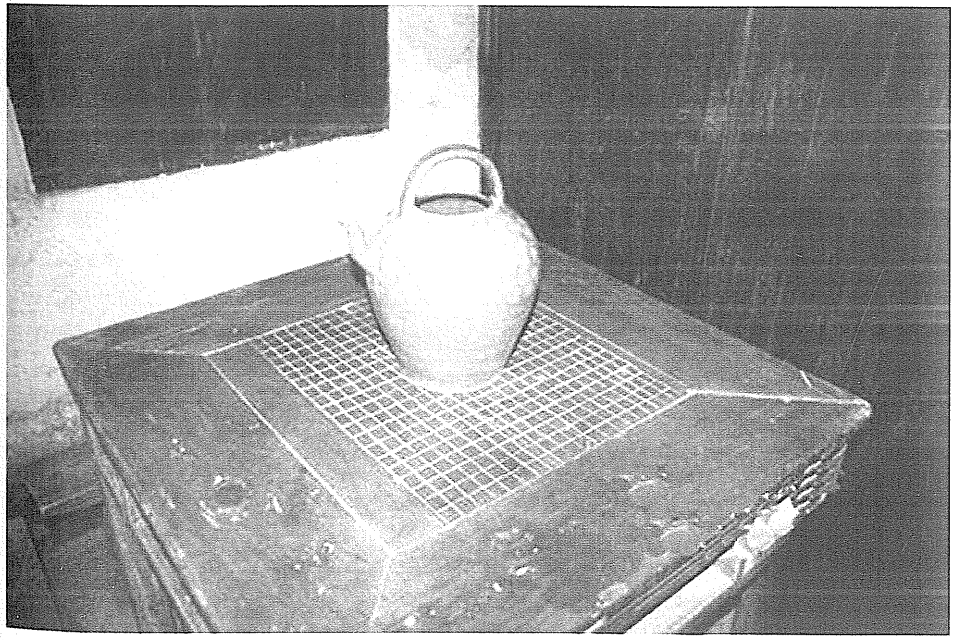
* 这是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撰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部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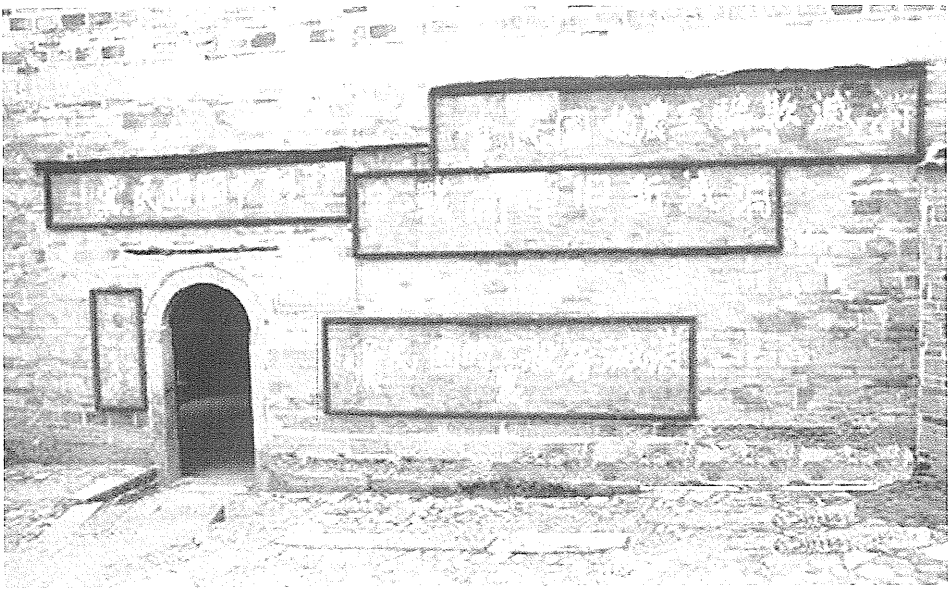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八角楼》（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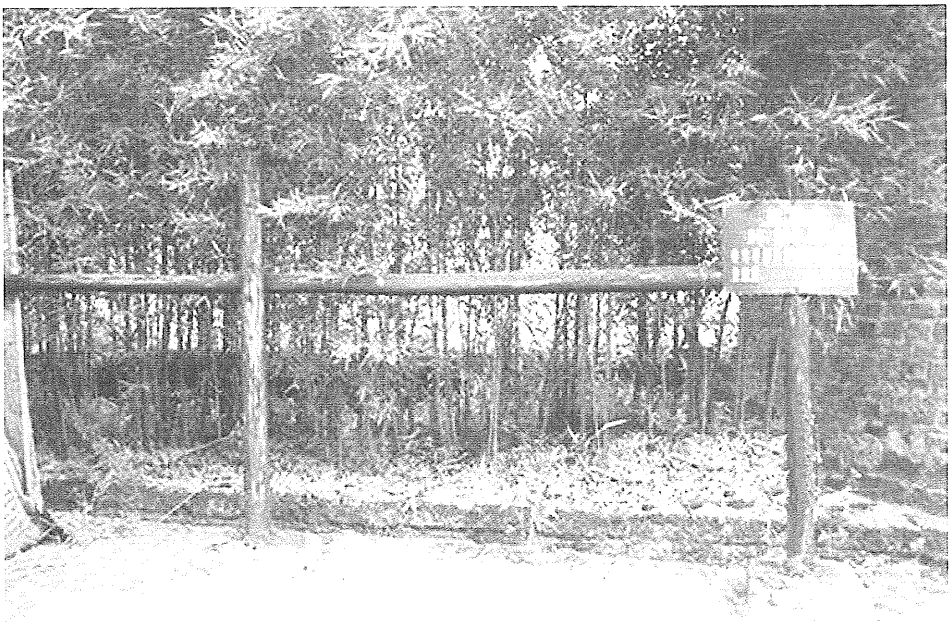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八角楼办公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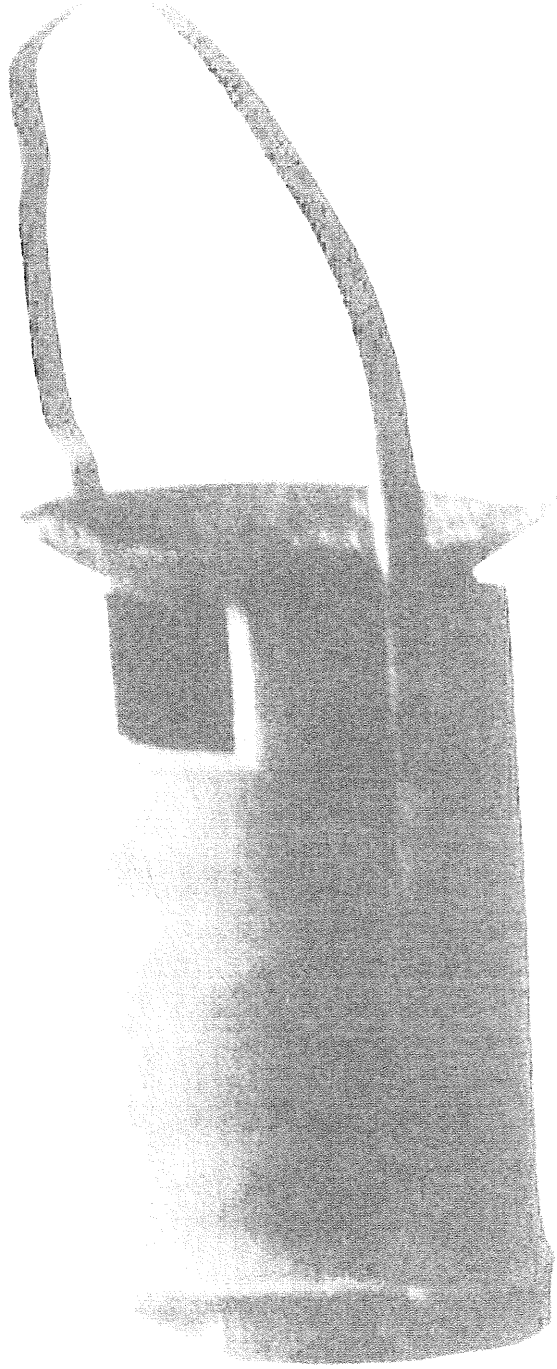
毛泽东和朱德在八角楼空闲时下棋用的四方桌。



八角楼的墙上还有当年红军战士写的几条标语。据老同志回忆，这些标语是当年贺子珍带着红军宣传队书写的。



八角楼内的大院里，至今仍保留着毛泽东、朱德当年使用过的拴马桩。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使用过的油灯。

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1928年10月5日）

政治问题及边界党的任务

（内容参见《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

边界各县党的改选与建议

边界特委是最近四个月才产生的，在此短短的期间内，虽然曾领导工农红军做过了“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及给旧社会以伟大的破坏等工作，但因为边界是个农村经济的环境，加之党的历史很短，独立斗争很少（因为有红军可靠），故机会主义的遗毒、农民党的倾向，在边界各级党部中表现出特别可怕的色彩。指出过去一切党内的错误，洗刷党内机会主义的遗毒，改造各级党部，使之走上真正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是今后各级党部重要的责任。

攸县的党到现在还未建立。其他各县党的影响亦只及各该县之大部或一部，并未建立坚实的中心区域及普遍发展到四处的广大群众中去。故建立攸县的党和各县的坚实中心区域及普遍建立各县党

的基础，同样是边界党部今后的重要责任。

一　过去党的错误

1. 过去各县党中机会主义遗毒太深，依靠军队而不领导群众作独立斗争，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2. 过去各县的党，很有农民党的色彩，有走上非无产阶级领导的倾向，永新的党要公开脱离特委，成立“独立国”。其他各县，如宁、酃、莲等县亦不注意向特委作报告，以与特委发生关系。这都是组织上很严重的错误。

3. 过去党的机关，在上半期是个人专政，书记独裁，完全没有集体领导及民主的精神。如特委只有毛泽东一人，永新县委只有刘珍一人，以致客观上群众发生只认识个人不认识党的误解。这完全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党。紧急会议中虽然很严重地指出了这种错误，特委经常有三个常委驻会指示工作，但各科及秘书等机关，因人才缺乏之故，仍然无法建立，加之特委工作人员病者极多，政治时生变化，各县委与特委的关系不能密切，故特委本身反对各级总部的指示，仍然没有尽量执行紧急会议之决定。

4. 指导机关，多数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对于提拔工农分子参加指导机关，缺乏注意。

5. 过去党的组织扩大，完全只注意数量的发展，没有注意质量上的加强。党与阶级没有弄清楚，而只是拉夫式的吸收办法。这样将使党的组织破底，其结果必变成不能斗争的党。

6. 过去党没有注意基本组织——支部。

7. 过去党的工作方式不对。党的一切问题应该集权于常委会，

组织科、宣传科等不过是常委会的技术机关。但是边界的党，不但没有集权到常委会，甚至连组织科都没有，而仅是书记一人的独裁，紧急会议后，特委本身及永新县委比较好点（由常委会决定各项工作），但特委以下之各级党部，仍然犯同样的毛病，一点都没有改正。

8. 过去边界各县的党太没有注意秘密工作，以致养成极大部分党员不懂秘密工作，在夺取政权时，就全部公开出来；在失掉政权时，就去“打埋伏”。

9. 过去工作，上级与下级隔开，下级对上级也没有很好地巡视和指导。党只偏重机关工作，犯了与群众隔离的错误。

10. 过去党太少注意城市工作和工人运动。

11. 过去特委只注意军事范围的布置，如宁岗、永新两县工作，没有顾及全部，以致成为军队附属品。如军队打到某县，就注意某县的工作，军队没有到某县，某县的工作就不注意了。

12. 过去党太不注意团的工作，甚至有取消团的倾向。

二　今后党的改造与建设

1. 党必须彻底改造，从支部改造起，肃清组织上和政策上机会主义的领导。

2. 特委县委都须有四个以上的巡视员，经常指导下级工作，帮助各级党部改造。

3. 尽量提拔工人同志到指导机关，各级执委会、常委会都须有过半数的工农同志参加，提拔工农分子，特别要注意教育的意义。

4. 各级党的机关，必须组织健全，反对个人领导，一切权力集中常委会，各科都是技术机关。

5. 在党的改造当中，应完全站在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极力注意讨论和执行党的新政策，坚决与过去党的小资产阶级、自由独立、浪漫的分子[1]，严密防止“独立国’的倾向。

6. 党应该扩大民主化到最高限度，一切政策都要党员热烈讨论，深切了解，使党员群众能根据政策定出工作计划。各级党部委员及书记应尽量用选举办法产生。

7. 党员成分必须是先进的觉悟的忠实的勇敢的贫苦工农分子，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农须严格限制。

8. 党的发展，特别注意质量，在介绍党员当中，介绍者应对被介绍者做许多宣传和考查工作。凡介绍一个新同志应在一个支部会议上通过，经过区委批准，反对拉夫式的吸收党员，必须使每个党员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员，党的组织不必求其普遍，应特别注意造成坚实中心区域党的基础。

9. 党要注意党的基本组织——支部，实现“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同时要特别注意城市支部工作，并提拔很好的工人同志尽量当农村支部书记及委员，增加工人领导力量，严格防止农民党的倾向，在乡村中的党员，须选出先进分子，加以特别训练，以培养成党的中坚。

10. 党的组织应绝对秘密，各级党部每个党员，应当极力注意秘密工作，反对依靠军事政治势力去组织党，应在敌人范围内秘密组织党，反对逃跑和“打埋伏”。

11. 特委应极力注意使本身和各县委健全，攸县县委应马上建设，对于边界各县党的工作应有整个的布置。

---

[1] 原文如此，疑缺内容。

12. “铁的纪律”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精神，只有如此，才能仰止党走向非无产阶级的道路，消灭机会主义分子，洗刷不斗争的腐化分子；只有如此，才能集中革命先进分子的力量团集在党的周围，使党壁堡森严、步伐整齐地成为强健的斗争组织；只有如此，才能增加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所以严格的执行纪律为改造与建设党中央的重要工作。

三　各县工作问题

各县工作详细计划由特委负责讨论。

四　农村斗争问题

1. 过去农村斗争，并没有坚决执行“土地革命”。所谓分田，完全不是适应贫苦雇农的彻底要求，而只是站在富农、中农、贫农的调和观点上去平均分配的，这是过去一种重大的错误。

2. 过去我们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并没有施行严厉的赤色恐怖，杀戮地主豪绅及其走狗（上花茶陵比较好点）。

3. 过去在乡村赤色政权之下，太忽略农村中富农、中农、贫农之间的阶级斗争，以致在白色恐怖之下，贫农无团结无力量，富农反水，中农动摇。

4. 我们今后农村斗争整个的策略是：团结贫农，抓住中农，深入土地革命，厉行赤色恐怖，毫不顾惜地杀戮地主豪绅及其走狗，用赤色恐怖手段威胁富农，使不敢帮助地主阶级。

5. 根据这个策略，我们应即组织：（1）雇农工会（贫苦的佃农

加入此组织），以此团结雇农，加强雇农的力量，以为乡村中的主干。（2）赤杀队或暴动队，在白色恐怖之下，以最勇敢的工农分子组织之。赤杀队以五人或七人为一队，实行黑夜游击，造成乡村中的赤色恐怖。在夺取政权时，赤杀队可改变为赤卫队。（3）在工农群众中选举勇敢分子组织暴动队，发展农村暴动，夺取乡村政权.

五　工人运动问题

1. 工人是各种劳动群众之先锋，是各种劳动群众的领导者，过去没有注意工人运动，工人领导更是说不上，以致造成农民党的倾向，这是党的一种重大危机。

2. 农村手工业工人及城市工人，我们党须用大的力量去组织工会，领导工人由零碎经济斗争进而武装暴动，纠正过去忽视工人运动的错误。

3. 各级党部各级苏维埃，应极力提拔工人，使之能站在领导地位，领导斗争。

六　兵士运动问题

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政策，在执行中必须将工农兵三种力量很好配合起来，然后暴动才有胜利的可能，因为中国的“民权革命”尚未实现，故军阀豪绅买办阶级得以运用封建关系愚弄工农而雇用之，以为保护他们的工具，故现在的士兵有大多数尚安心在敌对阶级指挥之下过饥寒交迫（敌军有几年未发过饷的）的生活。但在国民党未叛变之前，国民革命军相当地

都受了一点“阶级斗争”的宣传。至于事变以后，投入军营的（农灾协或工会的办事人）当然更有觉悟。这些觉悟分子在反动军官高压严密的防范下，而又苦于找不着领导者，故不敢轻易在反动军营中做宣传组织工作，实则他们的革命情绪，反水志愿是很丰富的，这可以证明在客观上的士兵运动的可能性，实在已经具备了。而且此运动的成功，在湖南、广东等省，已有事实可据。现在反动统治的屏障，完全是靠几百万尚未觉悟的国民革命军，我们士兵运动做得好，则反动统治很迅速地便要倒台，反之，我们不注意士兵运动而只专门做农民工作，则中国的革命，永久也不会成功的。

边界各级党部向来少注意士兵工作而只顾工农运动（有些党部还仅只有农民工作）。须知我们过去许多失败的经验，主要原因是没有士兵运动参加暴动（如去年广东的年关暴动、湖南屡次的暴动失败……），现在如再不注意，则将来的失败便可预言。很明显的，现在单靠边界主观的方量，妄想打出一个天下，或造成更大的割据是不可能的，所以各级党部必须努力进行士兵运动。莫忘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政策，是要将工农兵三种势力配合起来才有可能的。

1. 士兵运动此时与工农运动同样重要，各县应有计划有组织地选派大批工农同志去反动军队内当兵、当夫、当伙头……在敌兵内部起作用。尤其是永新、茶陵、辽川等大部敌兵汇集的县分，要特别注意此项工作。

2. 加紧对敌兵的宣传工作。

3. 派人到敌人内部去组织党，不要组织士兵委员会，以免组织复杂而易于惹起敌军军官之发觉。

4. 利用灰色同志及农村妇女，向敌兵做口头宣传和煽动工作。

5. 造谣、恐怖煽动，以动摇敌军人心，由动摇而瓦解。

七　宣传问题

1. 过去边界各县的党，太没有注意宣传工作，妄以为只要几支枪就可以打出一个天下，不知道共产党是要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同时在各项工作中（如组织苏维埃、暴动队，分田，组织党等工作），完全不宣传其方法和意义，只是利用军事政治势力去逼着做，“不做就杀”。这是一种最严重的错误。

2. 特委县委宣传科，应设法使之健全，每周标语宣传大纲，都须按期发出，每日壁报亦应发给各级党部缮写张贴。各游击队出发游击，都须有很好的宣传（群众大会——化装讲演、宣传队、个别宣传）。

3. 以后下级党部对上级党部工作报告，须有宣传工作的报告。上级巡视和检查下级工作时，亦须注意宣传工作的检阅。特委县委每周应有宣传大纲发给各下级党部。

4. 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应极力分析军阀内部的冲突，注意反对军阀混战的宣传工作。同时，应极力宣传工农及共产党的力量之伟大，说明军阀混战其结果必被工农暴动所消灭。

5. 我们目前对一般工农群众的宣传，须极力揭破军阀及豪绅欺骗工农政策，多发表本党的主张。

6. 苏维埃、土地革命、共产主义、红军、暴动队，都须制定专门宣传纲要，加紧宣传，深入到群众脑海中。

7. 此时我们应对同志和群众，详细分析统治阶级与政治上经济上之矛盾与冲突，极力宣传工人农民本身力量及各地暴动的势力，

打破灰心没有希望的失败观念，同时要打破同志及群众专门依靠军队的等待观点（自然我们不否认军队发动暴动与帮助工农暴动的力量）。

八　训练问题

1. 过去各地党之所以没有力量，就是因为党员没有训练，甚至入党式都没有过，现在每个党员都须加以党的基本理论的训练。

2. 特委组织教宣委员会，制定训练材料，计划每周训练工作。

3. 特委要办经常训练班，各县亦应尽量多办短期训练班，造成干部人才。

4. 各级党部的会议及实际工作当中，应极力提拔工农分子，训练工农分子及干部人材。

5. 目前基本训练工作，应竭力铲除一般同志的机会主义思想和封建小资产阶级思想，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

6. 增高同志的文化程度政治教育，同时要作识字运动，以提高工农同志的“写”“看”能力。

九　苏维埃问题

1. 过去苏维埃政府差不多完全是农民协会的变形，所以它的工作，是秘书长和主席包办，甚至有些政府还是富农当权，或为知事衙门。这些所谓苏维埃政府，应一律改组。

2. 由特委制定苏维埃组织法，各县各区各乡苏维埃，应一律照组织法组织之。

3. 苏维埃必须以工人贫农革命兵士为主要力量。反对富农秘书

长把持，实现一切政权归苏维埃。

4. 湘赣边界政府重新彻底改造。

5. 各级党部与各级苏维埃的关系要弄清楚，免除党即政府的弊病。关于党与政府不同，特委须发一通告，各级党部要作普遍宣传。

十　土地问题

接受中央对土地问题的通告，交特委讨论，作最后决定。

十一　CY问题

1. 青年团是党在工农群众中的政治组织，过去边界各级团部多不明了青年团的政治任务，团在边界各县仅只作了些扩大影响的文化运动，事实上成了党的附属机关，因此造成边界各级党更严重的错误——主张取消团。

2. 目前边界各县应当是建设团的工作，但是团的本身力量薄弱，很难单独担负起这个责任，各级党部必须划出一部分力量，经常注意团的工作，帮助团在边界各县普遍地建设团的支部，扩大团的组织，健全团的指导机关。

3. 团的经费应该独立，以便团在工作上能够措置如意，避免团在经费上依赖党的观念。

4. 注意团的工作，是各级党部应有的责任。今后各级党部向上级报告中，必须有“团工作”的一项。上级巡视员在检查各级工作中，亦须留心团的工作。

5. 各级党部、团部多不明了党与团的关系，以致发生各干各的倾向。

挽王尔琢联[1]

（1928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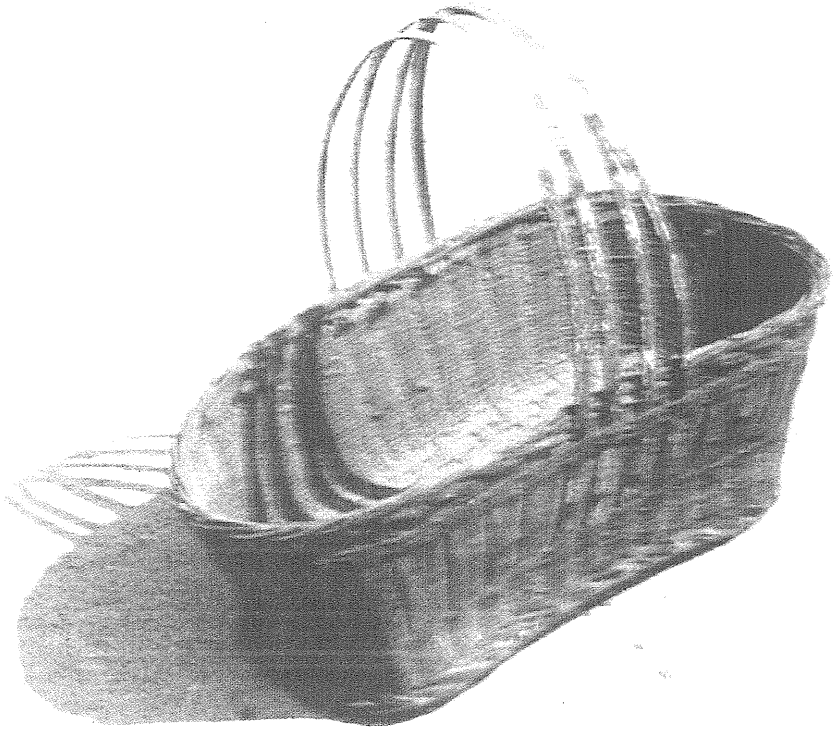
一哭尔琢，再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

[1] 王尔琢（1901—1928），字蕴琰，湖南省石门县商溪乡王官桥村人，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又参加湘南暴动。1928年4月上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部队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参谋长兼红军第二十八团团长。1928年8月25日，追赶叛徒时，在江西省崇义县思顺墟被叛徒袁崇全枪杀。王尔琢牺牲后，朱德赶到思顺墟现场，痛哭和悼念战友。10月上旬，在宁冈砻市举行追悼会。追悼会前毛泽东在宁冈县茅坪村八角楼起草，由陈毅书写了这副挽联，挂在会场两边。

为了改善根据地医疗条件，根据湘赣边特委决定于1928年10月，在井冈山西北的小井兴建一座红军医院。图为小井红军医院旧址。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给伤员送饭用过的篮子。

西江月·井冈山[1]

（1928年秋）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2]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3]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4]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

[1] 井冈山，在江西西部及湖南东部，方圆500里。

[2] 鼓角，本指古代军中所用的战鼓和号角，此处借指军号。

[3] 岿然，高峻独立。

[4] 黄洋界，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另4个是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

《革命圣地井冈山》（诗意画）

井冈山的斗争[1]

（1928年11月25日）

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我们分析它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在统治阶级政权的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割据地区对四围统治阶级必须采取不同的战略。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例如两湖在李宗仁唐生智战争时期[2]，广东在张发奎李济深战争时期[3]，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

[1] 这是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2] 这个战争发生于1927年10月，到第二年3月结束。

[3] 这个战争发生于1927年11月，到第二年2月结束。

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若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例如今年四月以后的南方各省，则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各地许多小块红色区域的失败，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有错误。至于策略之所以错误，全在未曾把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这两个不同的时期分别清楚。有些同志在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也主张分兵冒进，甚至主张只用赤卫队保卫大块地方，好像完全不知道敌人方面除了挨户团之外还有正式军队集中来打的一回事。在地方工作方面，则完全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的基础，不顾主观力量的可能，只图无限量的推广。如果遇到什么人在军事方面主张采取逐步推广的政策，在地方工作方面主张集中力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求自立于不败之地，则谥之曰“保守主义”。他们的这种错误意见，就是今年八月湘赣边界失败以及同时红军第四军在湘南失败的根本原因。

湘赣边界的工作，从去年十月做起。开头，各县完全没有了党的组织，地方武装只袁文才、王佐各六十枝坏枪在井冈山附近，永新、莲花、茶陵、酃县四县农民自卫军枪枝全数缴给了豪绅阶级，群众革命情绪已经被压下去了。到今年二月，宁冈、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党的县委，酃县有了特别区委，莲花亦开始建立了党的组织，和万安县委发生了关系。地方武装，除酃县外，各县都有了少数。在宁冈、茶陵、遂川、永新，特别是遂川、永新二县，进行了很多次打倒豪绅、发动群众的游击暴动，成绩都还好。这个时期，土地革命还没有深入。政权机关称为工农兵政府。军中组织了

士兵委员会[1]。部队分开行动时，则组织行动委员会指挥之。这时党的高级指导机关，是秋收起义时湖南省委任命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三月上旬，前委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而取消，改组为师委（何挺颖为书记），变成单管军中党的机关，对地方党不能过问。同时毛部又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调往湘南，遂使边界被敌占领者一个多月。三月底湘南失败，四月朱、毛两部及湘南农军退到宁冈，再开始边界的割据。

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反动军队，至少有八九个团，多的时候到过十八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了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和军委（陈毅为书记）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因为这些策略的适当，加以边界地形的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军队的不尽一

[1] 红军中的士兵代表会议和士兵委员会是为了发扬军队内部民主而建立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后来被废除了。1947年新式整军运动开始以后，在人民解放军中，根据红军时期和新式整军运动中的经验，又在连队中建立过干部领导的士兵会和士兵委员会的制度。

致，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虽以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且亦不能阻止此割据的发展。此割据对湘赣两省的影响，则有日益扩大之势。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成分是宜章农民）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

原来七月中旬，湖南敌人第八军吴尚侵入宁冈，再进永新，求战不得（我军从间道出击不值），畏我群众，仓卒经莲花退回茶陵。这时红军大队正由宁冈进攻酃县、茶陵，并在酃县变计折赴湘南，而江西敌人第三军王均、金汉鼎部五个团，第六军胡文斗部六个团，又协力进攻永新。此时我军只有一个团在永新，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之下，用四面游击的方式，将此十一团敌军困在永新县城附近三十里内至二十五天之久。最后因敌人猛攻，才失去永新，随后又失去莲花、宁冈。这时江西敌人忽然发生内讧，胡文斗的第六军仓皇退去，随即和王均的第三军战于樟树。留下的赣军五个团，亦仓皇退至永新城内。设我大队不往湘南，击溃此敌，使割据地区推广至吉安、安福、萍乡，和平江、浏阳衔接起来，是完全有可能的。大队已不在，我一团兵复疲惫不堪，乃决留一部分会同袁、王两部守井冈山，而由我率兵一部往桂东方向迎还大队。此时大队已由湘南退向桂东，八月二十三日我们在桂东得到会合。

红军大队七月中刚到酃县时，第二十九团官兵即因政治动摇，欲回湘南家乡，不受约束；第二十八团反对往湘南，欲往赣南，但也不愿回永新。杜修经导扬第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队遂于七月十七日由酃县出发，向郴州前进。七月二十四日与敌范石生战于郴州，先胜后败，撤出战斗。第二十九团随即自由行动，跑向宜章家乡，结果一部在乐昌被土匪胡凤章消灭，一部散在郴宜各地，不知所终，当日收集的不过百人。幸主力第二十八团损失不大，于八月十八日占领桂东。二十三日，会合从井冈山来的部队，议决经崇义、上犹重回井冈山。当到崇义时，营长袁崇全率一步兵连一炮兵连叛变，虽然追回了这两个连，但牺牲了团长王尔琢。八月三十日敌湘赣两军各一部乘我军欲归未归之际，攻击井冈山。我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这个根据地。

此次失败的原因是：（1）一部官兵动摇思家，失掉战斗力；一部官兵不愿往湘南，缺乏积极性。（2）盛暑远征，兵力疲惫。（3）从酃县冒进数百里，和边界失去联系，成了孤军。（4）湘南群众未起来，成了单纯的军事冒险。（5）敌情不明。（6）准备不好，官兵不了解作战的意义。

割据地区的现势

今年四月以来，红色区域逐渐推广。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永新宁冈交界）一战，第四次击破江西敌人之后，我区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是为边界全盛时期。在红色区域，土地大部分配了，小部在分配中。区乡政权普遍建立。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都有县政府，

并成立了边界政府。乡村普遍组织了工农暴动队，区县两级则有赤卫队。七月赣敌进攻，八月湘赣两敌会攻井冈山，边界各县的县城及平原地区尽为敌据。为虎作伥的保安队、挨户团横行无忌，白色恐怖布满城乡。党的组织和政权的组织大部塌台。富农和党内的投机分子纷纷反水[1]。八月三十日井冈山一战，湘敌始退往酃县，赣敌仍盘踞各县城及大部乡村。然而山区是敌人始终无法夺取的，这在宁冈有西北两区，在永新有北乡的天龙区、西乡的小江区、南乡的万年山区，在莲花有上西区，在遂川有井冈山区，在酃县有青石冈和大院区。七、八两月，红军一个团配合各县赤卫队、暴动队大小数十战，仅失枪三十枝，最后退入山区。

我军经崇义、上犹向井冈山回军之际，赣南敌军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追至遂川。九月十三日，我军击败刘士毅，缴枪数百，占领遂川。九月二十六日回到井冈山。十月一日，与敌熊式辉部周浑元旅战于宁冈获胜，收复宁冈全县。此时湘敌驻桂东的阎仲儒部有一百二十六人投入我军，编为特务营，毕占云为营长。十一月九日，我军又击破周旅一个团于宁冈城和龙源口。翌日进占永新，随即退回宁冈。目前我区南自遂川井冈山南麓，北至莲花边界，包括宁冈全县，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成一南北狭长的整块。莲花的上西区，永新的天龙区、万年山区，则和整块不甚连属。敌人企图以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消灭我们的根据地，我们正在准备打破敌人的进攻。

军事问题

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

[1]　“反水”，意为叛变。

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这种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问题也就非常地繁复和严重。

边界红军的来源：（一）潮汕叶贺旧部[1]；（二）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2]；（三）平浏的农民[3]；（四）湘南的农民[4]和水口山的工

---

[1] 即1927年8月1日在南昌起义的叶挺、贺龙的旧部。这些部队在潮州、汕头一带失败后，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继续在广东坚持斗争，另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等率领退出广东，经福建、江西，转入湖南南部，会合当地农军举行湘南起义，开展苏维埃运动。起义失败后，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2] 指1927年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它的干部有很多是共产党员。汪精卫等叛变革命以后，这个警卫团在8月初离开武昌，准备到南昌参加起义军。行至中途，闻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就转到修水，同平江、浏阳的农军会合。

[3] 湖南平江、浏阳一带在1927年春已经形成相当有力的农民武装。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事变（即“马日事变”），屠杀革命群众。为了向反革命还击，浏阳的农军，同长沙附近其他各县的工农武装一起，曾经向长沙前进。在进军途中，由于中共湖南省委传达了中共中央撤退农军的命令，其他各县工农武装都向后撤退，只有浏阳农军未接到命令，一直攻到长沙城下，遭到失败后撤退。7月中旬，这支农军同平江的农民武装会合。9月又与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安源工人武装等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毛泽东领导下，于修水、铜鼓、平江、浏阳一带举行秋收起义。10月，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

[4] 1928年初，朱德、陈毅率部在湘南开展革命游击战争，原来农民运动有基础的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5县，这时都组织了农军。后来这部分农军由朱德、陈毅率领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

人[1]；（五）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六）边界各县的农民。但是叶贺旧部、警卫团和平浏农民，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只剩下三分之一。湘南农民，伤亡也大。因此，前四项虽然至今还是红军第四军的骨干，但已远不如后二项多。后二项中又以敌军俘虏为多，设无此项补充，则兵员大成问题。虽然如此，兵的增加和枪的增加仍不相称，枪不容易损失，兵有伤、亡、病、逃，损失甚易。湖南省委答应送安源工人[2]来此，亟盼实行。

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

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红军官兵中的边界本地人都分得了土地，只是远籍人分配土地颇为困难。

---

[1]　湖南省常宁县水口山是重要的铅锌矿产地。1922年，水口山的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了工会，历年与反革命斗争。1927年冬，以水口山的工人为主，组成了湘南游击总队，进行游击战争。1928年初，湘南游击总队编入朱德率领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参加了湘南起义，后随起义军一起，到达井冈山。

[2]　指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的工人。1921年秋，中国共产党派人到安源工作，第二年，建立了共产党和工会的组织，在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的领导下，发动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大罢工。当时，安源一带有1.2万多名工人参加了工会。1927年9月，安源工人武装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连、营、团都有了士兵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

党代表制度[1]，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因为下级干部死伤太多，敌军俘虏兵往往过来不久，就要当连排长；今年二三月间的俘虏兵，现在有当了营长的。从表面看，似乎既称红军，就可以不要党代表了，实在大谬不然。第二十八团在湘南曾经取消了党代表，后来又恢复了。改称指导员，则和国民党的指导员相混，为俘虏兵所厌恶。且易一名称，于制度的本质无关。故我们决定不改。党代表伤亡太多，除自办训练班训练补充外，希望中央和两省委派可充党代表的同志至少三十人来。

普通的兵要训练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们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军事技术太差，作战只靠勇敢。长时间的休息训练是不可能的，只有设法避开一些战斗，争取时间训练，看可能否。为着训练下级军官，现在办了一个百五十人的教导队，准备经常办下去。希望中央和两省委多派连排长以上的军官来。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

---

[1] 红军中的党代表1929年起改称政治委员，连的政治委员1930年起改称政治指导员。

上，全靠打土豪供给[1]。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2]。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医生药品均缺。现在医院中共有八百多人。湖南省委答应办药，至今不见送到。仍祈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

[1]　用“打土豪”罚款的方法筹措军费，只能是临时的和部分的。军队大了，地域宽了，就必须而且可能用收税等方法筹措军费。

[2]　此种办法在红军中施行了一个很长时期，在当时曾是必要的，后来改变为按等级略有一些区别。

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1]。

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2]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现在红军中党员和非党员约为一与三之比，即平均四个人中有一个党员。最近决定在战斗兵中发展党员数量，达到党员非党员各半的目的[3]。现在连支部缺乏好的书记，请中央从各地不能立足的活动分子中派遣多人来此充当。湘南来的工作人员，几乎尽数在军中做党的工作。可是八月间在湘南跑散了一些，所以现在不能调出人去。

地方武装有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暴动队以梭镖、鸟枪为武

---

[1] 在军队内部实行一定的民主，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在这里毛泽东特别着重地指出革命军队内部民主生活的必要，是因为当时红军初建，非强调民主，不足以鼓舞新入伍的农民和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军士兵的革命积极性，不足以肃清干部中由反动军队传来的军阀主义的习气。当然，部队中的民主生活必须是在军事纪律所许可的范围内，必须是为着加强纪律而不是为着减弱纪律，所以在部队中提倡必要的民主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要求极端民主的无纪律现象。而这种现象在初期的红军中，曾经一度严重地存在过。关于毛泽东反对军队中极端民主化的斗争，参见《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2] 1926年北伐时，叶挺领导的部队为一个独立团。这个团以共产党员为骨干，是北伐中有名的战斗部队。革命军占领武昌以后，独立团本身改编为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同时，抽调该团部分骨干组建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的三个营和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抽调该团的大批骨干组建第二十四师，叶挺任师长。参加南昌起义后，二十四师、二十五师等部合编为第十一军，叶挺兼任军长。

[3] 事实上红军中的党员人数占全军1/3左右即好，后来在红军和人民解放军中大体上都是如此。

器，乡为单位，每乡一队，人数以乡的大小为比例。职务是镇压反革命，保卫乡政权，敌人来了帮助红军或赤卫队作战。暴动队始于永新，原是秘密的，夺取全县以后，公开了。这个制度现已推行于边界各县，名称未改。赤卫队的武器主要是五响枪，也有九响和单响枪。各县枪数：宁冈百四十，永新二百二十，莲花四十三，茶陵五十，酃县九十，遂川百三十，万安十，共六百八十三。大部是红军发给的，小部是自己从敌人夺取的。各县赤卫队大都经常地和豪绅的保安队、挨户团作战，战斗力日益增强。马日事变[1]以前，各县有农民自卫军。枪数：攸县三百，茶陵三百，酃县六十，遂川五十，永新八十，莲花六十，宁冈（袁文才部）六十，井冈山（王佐部）六十，共九百七十。马日事变后，除袁、王两部无损失外，仅遂川保存六枝，莲花保存一枝，其余概被豪绅缴去。农民自卫军如此没有把握枪枝的能力，这是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现在各县赤卫队的枪枝还是很不够，不如豪绅的枪多，红军必须继续在武器上给赤卫队以帮助。在不降低红军战斗力的条件之下，必须尽量帮助人民武装起来。我们业经规定红军每营用四连制，每连步枪七十五枝，加上特务连，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团部和三个营部，每团有步枪一千零七十五枝。作战缴获的枪，则尽量武装地方。赤卫队的指挥官，由各县派人进红军所办的教导队受训后充当。由红军派远

---

[1]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湖南、湖北的反动军官相继叛变革命。5月21日（马日），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独立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军长何键的策动下，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围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农群众。这个事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革命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反革命派公开合流的信号。

地人到地方去当队长，必须逐渐减少。朱培德、吴尚亦在武装保安队和挨户团，边界各县豪绅武装的数量和战斗力，颇为可观。我们红色地方武装的扩大，更是刻不容缓。

红军以集中为原则，赤卫队以分散为原则。当此反动政权暂时稳定时期，敌人能集中大量军力来打红军，红军分散是不利的。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中央指示我们发展的游击区域，纵横数千里，失之太广，这大概是对我们力量估计过大的缘故。赤卫队则以分散为有利，现在各县赤卫队都采取分散作战办法。

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敌军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即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分为愿留愿去两种，愿去的即发路费释放。这样就把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杨池生的《九师旬刊》，对于我们的这种办法有“毒矣哉”的惊叹。红军士兵们对于所捉俘虏的抚慰和欢送，十分热烈，在每次“欢送新弟兄大会”上，俘虏兵演说也回报我们以热烈的感激。医治敌方伤兵，效力也很大。聪明的敌人例如李文彬，近来也仿效我们的办法，不杀俘虏，医治被俘伤兵。不过，在再作战时，我们的人还是有拖枪回来的，这样的事已有过两回。此外，文字宣传，如写标语等，也尽力在做。每到一处，壁上写满了口号。惟缺绘图的技术人材，请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来。

军事根据地：第一个根据地是井冈山，介在宁冈、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之交。北麓是宁冈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黄坳，两地相距九十里。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县的水口，两地相距百八十里。四周从拿山起经龙源口（以上永新）、新城、茅坪、大陇（以上宁冈）、十都、水口、下村（以上酃县）、营盘圩、戴家埔、大汾、堆子前、黄坳、五斗江、车坳（以上遂川）到拿山，共计五百

五十里。山上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庄、行洲、草坪、白银湖、罗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庄，为自来土匪、散军窟宅之所，现在作了我们的根据地。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军粮全靠宁冈、永新、遂川三县输送。山上要隘，都筑了工事。医院、被服厂、军械处、各团留守处，均在这里。现在正从宁冈搬运粮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给养，敌人是打不进来的。第二个根据地是宁冈、永新、莲花、茶陵四县交界的九陇山，重要性不及井冈山，为四县地方武装的最后根据地，也筑了工事。在四围白色政权中间的红色割据，利用山险是必要的。

土地问题

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的多数，约百分之六十，农民只占百分之四十。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均有约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

中间阶级问题：在上述土地状况之下，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1]，是能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但农村中略分为三种阶级，即大、中地主阶级，小地主、富农的中间阶级，中农、贫农阶级。富农往往与小地主利害联在一起。富农土地在土地总额中占少数，但

[1] 1928年湘赣边界土地法中曾经有这样的规定。毛泽东后来指出，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是由于当时缺乏土地斗争的经验而来的。1929年4月兴国县土地法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

与小地主土地合计，则数量颇大。这种情形，恐全国亦差不多。边界对于土地是采取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政策；故在红色区域，豪绅阶级和中间阶级，同被打击。政策是如此，实际执行时却大受中间阶级的阻碍。当革命初期，中间阶级表面上投降贫农阶级，实际则利用他们从前的社会地位及家族主义，恐吓贫农，延宕分田的时间。到无可延宕时，即隐瞒土地实数，或自据肥田，把瘠田让人。此时期内，贫农因长期地被摧残及感觉革命胜利无保障，往往接受中间阶级的意见，不敢积极行动。必待进至革命高涨，如得了全县甚至几县政权，反动军队几次战败，红军的威力几次表现之后，农村中才有对于中间阶级的积极行动。如永新南乡，是中间阶级最多的地方，延宕分田及隐瞒土地也最厉害。到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红军大胜之后，区政府又处理了几个延宕分田的人，才实际地分下去。但是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

白色恐怖下中间阶级的反水：中间阶级在革命高涨时受到打击，白色恐怖一来，马上反水。引导反动军队大烧永新、宁冈革命农民的房子的，就是两县的小地主和富农。他们依照反动派的指示，烧屋、捉人，十分勇敢。红军再度到宁冈新城、古城、砻市一带时，有数千农民听信反动派的共产党将要杀死他们的宣传，跟了反动派跑到永新。经过我们“不杀反水农民”、“欢迎反水农民回来割禾”的宣传之后，才有一些农民慢慢地跑回来。

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主因。然若全国在革命高涨中，贫农阶级有所恃而增加勇气，中间阶级亦有所惧而

不敢乱为。当李宗仁唐生智战争向湖南发展时，茶陵的小地主向农民求和，有送猪肉给农民过年的（这时红军已退出茶陵向遂川去了）。李唐战争结束，就不见有这等事了。现在全国是反革命高涨时期，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1]。

日常生活压迫，影响中间阶级反水：红区白区对抗，成为两个敌国。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处理失当这两个原因，两区几乎完全断绝贸易，食盐、布匹、药材等项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贵，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农民断绝进款，影响及于一般人民。贫农阶级比较尚能忍受此苦痛，中等阶级到忍不住时，就投降豪绅阶级。中国豪绅军阀的分裂和战争若不是继续进行的，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地区的红色割据，在经济上将受到极大的压迫，割据的长期存在将成问题。因为这种经济压迫，不但中等阶级忍不住，工人、贫农和红军亦恐将有耐不住之时。永新、宁冈两县没有盐吃，布匹、药材完全断绝，其他更不必说。现在盐已有卖，但极贵。布匹、药材仍然没有。宁冈及永新西部、遂川北部（以上均目前割据地）出产最多的木材和茶油，仍然运不出去[2]。

---

[1]　鉴于争取农村中间阶级的重要，毛泽东随即纠正了打击中间阶级过重的错误政策。毛泽东对中间阶级的政策主张，除见于本文外，又见于1928年11月红军第四军第六次党的代表大会提案（内有“禁止盲目焚杀”“保护中小商人利益”等项）、1929年1月红军第四军布告（内有“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馀皆不论”等语）和1929年4月兴国县土地法等。

[2]　此种情况，依靠革命战争的发展、根据地的扩大和革命政府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是可以改变的，后来也已经改变了。这里的关键是坚决地保护民族工商业，反对过左的政策。

土地分配的标准：以乡为分配土地的单位。山多田少地方，如永新之小江区，以三四乡为一个单位去分配的也有，但极少。所有乡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平分。现依中央办法，改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一倍[1]。

向自耕农让步问题：尚未详细讨论。自耕农中之富农，自己提出要求，欲以生产力为标准，即人工和资本（农具等）多的多分田。富农觉得平均分和按劳动力分两种方法都于他们不利。他们的意思，在人工方面，他们愿意多努力，加上资本的力量，他们可以多得收获。若照普通人一样分了，蔑视了（闲置了）他们的特别努力和多余的资本，他们是不愿意的。此间仍照中央办法执行。但此问题，仍当讨论，候得结论再作报告。

土地税：宁冈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办法多收半成，已在征收中，不好变更，明年再减。此外，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在割据区域内，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政府和赤卫队用费，靠向白色区域打土豪。至于红军给养，米暂可从宁冈土地税取得，钱亦完全靠打土豪。十月在遂川游击，筹得万余元，可用一时，用完再讲。

政权问题

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是普遍地组织了，但是名不副实。许多地方无所谓工农兵代表会。乡、区两级乃至县一级，政府的执行

[1] 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土地的方法，是不妥当的。事实上，在革命根据地，长时期都是实行按人口平分土地的原则。

委员会，都是用一种群众会选举的。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亦仅认为是对执行委员会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毕，大权揽于委员会，代表会再不谈起。名副其实的工农兵代表会组织，不是没有，只是少极了。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缺乏对于代表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我们正在制订详细的各级代表会组织法（依据中央的大纲），把以前的错误逐渐纠正。红军中的各级士兵代表会议，现亦正在使之经常建立起来，纠正从前只有士兵委员会而无士兵代表会的错误。

现在民众普遍知道的“工农兵政府”，是指委员会，因为他们尚不认识代表会的权力，以为委员会才是真正的权力机关。没有代表大会作依靠的执行委员会，其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的意见，对没收及分配土地的犹豫妥协，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对白色势力的畏避或斗争不坚决，到处发现。委员会也很少开全体会，遇事由常委处决。区乡两级政府则常委会也少开，遇事由主席、秘书、财务或赤卫队长（暴动队长）各自处理决定，这四个人是经常驻会的。所以，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习惯。

初期的政府委员会中，特别是乡政府一级，小地主富农争着要干。他们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使贫农委员只作配角。只有在斗争中揭破了他们的假面，贫农阶级起来之后，方能去掉他们。这种现象虽不普遍，但在很多

地方都发现了。

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情形是很多的。政权机关里的党团组织有些地方没有，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满。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

党的组织问题

与机会主义斗争的经过：马日事变前后，边界各县的党，可以说是被机会主义操纵的。当反革命到来时，很少坚决的斗争。去年十月，红军（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到达边界各县时，只剩下若干避难藏匿的党员，党的组织全部被敌人破坏了。十一月到今年四月，为重新建党时期，五月以后为大发展时期。一年以来，党内机会主义现象仍然到处发现：一部分党员无斗争决心，敌来躲入深山，叫做“打埋伏”；一部分党员富有积极性，却又流于盲目的暴动。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这种情形，经过长期的斗争锻炼和党内教育，逐渐减少了。同时，在红军中，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也是存在的。敌人来了，主张拼一下，否则就要逃跑。这两种思想，往往在讨论作战时由一个人说出来。经过了长时间党内的斗争和客观事实的教训，例如拼一下遭了损伤，逃跑遭了失败，才逐渐地改变过来。

地方主义：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山地大都用杵臼舂米，平地方有许多石碓）。社会组织是普遍

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这种地方主义的改变，说道理，至多发生几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势力的非地方主义的压迫。例如反革命的两省“会剿”，使人民在斗争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渐地打破他们的地方主义。经过了许多这样的教训，地方主义是减少了。

土客籍问题：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为最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例如边界八月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

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我们的办法是一面宣传“不杀反水农民”，“反水农民回来一样得田地”，使他们脱离豪绅的影响，安心回家；一面由县政府责令客籍农民将没收的财物退还原主，并出布告保护土籍农民。在党内，加紧教育，务使两部分党员团结一致。

投机分子的反水：革命高涨时（六月），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边界党员数量一时增到一万以上。支部和区委的负责人多属新党员，不能有好的党内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九月以后，厉行洗党，对于党员成分加以严格的限制。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过去党的组织全部公开，九月以后，建设秘密的组织，准备在反动派来了也能活动。同时多方伸入白区，在敌人营垒中去活动。但在附近各城市中还没有党的基础。其原因一因城市中敌人势力较大，二因我军在占领这些城市时太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致使党员在那里难于立足。现在纠正错误，力求在城市中建设我们的组织，但成效尚不多见。

党的领导机关：支部干事会改称委员会。支部上为区委，区委上为县委。区委县委之间因特别情况有组织特别区委的，如永新的北乡特区及东南特区。边区共有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酃县五个县委。茶陵原有县委，因工作做不进去，去冬今春建设的许多组织大部被白色势力打塌了，半年以来只能在靠近宁冈永新一带的山地工作，因此将县委改为特别区委。攸县、安仁均须越过茶陵，派人去过，无功而返。万安县委一月间曾和我们在遂川开过一次联席会议，大半年被白色势力隔断，九月红军游击到万安，才又接一次

头。有八十个革命农民跟随到井冈山，组织万安赤卫队。安福没有党的组织。吉安邻接永新，吉安县委仅和我们接过两次头，一点帮助不给，奇怪得很。桂东的沙田一带，三月八月两度分配土地，建设了党的组织，属于以龙溪十二洞为中心的湘南特委管辖。各县县委之上为湘赣边界特委。五月二十日，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开会，选举第一届特委会委员二十三人，毛泽东为书记。七月湖南省委派杨开明来，杨代理书记。九月杨病，谭震林代理书记。八月红军大队往湘南，白色势力高压边界，我们曾在永新开过一次紧急会议。十月红军返至宁冈，乃在茅坪召集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十月四日起开会三天，通过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等决议，选举了谭震林、朱德、陈毅、龙超清、朱昌偕、刘天干、盘圆珠、谭思聪、谭兵、李却非、朱亦岳、袁文才、王佐农、陈正人、毛泽东、宛希先、王佐、杨开明、何挺颖等十九人为第二届特委会的委员。五人为常委，谭震林（工人）为书记，陈正人（知识分子）为副书记。十一月十四日红军第六次全军大会，选举二十三人组织军委，五人为常委，朱德为书记。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前委是十一月六日重新组织的，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宋乔生）、一农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前委暂设秘书处、宣传科、组织科和职工运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前委管理地方党。特委仍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前委有时要随军行动。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除应积极注意各县城和大市镇的职工运动外，并应在政权机关中增加工人的代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也应增加工人和贫农的成分。

革命性质问题

我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数小块地方的红色政权，一方面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马日事变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军，也是这样。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要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

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我们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较地执行得好的。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改变原来前委的领导人，政策一变。四月全军到边界后，烧杀虽仍不多，但对城市中等商人的没收和乡村小地主富农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厉害的。湘南特委提出的“一切工厂归工人”的口号，也宣传得很普遍。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

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渐好些。在遂川特别收到了好的效果，县城和市镇上的商人不畏避我们了，颇有说红军的好话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为市，三天一次），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这件事，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了。豪绅对人民的税捐很重，遂川靖卫团[1]在黄坳到草林七十里路上要抽五道税，无论什么农产都不能免。我们打掉靖卫团，取消这些税，获得了农民和中小商人全体的拥护。

中央要我们发布一个包括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纲，我们则提议请中央制订一个整个民权革命的政纲，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循。

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我们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

割据地区问题

广东北部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都属罗霄山脉区域。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北段地势不如中段可进可守，又太迫近了大的政治都会，如果没有迅速夺取长沙或武汉的计划，则以大部兵力放在浏阳、醴陵、萍乡、铜鼓一带是很危险的。南段地势较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政治上及于湘赣两省的影响也小些，不如中段一举一动可以影响两省的下游。中段的长处：（1）有经营了一年多的群众基础。（2）党的组织有相当的

[1] 靖卫团是一种反革命的地方武装。

基础。(3)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创造了富有斗争经验的地方武装，这是十分难得的；这个地方武装的力量，加上红军第四军的力量，是任凭什么敌人也不能消灭的。(4) 有很好的军事根据地——井冈山，地方武装的根据地则各县都有。(5) 影响两省，且能影响两省的下游，比较湘南赣南等处只影响一省，且在一省的上游和僻地者，政治意义大不相同。中段的缺点，是因割据已久，“围剿”军多，经济问题，特别是现金问题，十分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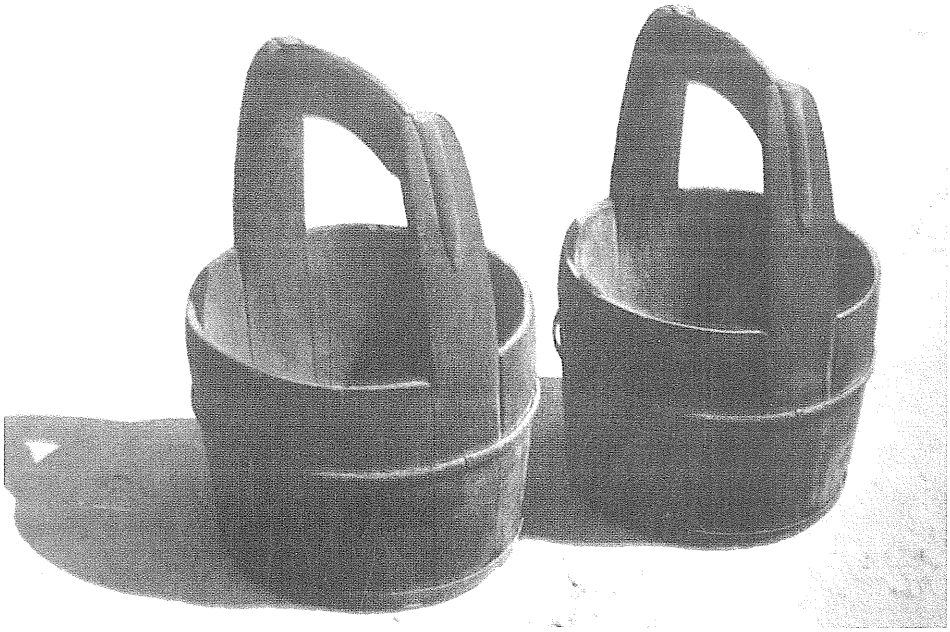
湖南省委对于此间的行动计划，六七月间数星期内，曾三变其主张。第一次袁德生来，赞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计划。第二次杜修经、杨开明来，主张红军毫不犹豫地向湘南发展，只留二百枝枪会同赤卫队保卫边界，并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第三次袁德生又来，相隔不过十天，这次信上除骂了我们一大篇外，却主张红军向湘东去，又说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而且又要我们“毫不犹豫”。我们接受了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当第二次信到时，军委、特委、永新县委举行联席会议，认为往湘南危险，决定不执行省委的意见。数天之后，却由杜修经杨开明坚持省委意见，利用第二十九团的乡土观念，把红军拉去攻郴州，致边界和红军一齐失败。红军数量上约损失一半；边界则被焚之屋、被杀之人不可胜数，各县相继失陷，至今未能完全恢复。至于往湘东，在湘鄂赣三省豪绅政权尚未分裂之前，亦决不宜用红军的主力去。设七月无去湘南一举，则不但可免边界的八月失败，且可乘国民党第六军和王均战于江西樟树之际，击破永新敌军，席卷吉安、安福，前锋可达萍乡，而与北段之红第五军取得联络。即在这种时候，也应以宁冈为大本营，去湘东的只能是游击部队。因豪绅间战争未起，湘边酃县、茶陵、攸县尚有大敌，主力

北向，必为所乘。中央要我们考虑往湘东或往湘南，实行起来都很危险，湘东之议虽未实现，湘南则已有证验。这种痛苦的经验，是值得我们时时记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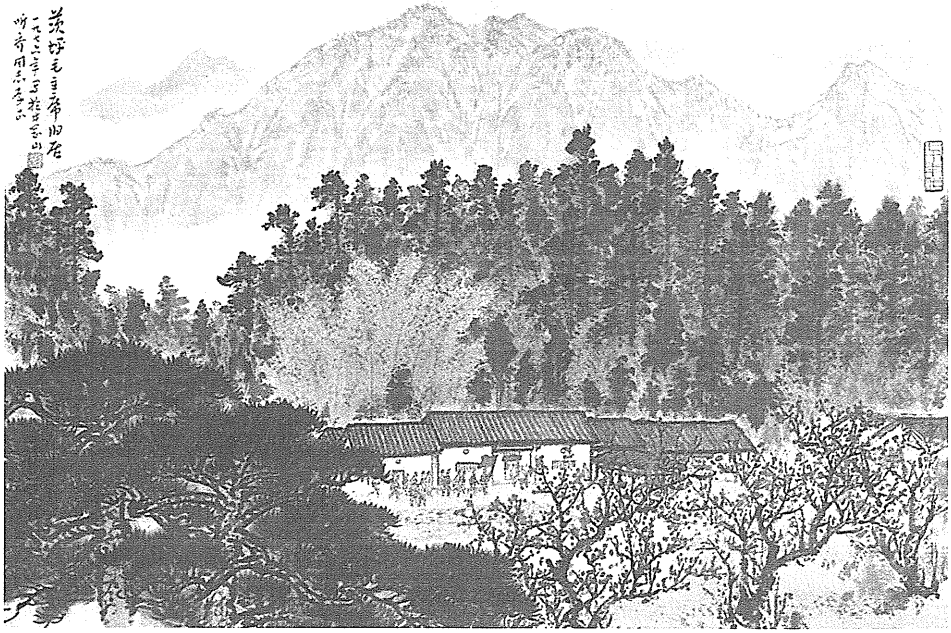
现在是豪绅阶级统治还没有破裂的时期，环边界而“进剿”的敌军，尚有十余团之多。但若我们于现金问题能继续找得出路（粮食衣服已不成大问题），则凭借边界的基础，对付此数敌人，甚至更多的敌人，均有办法。为边界计，红军若走，则像八月那样的蹂躏，立可重来。赤卫队虽不至完全消灭，党和群众的基础将受到极大的摧残，除山头割据可以保存一些外，平地均将转入秘密状态，如八九月间一样。红军不走，以现在的基础可以逐渐向四周发展，前途的希望是很大的。为红军计，欲求扩大，只有在有群众基础的井冈山四周即宁冈、永新、酃县、遂川四县，利用湘赣两敌利害不一致，四面防守，无法集中的情况，和敌人作长期的斗争。利用正确的战术，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必有俘获，如此可以逐渐扩大红军。以四月至七月那时边界群众的准备，红军大队若无湘南之行，则八月间红军的扩大是没有疑义的。虽然犯了一次错误，红军已卷土重来此地利人和之边界，前途希望还是不恶。红军必须在边界这等地方，下斗争的决心，有耐战的勇气，才能增加武器，练出好兵。边界的红旗子，业已打了一年，虽然一方面引起了湘鄂赣三省乃至全国豪绅阶级的痛恨，另一方面却渐渐引起了附近省份工农士兵群众的希望。以士兵论，因军阀们把向边界“剿匪”当做一件大事，“剿匪经年，耗费百万”（鲁涤平），“人称二万，枪号五千”（王均），如此等类的话，逐渐引起敌军士兵和无出路的下级官长对我们注意，自拔来归的将日益增多，红军扩充，又是一条来路。并且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

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

《毛主席在井冈山农村调查》（中国画）



毛泽东在永新调查时为乡亲们挑水用过的水桶。



《茨坪毛主席旧居》（中国画）

《毛泽东在井冈山》（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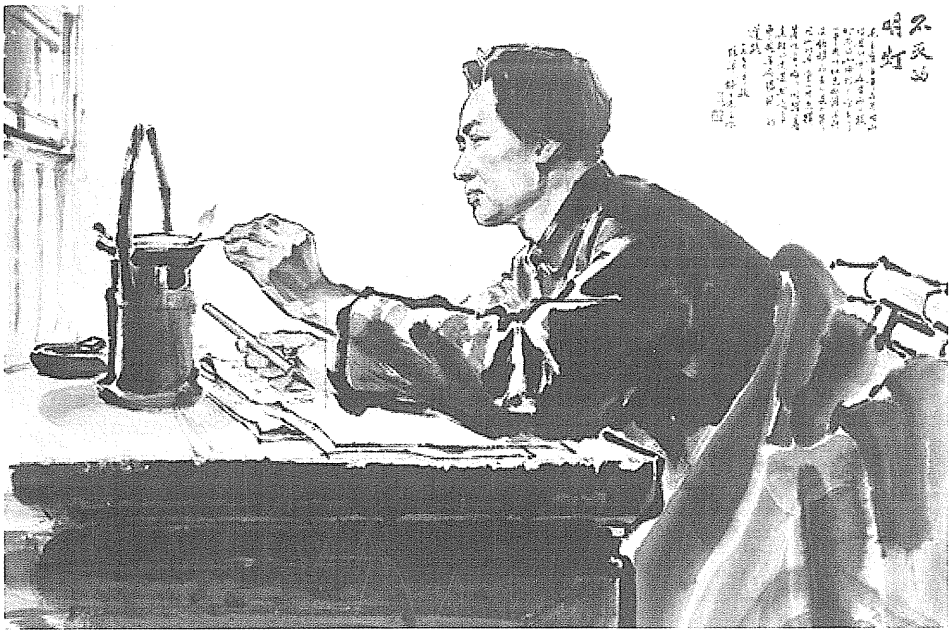
《毛主席在井冈山》（油画）

《毛主席在井冈山》（油画）

《艰苦岁月》（油画）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挑粮路上》（油画）

《光辉的榜样》（中国画）



《不灭的明灯》（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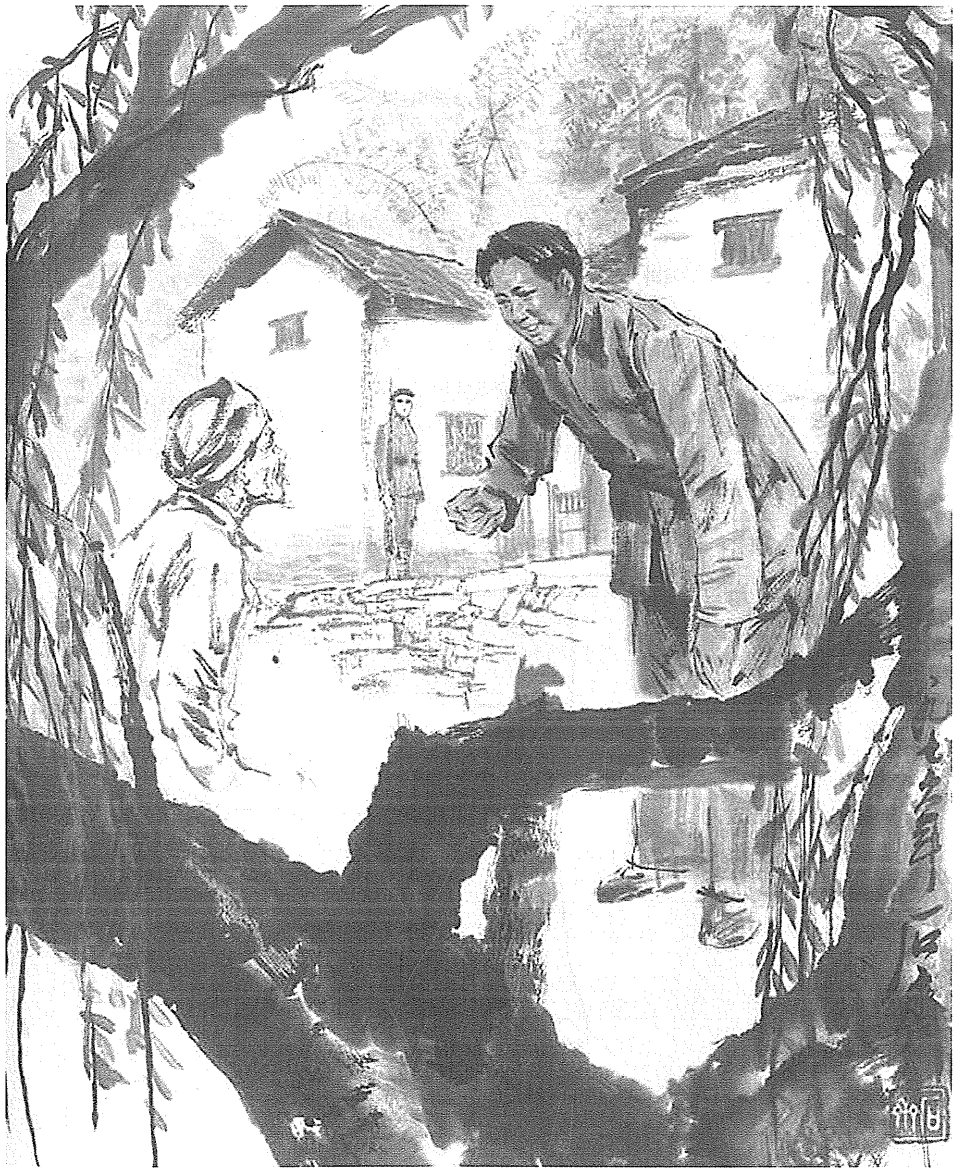
《井冈山之晨》（版画）

《井冈山岁月》（油画）

《毛泽东在井冈山》（油画）

《毛主席在井冈山》（油画）

《峥嵘岁月》（中国画）



《毛主席到我家》（中国画）

《井冈晨雾》（中国画）

《井冈山红旗飘万代》（版画）

（井冈山）土地法

（1928年12月）

一、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用下列三种方法分配之：

（一）分配农民个别耕种；（二）分配农民共同耕种；（三）由苏维埃政府组织模范农场耕种。

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或苏维埃政府有力时，兼用二三两种。

二、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

三、分配土地之后，除老幼疾病没有耕种能力及服公众勤务者以外，其余的人均须强制劳动。

四、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

（一）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二）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土地一倍。

以上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有特殊情形的地方，得适用第二个标准。采取第一个标准的理由：

（甲）在养老育婴的设备未完备以前，老幼如分田过少，必至不能维持生活。

（乙）以人口为标准计算分田，比较简单方便。

（丙）没有老小的人家很少。同时老小虽无耕种能力，但在分得田地后，政府亦得分配以相当之公众勤务，如任交通等。

五、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

（一）以乡为单位分配。（二）以几乡为单位分配（如永新之小江区）。（三）以区为单位分配（如遂川之黄坦区）。

以上三种标准，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时，得适用第二第三两种标准。

六、山林分配法：

（一）茶山[1]、柴山，照分田的办法，以乡为单位，平均分配耕种使用。

（二）竹木山，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但农民经苏维埃政府许可后，得享用竹木。竹木在五十根以下，须得乡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下，须得区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上，须得县苏维埃政府许可。

（三）竹木概由县苏维埃政府出卖，所得之钱，由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之。

七、土地税之征收：

（一）土地税依照生产情形分为三种：1. 百分之十五；2. 百分之十；3. 百分之五。

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经高级苏维埃政府批准，得分别适用二三两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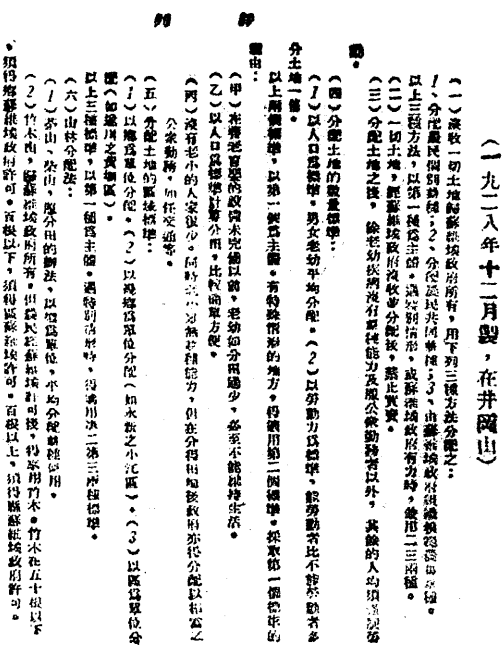
（二）如遇天灾或其他特殊情形时，得呈明高级苏维埃政府核准，免纳土地税。

（三）土地税由县苏维埃政府征收，交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

八、乡村手工业工人，如自己愿意分田者，得分每个农民所得

[1] 茶山，指种植油茶树的山地。

田的数量之一半。



土地法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製，在井岡山）

（一）没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用下列三種方法分配之：

1、分配農民個別耕種；2、分配農民共同耕種；3、由蘇維埃政府雇傭耕種人耕種。

以上三種方法，以第一種爲主體。遇特別情形，或蘇維埃政府有力時，發用二三兩種。

（二）一切土地，經蘇維埃政府没收並分配後，禁止買賣。

（三）分配土地之後，除老幼疾病沒有耕種能力及從公從勤勞者以外，其餘的人均須參加勞動。

（四）分配土地的數量標準：

（1）以人口爲標準，男女老幼平均分配。（2）以勞動力爲標準，能勞動者比不能勞動者多分土地一倍。

以上兩個標準，以第一個爲主體。有特殊情形的地方，得採用第二個標準。採取第一個標準的理由：

（甲）本鄉老百姓的政權未完備以前，老幼仰分田過少，甚至不能維持生活。

（乙）以人口爲標準計算分田，比較簡單方便。

（丙）沒有老小的人家很少。同時沒有無耕種能力，但在分得田地後仍須分配以耕種之公家勤務，如任交通等。

（五）分配土地的區域標準：

（1）以鄉爲單位分配。（2）以鄉鎮爲單位分配（如水數之小沉區）。（3）以區爲單位分配（如遊牧之食場區）。

以上三種標準，以第一個爲主體。遇特別情形時，得採用第二第三種標準。

（六）山林分配法：

（1）茶山、柴山，應分用的辦法，以農爲單位，平均分配耕種使用。

（2）竹木山，蘇維埃政府所有，但農民經蘇維埃許可後，得採用竹木。竹木在五十根以下，須得鄉蘇維埃政府許可。百根以上，須得縣蘇維埃政府許可。

（3）竹木被由蘇維埃政府出賣，所得之錢，由高級蘇維埃政府支配之。

（七）土地稅之徵收：

（1）土地稅徵用生產物分爲三種：（一）百分之十五；（二）百分之十；（三）百分之五。以上三種方法，以第一種爲主體。遇特別情形，經高級蘇維埃政府批准，得分別適用二三兩種。

（2）如遇天災，或其他特殊情形時，得呈請高級蘇維埃政府減稅，免納土地稅。

（3）土地稅由蘇維埃政府徵收，交高級蘇維埃政府支配。

（八）鄉村手工業工人，如自己開墾分田者，得分他農民所得田的數量之一半。

（九）紅軍及赤衛隊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機關服務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農民所得之數，由蘇維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種。

按：此土地法是一九二八年冬天在井岡山（湘贛邊區蘇區）制定的。這是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冬天一整年內土地斗爭經驗的總結，在這以前，是沒有任何經驗的。這個土地法有幾個錯誤：（一）沒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沒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權屬政府而不是屬農民，農民只有使用權；（三）禁止土地買賣。這些都是原則錯誤，後來都改正了。關於共同耕種與以勞力爲分配土地標準，實際不能實行，故採用第二種標準。因此農民共同耕種的不多，而以人口標準與以勞力爲分配土地標準，實際不能實行，故採用第二種標準。因此農民共同耕種的不多，而以人口爲分田標準作爲主要辦法。因此農民共同耕種的不多，而以人口爲分田標準作爲主要辦法。因此農民共同耕種的不多，而以人口爲分田標準作爲主要辦法。因此農民共同耕種的不多，所以這種規定，後來就改爲單用按者爲標準了。個人感覺單人耕作的，後來改爲勞力農民等等他們都了。

1928年冬，毛泽东总结一年来井冈山根据地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起草了井冈山《土地法》。图为《土地法》的部分内容。

九、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

按[1]：此土地法是一九二八年冬天在井冈山（湘赣边界）制定的。这是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冬天一整年内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在这以前，是没有任何经验的。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这些都是原则错误，后来都改正了。关于共同耕种与以劳力为分配土地标

[1] 这个“按”是毛泽东在延安编辑《农村调查》一书时加写的。

准，宣布不作为主要办法，而以私人耕种与以人口为分田标准作为主要办法，这是因为当时虽感到前者不妥，而同志中主张者不少，所以这样规定，后来就改为只用后者为标准了。雇人替红军人员耕田，后来改为动员农民替他们耕了。

红军第四军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1928年12月16日）

一　大会纪事

四军五次大会是本年五月在宁冈新城开的，到现在经过了六个月的艰苦斗争。六次大会于十一月十三日开预备会，十四日开正式会，十五日闭会。到会代表七十九人。四军全军的支部除卅二团一营远在永新派代表来不及外，所有支部均有代表参加，各代表所携提案计三十余种，经一度整理将意见相同者合并，计十七种。大会中讨论了政治、军事、党务各种重要问题，尤其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有长时期之辩论，这是六次大会的特点。关于各种提案因各代表身负重责，急须回部工作，不能逐一讨论，后决定移交新军委讨论执行。新军委选举最初由大会主席团提四十九人候选名单，经大会选定二十三人为六届军委委员，组织执委会进行一切工作。大会于十五日闭幕。这次大会一切决定关系红军前途及边界发展至巨，复志其概略于此。

二　政治问题决议案

（1）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根据国际二月间对中国革命问题决

议，认定中国革命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阶段。这个革命的领导是无产阶级，其内容对外推翻军阀完成土地革命，将封建剥削关系消灭，使中国被压迫群众得到民权自由。要这样才能培养出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若果否认这个民权的革命阶段，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种误解于中国革命极有害。我们从过去的斗争中，证明国际意见的真实。从广州暴动以来，各地烧杀主义便是根本误解了中国革命性质，红军四军于……苦的经验，我们今后的行动是领导工农兵群众及小资产阶级，扩大民权革命运动，深入土地革命，推翻目前最反动的局面，红军必须宣布具体城市政纲，力改前次无限制没收军需品的政策。

（2）国际形势：从德奥资本主义复兴，英法海军协定，美国战争条约，意大利争地中海的权，日本对华出兵，美国对华单独条约，诸事件证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间的冲突日趋激烈，这是国际革命涌进的时机！

（3）国内情势：近来国民党各派军阀成立了一个联合政府，表面上鼓吹永庆升平，实际上蒋介石派专政拉拢勉图一时的相安，从军政、财政、党务三方面国民党内包含了极繁复的裂痕，尤其是北方匪祸方面与南方工农兵暴动证明这个“统一政府”的力量薄弱。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统治中国的主人是国际帝国主义，国际帝国主义既是不一致，则其卵翼下的军阀政府更是分崩离析的了。所以中国现时政局的暂时相安，只是在酝酿着军阀们的大混战。

（4）苏维埃政府的产生与存在问题：在白色势力统治下的中国能生长出苏维埃政权而有继续存在的情势，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特征。因为中国革命是一个半殖民地，在半殖民地的统治阶级根本是割据不能统一的，苏维埃政权即从其分裂中成长，如果统治阶级的

分裂是继续不断的，则苏维埃政权也同样的能继续存在下去，我们从一年来各地苏维埃之发生证明，上面理之真实，又从边界一年来的割据证明，苏维埃政权继续存在需要下列四个条件：（甲）能坚决斗争的共产党；（乙）广大有组织的工农群众：（丙）有相当力量的武装红军和赤卫队；（丁）有利于斗争以少胜多的地势。

（5）目前政治任务：湘赣二省在中国地域上过去经过极汹涌的革命潮流，群众有较深入的基础，边界各割据便负有影响二省革命运动的使命，这样建立布尔什维克的党，领导群众扩大民权革命运动，深入红军所到区域的土地革命，向四周发展以促统治阶级的分崩离析，这是党在红四军中的任务。

三　党务决议案

（1）红军中各级党部，不宜公开处置各种事务，竭力恢复秘密状态，党的机关可设置在各级士兵委员会内，党的负责同志须兼为士委职员，对外须提高士委权力，成立党团指挥之，军事机关也需健全，使具有执行党的革命指挥军事的权力。纠正党部过去直接处理日常事务，视军事机关及士委为虚设的毛病。

（2）五届军委决定健全各团委，军委只负责政治指导责任，因此对于下级情况毫不明了，各团委也独自为政，逐有不能集中之弊，今后应建全军委，军委须经常明了各支部的工作。

（3）红军迭经巨战，党委干部人才已伤亡殆尽，此后军委须经常成立政治训练班，陶铸党务工作人才。

（4）须在战斗兵中发展党员，其比例至少须二分之一。

（5）连上支部干事会应改变称连支部委员会，扩大委员数量，

使多数同志参加干部指导工作。切实做到连支委为红军核心，支委人数定五至七人。

（6）连支委为红军党的工作核心，党代表则为此工作核心之负责者，并同时负有计划督促政治工作之公开任务，在事实上目前党代表制度不应取消。

四　军事问题决议案

（1）建立军事根据地：（甲）在大小五井建筑巩固的工事；（乙）在根据地尽量屯积粮食；（丙）在根据地建筑医院、营舍及红军纪念堂。

（2）部队编制：每连长枪定七十五支，每营四连，每团一个特务连，其枪数与步兵连等，每团可有机关枪连、追击炮连，每连长枪四十支，团部传令排八支，营部四支，军部可设立特务营，其组织与兵营等。

（3）一切枪弹归军部，各团、营、连不得自由分配。

（4）短枪每连至多不过六支，营部至多不得过三支，团部至多不得过五支，军部至多不得过六支。

（5）红军战术遇小敌则以主力迅速消灭之，大敌则用群众力量四面包抄，使其疲于奔命，然后用主力消灭之，红军竭力避免硬战。

（6）军事技术得加强训练，对于下级干部的军事指挥更应注意方法，健壮红军战斗力。

（7）在军队组织中要特别健全侦探队、卫生队、担架队，在每营可设担架排，关于经济经理及报告应采用新式簿记。

（8）编纂红军战史及死难同志传略，并收集其遗嘱、遗物作纪

念品。

（9）红军政治训练要注意下列诸种：（甲）健全士委会，使其权能代表士兵利益，参加军队管理，维护军队纪律，厉行士兵政治教育，对外作群众运动；（乙）分期举行士兵识字运动；（丙）启发士兵阶级觉悟，使士兵了解革命中各种主要问题，并具备政治常识；（丁）筹备各种娱乐，影响士兵自动参加，使其得到艺术的享乐；（戊）连上须组织三人以上宣传队，战时平常不断地做宣传工作；（己）标语口号须由军委规定发出，以求统一，免致杂乱。

（10）各级党部须随时计划做破坏敌人工作。

（11）为使红军扩大须应募工农及革命分子来红军入伍。

（12）军委须着手健全三十二团第一营。

五　经济问题决议案

军部军需处及各团辎重队，每月需要作一详尽经济报告，交由士兵代表会审定后向群众公布，务使红军经济问题彻底公开。

六　纪律问题决议案

十一月十日红军新城、永新之役，宁冈四区赤卫队及一部农友不来前线作战、夺取敌人枪支及担任运输、救护、搜山等工作，仍在新城附近收搜耕牛及其他杂物。此种行动实属违反革命纪律，侵犯农民利益，本代表大会应向宁冈县委及县政府提出质问，希望以后不宜再有此项行动，关于索去耕牛须尽数发还，并公开发表宣言，解释此项错误，使群众明了。

七　大会代表提案

（1）健全担架队；

（2）健全侦察队；

（3）健全军事政治学校；

（4）优待敌军；

（5）招新兵；

（6）收买枪弹西药；

（7）派员联络五军；

（8）整饬军纪党纪；

（9）囤积粮食于后方；

（10）颁布民权革命政纲；

（11）禁止盲目的焚杀；

（12）保护中小商人利益；

（13）恢复罗霄山脉政权向北发展；

（14）红军需依照太平天国军队的编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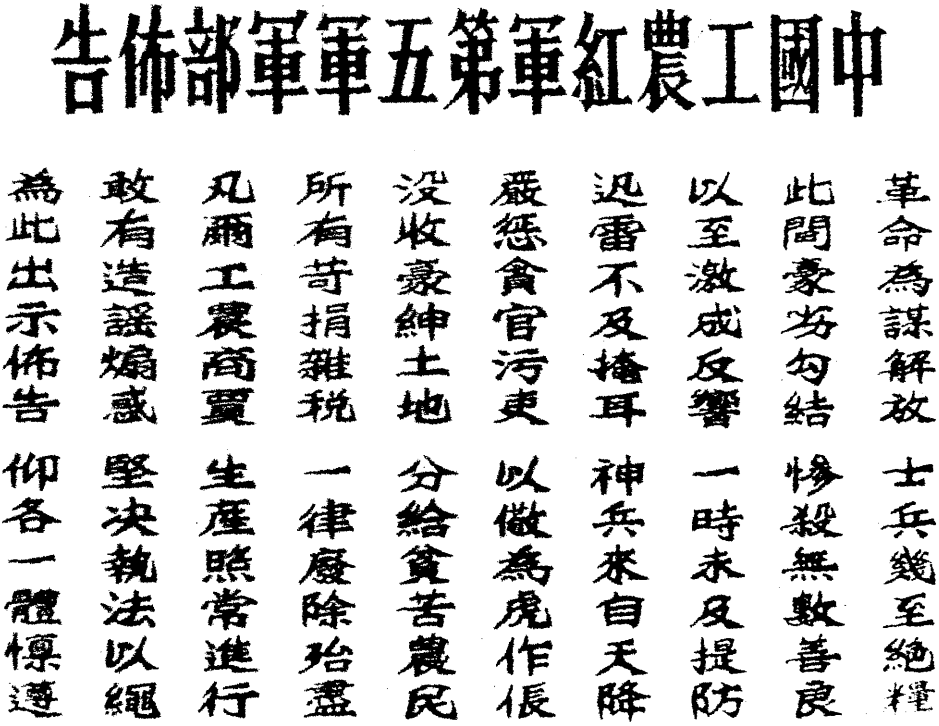
（15）速定红军人员武器的编制表；

（16）军队中不准私自买卖；

（17）健全士委会；

以上十七种提案，大会因提前闭幕，未及详细讨论，均交新军委讨论执行。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发行



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軍部佈告

革命為謀解放　士兵幾至絕糧
此間豪劣勾結　慘殺無數善良
以至激成反響　一時未及提防
迅雷不及掩耳　神兵來自天降
嚴懲貪官污吏　以儆為虎作倀
沒收豪紳土地　分給貧苦農民
所有苛捐雜稅　一律廢除殆盡
凡爾工農商賈　生產照常進行
敢有造謠煽惑　堅決執法以繩
為此出示佈告　仰各一體懍遵

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平江起义后成立的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和朱德、毛泽东的红四军会师。图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军部布告。

伪装题名《新出绘图国色天香》的《中共六大决议案》。

和何长工应对联[1]

（1928年）

谷磨磨谷，谷随磨转，磨转谷裂出白米；（何长工）

门锁锁门，门由锁开，锁开门敞迎故人。（毛泽东）

---

[1]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在井冈山将王佐的武装力量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并将何长工派去任党代表。一天，毛泽东外出散步，见一位老农正在磨房磨谷，便进房帮助。何长工有事来找，见磨谷的磨盘，略加思索出了上联。毛泽东听后，说：“妙对！妙对！下联可难配啊！待我仔细想想。”回到驻地后，毛泽东见警卫员用锁开门，当即触景生情，对何长工说：“我看刚才的上联可以这样对。”接着说出了下联。何长工（1900—1987），湖南华容人，1918年毕业于湖南省立长沙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同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国。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1934年参加长征。建国后任重工业部代部长、地质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1929

1944年3月，胶东联合社以《古田会议决议》为书名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1]

（1929年1月）

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军，声威远震。
此番计划，分兵前进，官佐兵夫，服从命令。
平买平卖，事实为证，乱烧乱杀，在所必禁。
全国各地，压迫太甚，工人农人，十分苦痛。
土豪劣绅，横行乡镇，重息重租，人人怨愤。
白军士兵，饥寒交并，小资产者，税捐极重。
洋货越多，国货受困，帝国主义，哪个不恨。
国民匪党，完全反动，口是心非，不能过硬。
蒋桂冯阎[2]，同床异梦，冲突已起，军阀倒运。
饭可充饥，药能医病，共党主张，极为公正。
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
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
军队待遇，亟须改订，发给田地，士兵有份。
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
累进税法，最为适用，苛税苛捐，扫除干净。

---

[1] 这是红军第四军自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发布的布告。

[2] 蒋桂冯阎，指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桂系）、冯玉祥、阎锡山四派。

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馀皆不论。

对待外人，必须严峻，工厂银行，没收归并。

外资外债，概不承认，外兵外舰，不准入境。

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军阀，除恶务尽。

统一中华，举国称庆，满蒙回藏，章程自定。

国民政府，一群恶棍，合力铲除，肃清乱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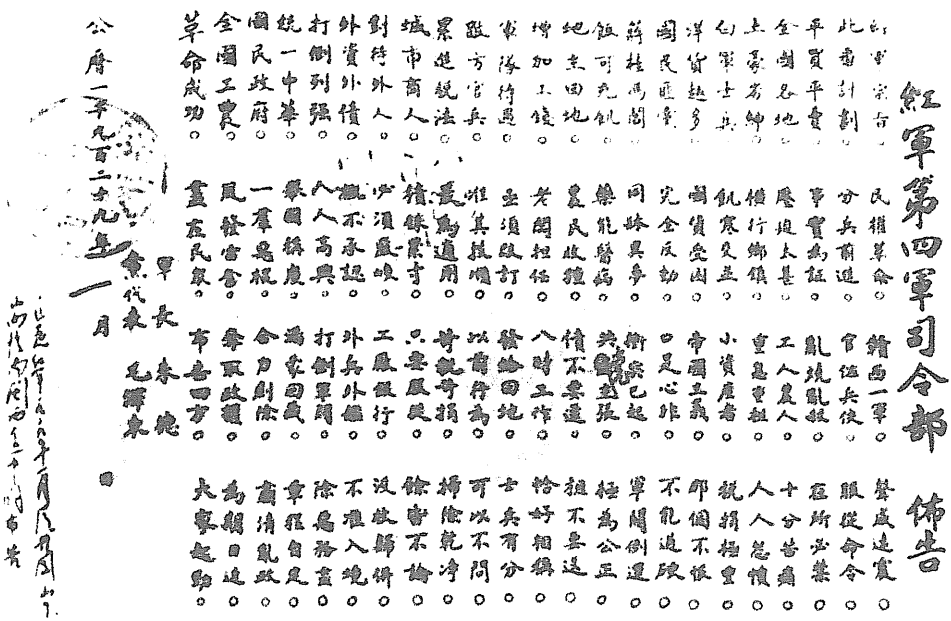
全国工农，风发雷奋，夺取政权，为期日近。

革命成功，尽在民众，布告四方，大家起劲。

军　长　朱　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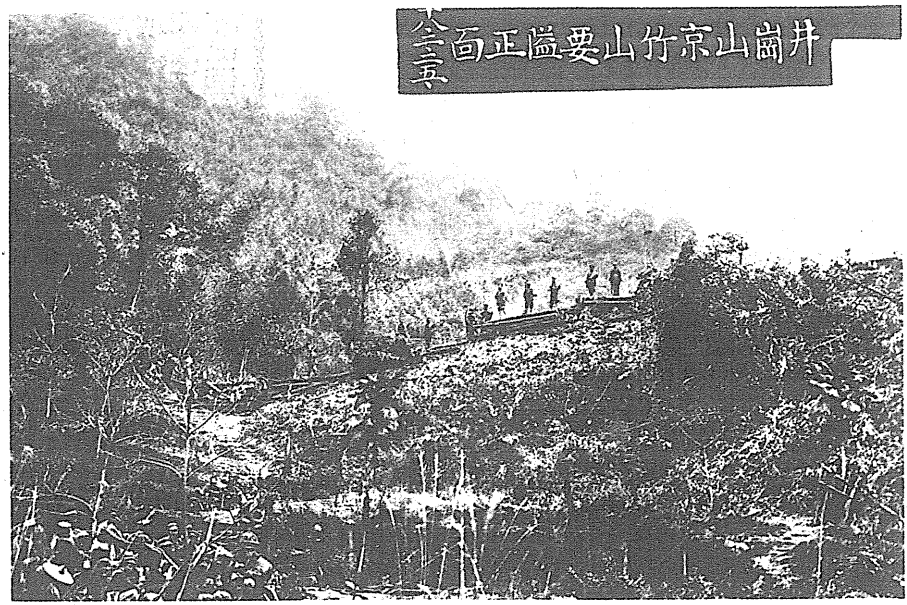
党代表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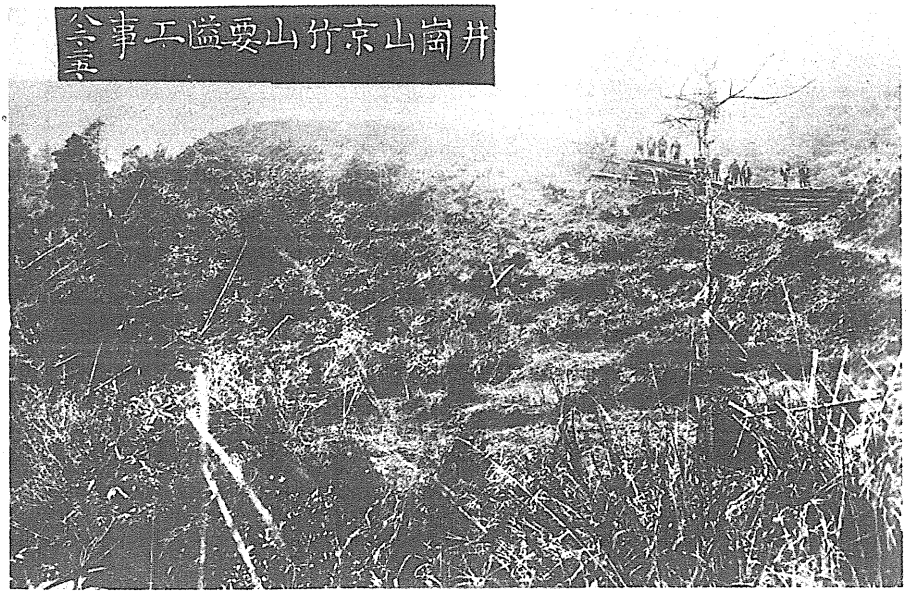
公历一千九百二十九年一月


紅軍第四軍司令部　佈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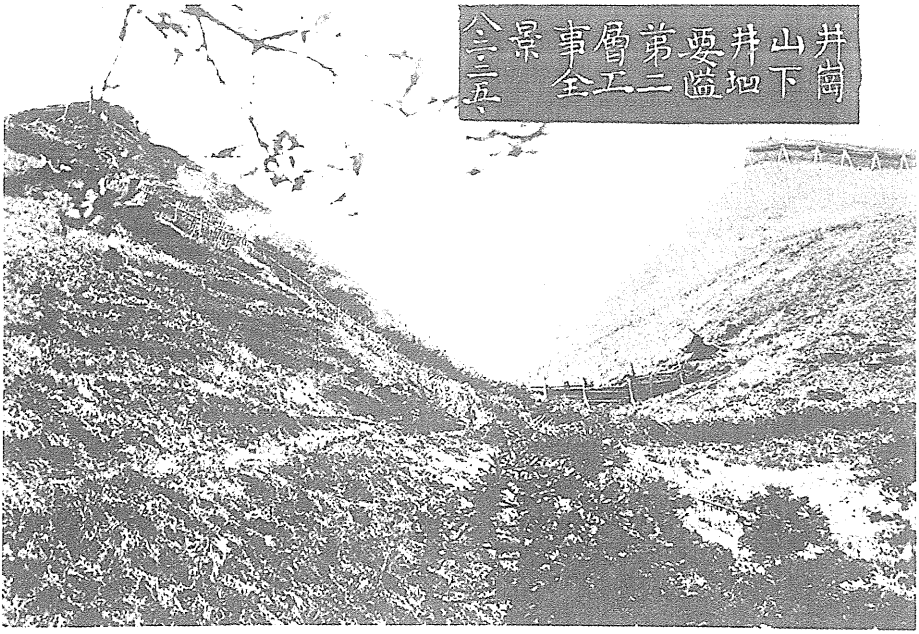
軍長　朱德
黨代表　毛澤東
公曆一千九百二十九年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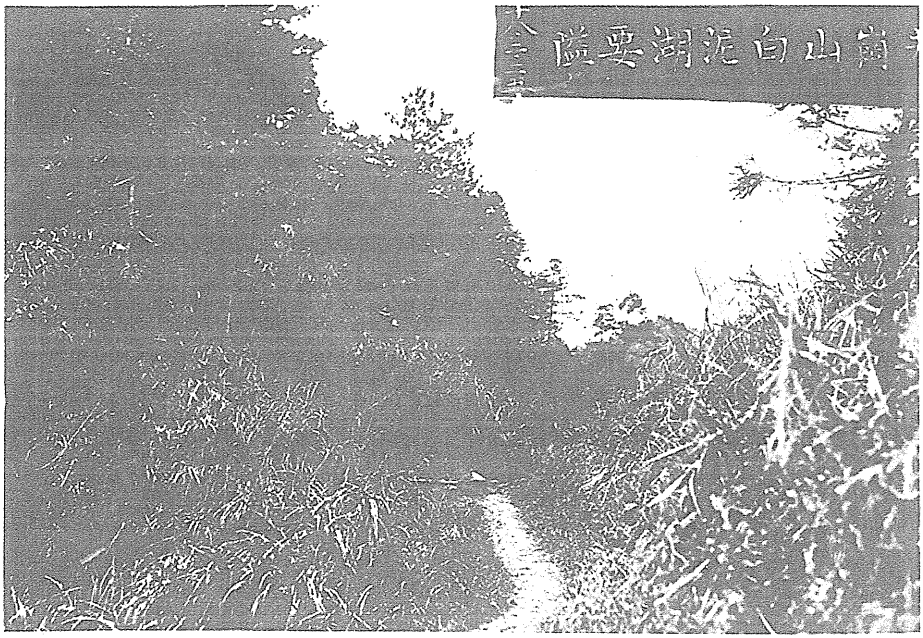
红四军司令部在进军途中发布的《红四军司令部布告》。





1929年1月，国民党军队进攻井冈山。图为国民党军队拍摄的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的军事设施图。





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的军事设施图。

共产党宣言*

（1929年1月）

中国的革命现在还是民权革命的阶段。民权革命是要推倒两个最大的敌人，就是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地主阶级。中国受英、美、法、日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有几十年了，他们把洋货运进中国来，把中国的农产品运到外国去，使中国的农民吃亏很大；又开工厂剥削中国的工人，开银行吸收中国的资本，管理海关扼制中国的命脉，设立教堂养成他们的走狗，把租界做根据，兵船开在上海、汉口、天津、广州各沿海沿江重要口岸，陆军亦驻在北京、天津、上海各处，简直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帝国主义这样压迫中国，中国数万万工人、农民、兵士及小资产阶级便不得不起而反抗，共产党更不得不站在民众的前头勇敢奋斗。乃代表豪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半路反叛，不但取消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并且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卖国媚外，和吴佩孚、孙传芳一个样子，资产阶级国民党既已反革命了，工人、农民、兵士和小资产阶级，乃不得不担负打倒帝国主义的责任。帝国主义打倒之后，全国才可以统一，工业才可以发展，中国整个的民族才可以得到解放，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责任。中国现在的土地制度，是一种半封建制度，农民受重租、重息、重税的剥削，田地集中在地主手里。中国境内，差不多不论哪一县，田地十分之七在地主手里，农民只有很少的田地。

乡村里一百户人家之中，少穿少吃的贫农要占七十家，够穿够吃的中农不过二十家，余钱剩米的富农不过十家，乡村中大多数人受苦受难，只有少数收租谷收利息的土豪享福。城里的官僚军阀乃是土豪的代表。一面重捐重税剥削农民及小资产阶级，一面勾结帝国主义帮助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剥削。土地革命是中国民权革命主要的内容，地主官僚军阀不除，中国农民得不到土地，民权革命就不算成功。所以推翻封建剥削，解决土地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个责任。如上所述，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剥削，是民权革命的两大目标，但国民党已经背叛民权革命，蒋、桂、冯、阎、奉各派新军阀都成了地主阶级的代表、帝国主义的走狗。故要达到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剥削的目的就非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设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不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个责任。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今来至此地，所执行的任务，就是上面所说的三件。同时共产党在全国各地领导工农、兵士、群众所执行的任务，也就是上边所说的三件。要执行上述三大任务，特依照共产党第六次全国大会的指示，发布下列十大政纲：

（一）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二）没收外国资本开设的工厂、商店、船只、矿山和银行；

（三）统一中国，承认满、蒙、回、藏、苗、瑶各民族的自决权；

（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

（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

（六）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社会保险等；

（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田地，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

（八）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田地和工作；

（九）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捐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十）联合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联合苏维埃俄罗斯。

以上十条政纲是达到三大任务的具体方案。工人们、农民们、兵士们、一切贫苦群众、一切受压迫的小资产阶级，快快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团结起来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国民党新军阀奋斗啊！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军党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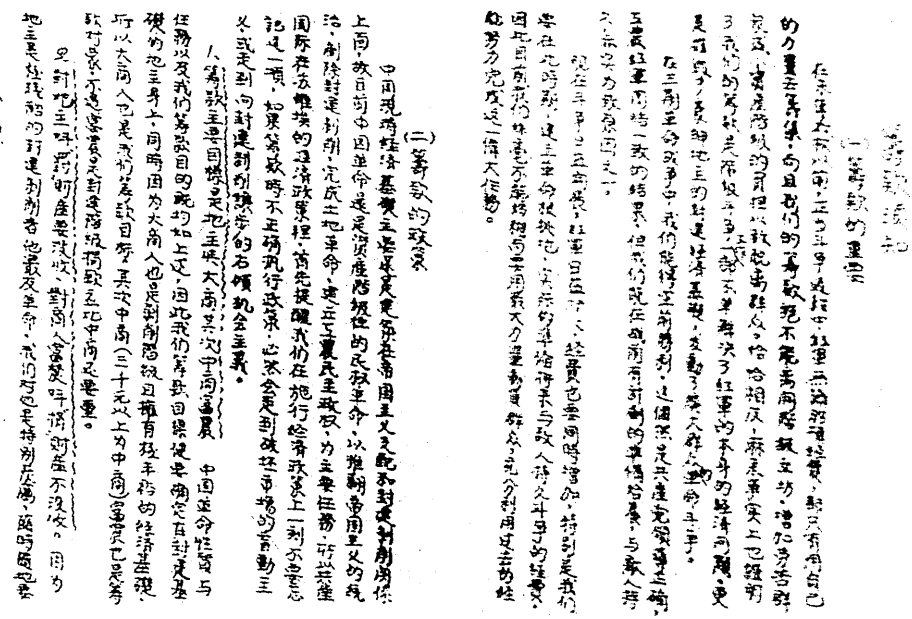
《向赣南闽西进军》（油画）

筹款公函

（1929年2月13日）

红军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军队，对于商人极力保护，纪律森严，毫无侵犯。现因军粮拮据，特函前来，请代筹军饷大洋五千元，草鞋、袜子各七千双，白布三百匹，夫子二百名。务于本日下午八时以前送来本部。即希查照办理，切勿玩延。如坐视不理，即证明宁都商人显系与宁都反动派勾结一气，故意与红军为难，本军唯有将宁都反动商店进行焚毁，以警奸顽，勿谓言之不早也。

晚上八时前，招待处执事们按时将所筹款和雇用的民工带到红四军军部军需处。此次筹款任务顺利完成。



筹款須知

（一）筹款的重要

在苏维埃政权的前，正当红军正进行红色恐怖的时候，红军无论粮饷经费，都只有自己的力量去筹集。而且我们的筹款绝不能与国民党政权，地主阶级的剥削比较能高涨的反抗相反，恰恰相反，恰恰是事实上也证明了我们的筹款是帝国主义不单解决了红军的不平的经济问题，更是推翻了反动地主的封建经济基础，发动了广大群众参加革命的主要。

在三次革命战争中，我们能够迅速胜利，这个原因是共产党领导正确，工农红军周密的结果，但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有了新的革命基础与敌人持久斗争的经济来源。

现在革命已经发展，红军日益扩大，经费也要同时增加，特别是我们要在此时期，建立革命政权，实行革命政策与敌人持久斗争的经济来源，因此目前我们决定不能坐待别人去用我们力量动员，群众，充分利用过去的经验努力完成这一伟大任务。

（二）筹款的政策

中国现阶段经济基础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在帝国主义支配和封建剥削关系上面，故目前中国革命是属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以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剥除封建剥削，完成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为主要任务，所以共产国际在苏维埃的经济政策程，首先提醒我们在施行经济政策上一刻不要忘记这一点，如果筹款时不正确执行政策，必然会走到破坏市场的盲动主义或走到向封建剥削妥协的右倾机会主义。

（筹款主要目标是地主及大商人等）

中国革命性质与任务以及我们筹款目的既如上述，因此我们筹款目标便是彻底打倒封建基础的地主阶级，同时因为大商人也是剥削阶级且握有极丰厚的经济基础，所以大商人也是我们筹款目标，其次中商（三十元以上为中商）富农也是筹款对象，不过富农是封建阶级，所以对富农五地中间必要重。

至于地主呼吁，所谓地主要没收，对商人富农呼吁，所谓不没收。因为地主是代表的封建剥削者，他最反革命，我们对他是特别压榨，所以要地主

图为湘赣军区政治部翻印的《筹款须知》，对筹款的政策作了具体规定。

告商人及知识分子

（1929年3月16日）

做生意的同胞们，读书的同胞们：

（一）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到你们这里来了，共产党会怎样对待你们呢？你们要怎样对待共产党呢？

（二）共产党在现时领导的革命，叫作民权革命，是要打倒三个反动的东西。第一个，打倒帝国主义，不许洋人在中国逞凶，中国归中国人管，不许洋人支配中国；第二个，打倒地主阶级，废止收租制度，田地平分给农民；第三个，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政府。这就是共产党现时领导奋斗的三个大任务。

（三）提出这三种任务，你们不要吓倒了，岂但不要吓倒，应该十分欢迎。做到这三件事，是工农阶级的盼望，也是于你们大有益的。你们明白你们的地位吗？你们是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洋货不断地进口，中国工商业不能发展，你们想，打倒了帝国主义于你们的益处有多大？半封建的地主阶级集中了多数田地在他们手里，重租重息，农民贫困到十分，乡下无钱到城市买货，城市工商业因此凋敝不能发展。打倒了地主阶级，取消了收租制度，农民得到了完全的收获，向城市的买货的力量大大增加。你们想，城市的生意不会大大发达吗？国民党及其政府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地主阶级的代表，国民党及其政府打倒了，帝国主义失去

了走狗，地主阶级失去了代表，工农兵政府掌握了政权，民权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的革命）就算有成功的希望了，你们不觉得于你们是有益处的吗？

（四）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对大商人酌量筹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城市反动分子（军阀的走狗、贪官污吏、国民党指导委员、工贼、农贼、学贼）的财物要没收。乡村收租放息为富不仁的土豪搬到城市住家的，他们的财物也要没收。至于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但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应该赞助工农革命，服从工农阶级的指导，齐心一致向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政府三大任务上努力，不要三心二意，表示服从，心怀敌意。须知共产党领导的民权革命一定要成功的，而且很快要成功的，此时一不服从，就走入反革命一路，将来决无立足之地。

（五）知识分子的出路，也只有参加工农革命。知识分子若肯参加革命，工农阶级均可收容他们，依照他们才干的大小，分配他们相当的工作。红军政治部正须招收大批政治工作人员，那些能够刻苦耐劳勇敢奋斗的革命学生们、教职员们，均可加入红军来做政治工作。

（六）蒋桂战争已在两湖爆发，全国新军阀大战业已发动了。欺骗民众的国民党已完全解体，三民主义完全是狗屁，全国统一完全是臭话。美国走狗的蒋派冯派、英国走狗的桂派、日本走狗的奉派阎派，只是为着私利就混战起来。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各派新军阀之倒台溃败就在眼前，工农阶级的革命政权不久就要代替反革命政权而出现于全国。商人们、学生们、一切被压迫的小资产阶级，速

起来帮助工农阶级参加此历史的革命斗争啊！

商人起来帮助工农阶级！

学生起来帮助工农阶级！

商人要使商业发展，只有赞助土地革命增加农民的生产力和购买力！

商人要使商业发展，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断绝洋货的来源！

商人要使商业发展，只有推翻国民党政府拥护工农兵政府！

商人要赞助革命，共产党就不没收他们的财产，并保护他们的商业自由！

革命的知识分子加入工农革命的队伍里来！

革命的知识分子加入红军政治部！

民权革命万岁！

全国被压迫阶级解放万岁！

共产党红军第四军军党部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

（1929年3月20日）

福建省委并飞转中央：

1. 我们（红军第四军）三月十四日攻克汀州[2]城。郭凤鸣（福建第二旅旅长）打死，陈尸汀市三日。缴获步枪约五百支（单响、九响多，红军用不着），马枪七、八支，迫击炮三尊，炮弹一百余发。郭旅残部向上杭溃退。

2. 汀州群众很好，我们散发土豪及反动派的谷子、财物并扩大宣传后，工人及近城农民大大起来，连日建立农会、工会的基本组织（分秘密公开两种），日内即成立临时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目下是政治部代替政权机关。

3. 时局开展（我们看到三月三日的上海报，三月十三日的……及漳潮两报），闽西及赣南望中央将一般计划指示我们。红军应该怎样行动，尤盼飞速指示！

4. 对一般的计划，我们意见：在全国范围内要猛力地夺取群众，这时候无论什么派别欺骗群众，都敌不过我们共产党的事实了。工农外，兵士群众的夺取，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一般工作的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共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名义给中共中央的信。

[2] 汀州，旧府名，即福建长汀。

重心，我们的意见：宜在江苏、直隶[1]，红军小区域苏维埃使个数加多，这不仅在湘赣粤闽等地，江苏北皖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

5. 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

6. 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李文林部）约四百枪，战斗力颇好，现在兴国、泰和、赣州之交。独立第四团（段月泉部）约三百余枪，战斗力尚弱，现在兴国、于都之交。红军彭德怀[2]部约三百枪（井冈山逃出来沿途失散后存余者），在于都、信丰之间。三月七日彭部袭击刘士毅[3]残部，缴步枪百余，水旱机关枪各一，子弹七担。红军第四军大概十天内尚在闽边工作，十天外须赴赣边瑞金、宁都一带游击。那时须看湘赣战局的形势，从有利于红军的发展及有利于工农群众发展的标准上去决定行动。或再回闽边，或在赣南作较久时间的游击，或往吉安去接近国民党的战区。惟闽西赣南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

7. 福建省委须立即派遣一闽西特委来汀州指导汀属八邑[4]工

---

[1] 直隶，旧省名，辖今北京、天津两市，河北省大部和河南、山东两省的小部地区，1928年改为河北省。

[2] 彭德怀，当时任红军第五军军长。

[3] 刘士毅，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五师副师长兼第十五旅旅长。

[4] 汀属八邑，指旧汀州府下辖的归化、长汀、上杭、永定、宁化、清流、连城和武平8个县。

作，汀属党部太弱，担负不起建设政权的责任。目前主要的工作是扩大党的组织及群众的组织，建设政权机关及闽西红军（现在枪无人抬），望省委以大力注意此间。

8. 福建全省，浙江全省，赣东赣南两边，统治阶级的军力非常薄弱（在全国来比较），未知中央曾讨论以此三地方为目标，首先创造公开割据的计划否？三地统治势力既弱，又通海口，这是值得注意的。

9. 我们自一月十四日离开井冈山，主因是经济无出路。二十日在大余与李文彬[1]作战失利，循粤边南雄入赣南信丰、安远、寻乌，曾三次与追兵接触，均且战且退。二月一日到闽粤赣三省交界之罗福嶂[2]停脚一天，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到罗福嶂后为安置伤兵计，为找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宁都、兴国、吉安之交，地属吉安）。二月十一日到宁都之大柏地，与追兵之先头部队刘士毅第十五旅两团战，大败之。我军士气大振，缴得步枪二百余，水旱机关枪六架，俘敌甚众。敌之残部，溃退赣州。追兵后续队伍李文彬部（三团）到来，我们则已往东固。在东固休息一星期，与江西红军二、四两团会合，并与江西赣南特委接上了头（在于都），安置了伤兵。及李文彬（赣军最精锐部）追至东固，乃决定抛弃了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3]），以对付敌人之跟踪穷追政策。二月二十五日离开东固，经永丰、乐安、广昌、石城，复入宁

[1] 李文彬，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七师第二十一旅旅长。

[2] 罗福嶂，村名，位于江西寻乌东部。

[3] 打圈子政策，是毛泽东对井冈山初期红军游击战术的一种形象说法。

都、瑞金之壬田市，后卫距敌才一里，乃我们离开壬田市向汀州之原因。张旅[1]忽然折回，盖湖南战事爆发，蒋系须集中部队，故将张旅调回，因此我们得安心对付郭凤鸣旅。十三、四日两次击溃郭部二、四团，而红军亦在兴国、于都一带发展。第四军从井冈山出发以来，总计损失约二百余枪，六百人，最大的就是干部损失多员最为可惜。此次困难为自有红军以来最大之困难，尽了我们的精力，才应付过这个难关，而得现时之胜利。内部团结坚固（最困难时兵士开小差的极少，干部袁文才[2]等数人脱离队伍），党的指导不错，亦为战胜困难的原因。

10. 军中党的最高机关是中央任命的前敌委员会（因事实的需要，除中央任命的名单外增了几人）。第四军除留在湘赣边界的一部分外，出来的部队现编为三个纵队，共三千人，枪一千五百，子弹极少。因战事太多，老的干部损失太大，战斗力不及从前。但井冈山出发以来的疲败精神，业已恢复，士气亦已振奋起来。因两次损伤的结果，军官及政治工作人员之缺乏，达于极点，亟盼中央派人来补充，至少须派军事的政治的教官各数人，来此开办训练学校。

11. 两年以来因交通隔绝，仅得中央来件二次。一是去年六月四日的长信，十一月间在井冈山接到的；一是六次大会[3]决议案

---

[1] 张旅，指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旅，旅长张与仁。

[2] 袁文才，1929年随红军第四军转战赣南闽西途中，脱离队伍回井冈山，仍坚持革命，任中共宁冈县委常委。

[3] 六次大会，指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军事、组织等问题的决议案。

（政治，军事，土地，政权，农民，大会……结[1]六件），今年一月在永新接到的。我们寄给中央的信：去年八月毛泽东之一长信，由湖南省委转；去年十一月前委之详细报告[2]，由湖南江西两省委转，此报告历述两年来湘赣边界斗争之经过，红军之现在计划等，不知均曾收到否？

12. 六次大会的决议案非常正确，我们欢跃地接受。前已油印五百余本散发井冈山以来沿途的党部，现又石印一千本，为闽西赣南扩大组织之用。惟少组织、宣传、职工三决议案，乞即补寄！

13. 闽西特委须速建立。赣南特委与江西省委非常隔绝，但与前委已发生密切关系。湘赣边界特委自去年五月成立以后，与湖南省委关系较密，与江西省委关系较少。赣南党部，于都及东固最好，兴国、信丰、宁都、安远、寻乌次之，瑞金、会昌、石城尚无组织。长汀在开始发展中，最好之永定，离我们三百余里。为应付江西事变，红军此刻不能去永定。阮山[3]同志的红军有开来汀州之必要，必须如此，我们去江西后，汀州的政权才可以继续，才可以与我们取得密切的联络。郭凤鸣死，汀州再无人管，八邑中心工作应在长汀，望省委熟计。

14. 中央在估计力量时，不可把我们估量得太大。

前委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日

---

[1] 原文如此。

[2] 即《井冈山的斗争》。

[3] 阮山，当时是闽西红军游击队的领导人之一。

敬告士兵群众书[1]

（1929年3月27日）

本军是共产党的军队，是贫苦工农的化身，我们誓为工农利益奋斗，以求得到彻底的解放！

你们与工农同是被压迫的贫苦群众，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是你们共同的敌人，为解放工农，为解放你们自己，我们特地号召你们起来：实行兵变！回枪打张贞[2]！回枪杀压迫你们的长官！参加土地革命、分取土地！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向国民党暂编第一师发布的《敬告士兵群众书》的主要内容。

[2] 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

（1929年4月5日）

中央：

二月七日的信[2]由福建省委转来，四月三日在瑞金收到。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三次进攻井冈山[3]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高潮逐渐低落，革命高潮逐渐生长。我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言，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地消灭。群众是一定倾向我们的。屠杀主义又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不能再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形势之下，什么党都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六次大会[4]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十分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党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武装暴动。但革命发展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精神。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口号积极精神才能领

---

[1] 这是毛泽东起草的中共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的信。

[2] 指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给中共红军第四军前委的信。

[3] 指1929年初湖南、江西两省的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

[4] 指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精神之下才能有可能。我们感觉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极大的错误，现时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闽西赣南我们所经过的地方党部，战斗的精神非常之弱，许多斗争的机会轻易放过去了。群众是广大而且革命的，党却袖手不去领导。由闽西赣南的例子使我们想到别的地方或者也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们要反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恶劣倾向，但取消主义和不动主义的倾向又要极力防止。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正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六次大会指出了忽视农民革命的错误。中央此信有“发展农村中广大的普遍的斗争”之言，这种意见才是对的。

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大的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前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都是失败的。因为：（一）红军不是本地人，与地方武装的赤卫队来说完全不同。湘赣边界宁冈各县的农民只愿在本县赤卫队当兵，不愿入红军，因此红军简直寻不出几个湘赣边界的农民。红军成分是老的国

民革命军、浏平[1]湘南的农军和迭次战役的俘虏兵。（二）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恶劣环境中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五军在平浏，四军在边界在湘南，因分兵而被敌人击破者共有五次之多。（四）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方能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刻不能离。此次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因为我们部队是集中的，领导机关（前委）和负责人（朱、毛）的态度是坚决奋斗的，所以不但敌人无奈我何，而且敌人的损失大于他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则大于我们的损失。宁都和汀州二役[2]的胜利，地头蛇之郭刘二旅完全消灭了战斗力，使赣南闽西一方清汉，致有现在之群众发动成绩者非部队集中、指导机关健全决办不到。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

---

[1] 浏平，指湖南浏阳和平江。

[2] 指大柏地战斗和长汀战斗。1929年2月10日至11日，红军第四军在江西宁都大柏地（后改属瑞金），伏击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五师第十五旅刘士毅部，歼灭该旅大部，俘虏敌团长以下800多人，缴枪800余支。1929年3月13日至14日，红军第四军与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暂编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激战于福建长汀的渔溪、长岭寨一带，全歼敌军2000余人，击毙旅长郭凤鸣，并乘胜占领长汀城。

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来都用这种战术。在湘赣边界时，大概集中兵力一度击溃敌人之后，可以散开工作两三星期（分数大支出去，每大支又分数小支出去），及至敌人再整军来，我们又集中起来了，再击溃敌人，再分散工作。此次敌人穷追，我们用盘旋式的游击，可以走很宽的地方，发动很宽的群众。每到一处少则顿住半天，多则顿住五天，先之以广大的宣传（政治部统属的文字宣传队和口头宣传队，均以连为单位，每连二队，每队三人，路上行军及每到一处，宣传就立刻普及），继之以散发财物（大地主及反动分子的谷子、衣服、器具），然后进行组织（党的支部、秘密工会、秘密农会）。群众工作的技术，现在比以前更娴熟了。这时候的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时间、分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现在的队伍，与叶贺[1]时候的队伍大不相同，叶贺的队伍是单纯打仗的，若在今日，决不能存在的。红军无论在什么时候，党及军事的统一指挥机关是不可少的，否则陷于无政府，定是失败。

现在党的指导机关是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军事指挥机关是军司令部，朱德为军长。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2]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3]同

---

[1]　叶，指叶挺（1896—1946），广东惠阳人，北伐战争中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昌卫戍司令，1927年8月率部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代理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贺，指贺龙（1896—1969），湖南桑植人，北伐战争中曾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军长，1927年8月率部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代理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第二十军军长。

[2]　刘伯承（1892—1986），四川开县人，当时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时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

[3]　恽代英（1895—1931），江苏武进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

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中央去年六月来信说派贺昌[1]同志来视察，不知为何没有来，现在从福建来交通极便，以后务望随时派人来视察。

自刘郭二旅击溃之后，闽西赣南可以说没有敌人了。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目前，国民党统治从此瓦解，革命高潮很快地会到来。在这种时局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粤湘二省中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湘省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政策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失尽。赣浙闽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2]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然郭旅已被击破，陈国辉卢兴邦[3]二部均土匪军，战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亦未打过仗，战力谅不大，只有张贞[4]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二团好的，且五部完全是无政府，不统一。江西朱培德熊式辉[5]二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则差得多，其中一大半和我们作战过，除李文彬[6]一旅之外其余都是被我们打败过的。第

---

[1] 贺昌（1906—1935），山西柳林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

[2] 蒋伯诚（1889—1952），浙江诸暨人，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防军司令。

[3] 陈国辉（1898—1932），福建南安人，当时任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卢兴邦（1880—1945），福建尤溪人，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二师师长。

[4] 张贞（1884—1963），福建诏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5] 朱培德（1889—1937），云南盐兴（今属禄丰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1893—1974），江西安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集团军第五师师长。

[6] 李文彬，云南盐兴（今属禄丰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二十一旅旅长。

二，三省党的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明了外，江西福建二省党及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等县党及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是很大的，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有一天一天发展之势，赣东方志敏[1]的红军独立第三团[2]并未消灭，如此已造成了向南昌包围之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混战的长期战斗中间，我们要和蒋桂二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此一年中，要在上海、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等处建设无产阶级斗争的基础，使能领导赣浙闽三省的农民斗争。江西省委必须健全，南昌、九江、吉安及南浔路的职工基础须努力建立起来。

我们三月十四日到汀州，战败郭旅，打死郭凤鸣，始知蒋桂决裂，国民党大混战快到来。对于目前工作的布置，决定在国民党混战初期，以闽西赣南二十余县一大区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群众的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设工农政权，由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因此，我们不下杭、永[3]，也不去龙岩，在汀工作十七日，于四月一日开到瑞金，定四月八日进占于都，到于都当召集一扩大会，与赣南特委与中央军事部派来的罗寿男同志等讨论行动计划。闽西赣南的民众都非常之好，在长汀县城及新桥、河田等地工作时，夺取

---

[1]　方志敏（1899—1935），江西弋阳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第十军的主要创建人。

[2]　独立第三团，似应为独立第一团。

[3]　杭、永，指福建上杭和永定。

土劣谷子的群众，一聚就有几千。在汀州组织了二十个秘密农协，五个秘密工会，总工会也成立了。党的组织比前发展二倍。组织了一个赤卫队，单独站不住，现随军来到瑞金。政权机关开始是临时革命委员会，由政治部任命的，及至工会、农会各组织了几个之后，即召集代表会议选举正式革命委员会。临时与正式的革委都发布政纲。到瑞金规定四天工作计划，把部队分散到县城、壬田市、西江、九堡四地工作，每地再分小支，指挥机关在县城。瑞金民众如火如荼地起来，欢迎我们，和地主斗争非常勇敢。可惜以前全无组织，一个同志都没有，无本地领导，组织工作仓卒，难做得好，特别是县城。到于都后大约有一星期在县城及四郊工作，以后或向宁都、广昌，或向万安、泰和，看情形决定。赣南游击一个时期，再赴闽西，那时须与郭凤鸣残部及卢兴邦、陈国辉战，福建省委须努力准备。

军中状况，四军除小部分留边界外，大部分出来的计三千六百人，一千一百枪，在大余、信丰、寻乌损失约二百支枪，六百个人（多数是作战时失联络，真正被敌人拿去的不过几十枪，一百多人）。报纸所载那些骇人的消息，都是敌人欺骗的话。宁都汀州二战之后，不但恢复原状，而且增长了些。全军现编为第一第二第三三个纵队，每纵队辖二支队（等于营），每支队辖三大队（等于连），每纵队约枪五百余支，千二百余人。分兵游击时即以纵队为单位，分开出去，然后再分小支，分开、集合都很便利。彭德怀同志之第五军到井冈山者八百人、枪五百支，此次到瑞金者六百人四百枪，现在编为四军第五纵队，彭同志以副军长名义指挥之，数日后须返湘赣边界，收集旧部恢复政权，与赣南取得联络，仍属前委指挥。政治部已设立，军设军政治部，每纵队设纵队政治部。政治部内设

秘书处、宣传科、组织科（分职工、农民、特务三股）、政治保卫科。支队大队两级设党代表。纵队以上废除党代表，只有政治部主任。全军在汀做了整齐的服装，每人发四元零用费，给养已不成问题，士气非常振发。赣东黎川方面（与广昌接近）有两个部队想来接头，一是金汉鼎[1]部下反叛出来的五百多人，三百多枪，现编为第四纵队，纵队长田桂清；一是土匪军三百多人，二百多枪，到处被打无出路，现编为独立营，胡竹笙为营长。此两部约定四月十四日后开到宁都编就训练。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现在兴国一带，与我们联络很好。湘赣边界遭一度破败之后，现必到了恢复的机会，那边除王佐[2]部二百支枪系属红军第四军外，宁永莲遂酃茶[3]六县赤卫队共八百枪，在军阀混战无力顾及的时候，不但可以保守，且可以向外发展，彭同志率部回去，当更有办法。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是邓乾元同志。湘南自去年三月暴动失败之后，党的基础在盲动主义之下完全毁灭，农军武装也被豪绅缴去，群众都被镇压下去了。去年八月红军攻郴，在资兴、汝城、桂东组织三个县委，三个农民武装的赤卫队，另组织一特委统辖之，杜修经为书记。近接报告，他们又在盲动主义之下牺牲了。醴陵去春暴动后，党的组织打破，武装消灭之后，夏季又向四军领去七十支枪，秋季全部覆灭于攸、醴[4]交界之皇图岭，此足见少数武装单独存在之不易。

---

[1]　金汉鼎（1891—1967），云南黎县（今华宁）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十二师师长。

[2]　王佐（1898—1930），江西遂川人，当时任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团长。

[3]　宁永莲遂酃茶，指江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和湖南酃县、茶陵。

[4]　攸、醴，指湖南攸县和醴陵。

红军党的指导机关是中央任命的前委。去年六月四日中央来信云：关于前敌指导机关，中央视为有组织委员会之必要，委员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此外还须组织一职工委员会，前委之工人同志为书记，一军事委员会，朱德为书记，军委及工委名单由前委决定。所有管辖的范围，依据环境来决定，所有管辖区域内工作，完全为前委指挥。前委在江西时，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受湖南省委指导。主管的省委，接到前委的报告须立即回答，并将前委的报告及省委的回答立送中央。我们对中央这种组织的指示，视为十分适当，合于斗争的需要。超地方性质的红军，不但不宜受县委与特委的指挥，并不宜限定受某一省委指挥。五军在平、浏，四军在湘南及湘赣边界，多次地失败在地方主义指挥之下。超地方的红军必须在中央直接指挥之下，才能适合革命环境的需要，而不受地方主义的累害。

从去年八月起共有三个报告给中央。一个是去年八月毛泽东在边界失败时写的一封长信，讨论割据问题及湖南省委的政策，由湖南省委转中央，原稿已失。一个是去年十一月接到中央六月来信红军须重回湘赣边界时前委做的一个报告[1]，历史地叙述湘赣边界斗争的经过及割据问题政策计划等，由湘赣二省委付上，此信原稿尚存，特重写付上。以上两重要报告，中央一个也未收到，无怪对我们情形完全隔膜了。一个是三月二十日前委在长汀发的信，由福建省委转来，未知能达到否？今亦重新寄上。三年以来中央的刊物我们一本没有收到，及到汀州才看到《少年先锋》第三、四期，《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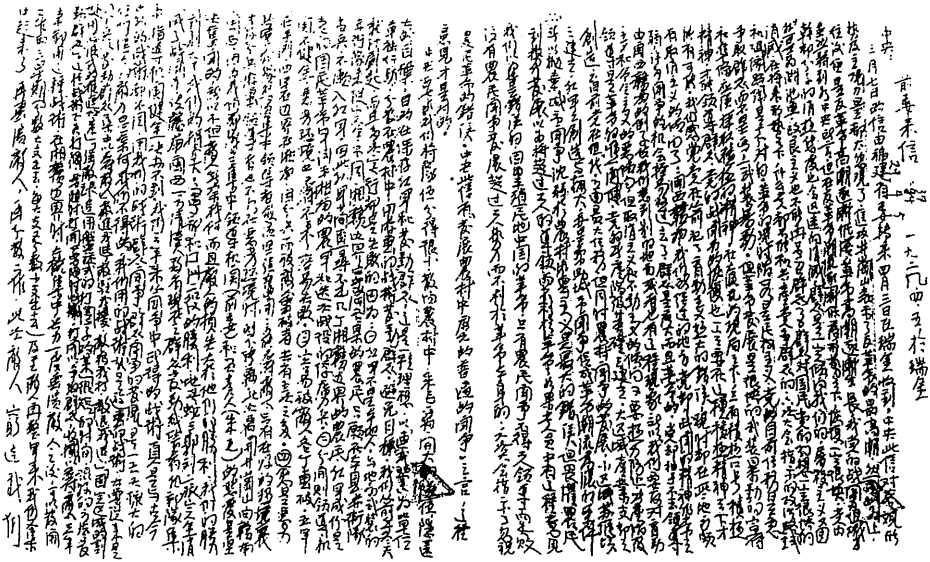
[1] 即《井冈山的斗争》。

工人》第三期，北京出版的《人言》第二期，汀州留沪同志出的《前响》第二期。在湘赣边界时，因敌人的封锁，曾二三个月看不到报纸。去年九月以后可以到吉安、长沙买报了，然亦得到很难。到赣南闽西以来，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且可看到何键[1]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以后望中央每月有一信给我们，我们亦至少每月给中央一信报告。中央的刊物并希设法寄来。

前委

一九二九、四、五、于瑞金

[1] 何键（1887—1956），湖南醴陵人，当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



1929年4月5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给中央写信。其中最早以文字记载了毛泽东、朱德在1928年5月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图为该信的部分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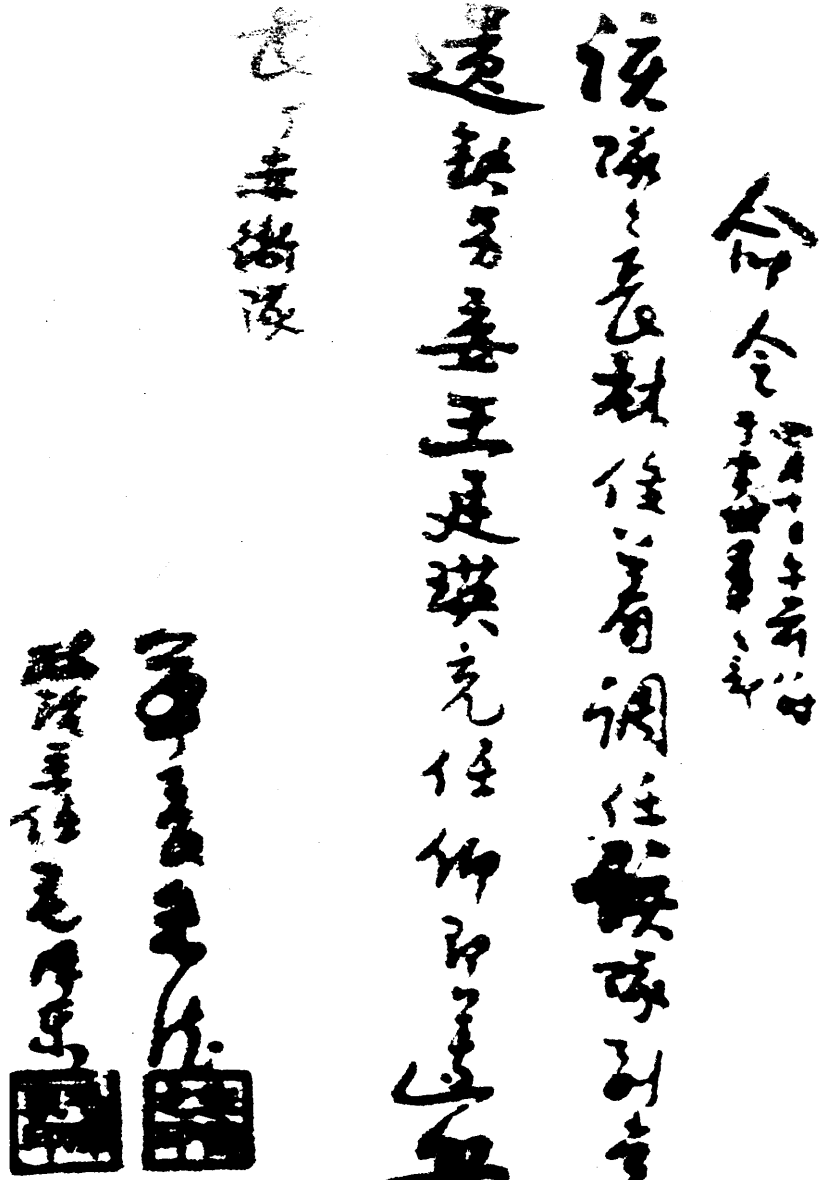
四军军部命令

（1929年4月10日）

该队队长林俊着任该队副党代表遗缺另委王廷瑛充任，仰即遵照。此令长汀赤卫队

军　　长　朱　德

政治主任　毛泽东



毛泽东、朱德给长汀赤卫队的命令。

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1]

（1929年4月13日）

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边界群众政权的形式有由公开割据改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各县赤卫队有组织红军采用游击战术的必要；守势的根据地的观念，以后应该抛弃，大小五井、九陇等地，再不必固守了，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

[1] 这是毛泽东在于都以中共红四军前委的名义，致湘赣边界特委信的部分内容。

（兴国县）土地法

（1929年4月）

（一）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耕种使用。

（二）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经工农兵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

（三）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

（1）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2）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土地一倍。以上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有特别情形的地方得适用第二个标准。采取第一个标准的理由：

（甲）在养老育婴的设备未完毕以前，老幼如分田过少，必致不能维持生活。

（乙）以人口为标准计算分田，比较简单方便。

（丙）没有老小的人家很少。同时老小虽无耕种能力，但在分得田地后，政府亦得分配以相当之公众勤务如任交通等。

（四）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

（1）以乡为单位分配。（2）以几乡为单位分配（如永新之小江区）。（3）以区为单位分配。

以上三种标准，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时，得适用第二

第三两种标准。

（五）山林分配法：

（1）茶山柴山照分田的办法，以乡为单位平均分配耕种使用。

（2）竹木山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但农民经苏维埃政府所许可后得享用竹木。竹木在五十根以下须得乡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下须得区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上须得县苏维埃政府许可。

（3）竹木概由县苏维埃政府出卖，所得之钱由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之。

（六）土地税之征收：

（1）土地税依照生产情形分为三种：（一）百分之十五，（二）百分之十，（三）百分之五。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经高级苏维埃批准，得分别适用二、三两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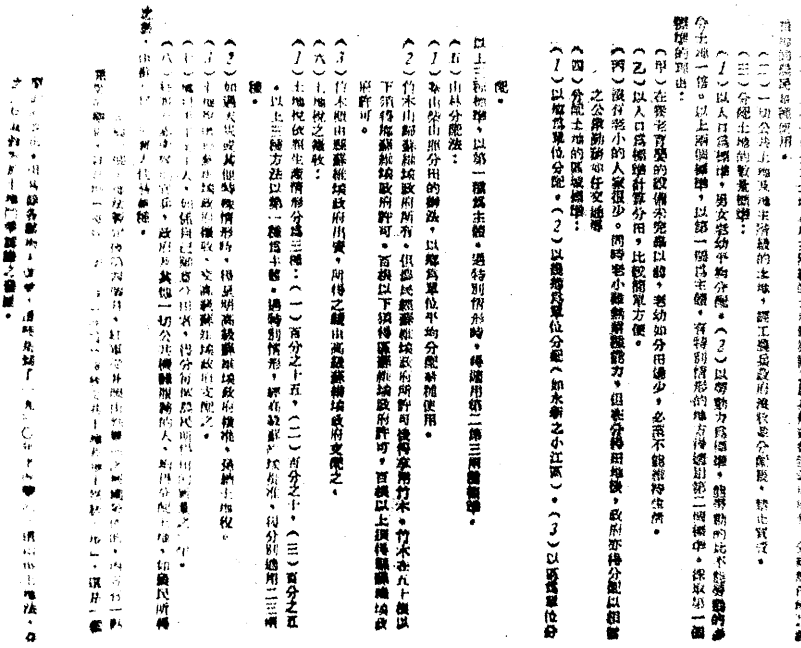
（2）如遇天灾或其他特殊情形时，得呈明高级苏维埃政府核准，免纳土地税。

（3）土地税由县苏维埃政府征收，交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之。

（七）乡村手工业工人，如系自己愿意分田者，得分每个农民所得田的数量之一半。

（八）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

按：这是前一个土地法制定后第四个月，红军从井岗山到赣南之兴国发布的，内容有一点重要的变更，就是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但其余点均未改变，这些是到了一九三〇年才改变的。这两个土地法，存之以见我们对于土地斗争认识之发展。



土地法

一九二九年四月興國縣土地法

（一）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分給無田地的人民耕種。

（二）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經工農兵政府准許者分配，禁止買賣。

（三）分配土地的數量標準：

（1）以人口為標準，男女老幼平均分配。（2）以勞動力為標準，能勞動的比不能勞動的多分土地一倍。以上兩個標準，以第一個為主體，有特別情形的地方得酌用第二個標準。採取第一個標準的理由：

（甲）在發老育嫩的設備未完備以前，老幼如分用過少，必感不能維持生活。

（乙）以人口為標準計算分田，比較簡單方便。

（丙）沒有老小的人家很少。同時老小雖無勞動能力，但老分得田地後，政府亦得分配以組織之公家勞動部隊去交換。

（四）分配土地的區域標準：

（1）以鄉為單位分配。（2）以幾鄉為單位分配（如永新之小江區）。（3）以縣為單位分配。

（五）山林分配法：

（1）森山照分田的辦法，以鄉為單位平均分配給種使用。

（2）竹木山歸蘇維埃政府所有。但農民經蘇維埃政府許可後得享用竹木。竹木在五十根以下須得鄉蘇維埃政府許可。百根以下須得區蘇維埃政府許可，百根以上須得縣蘇維埃政府許可。

（3）竹木照由縣蘇維埃政府用費，所得之錢由高級蘇維埃政府支配之。

（六）土地稅之種類：

（1）土地稅依照生產情形分為三種：（一）百分之十五，（二）百分之十，（三）百分之五。以上三種方法以第一種為主體。遇特別情形，經高級蘇維埃政府准，得分別適用二三兩種。

（2）如遇天災或其他特殊情形時，得呈請高級蘇維埃政府准，免納土地稅。

（3）土地稅由縣蘇維埃政府徵收，交高級蘇維埃政府支配之。

（4）地主不准參加土地政府徵收，沒分田者，得分何區農民所供用的糧食之一部。

（5）地主不准參加土地政府徵收，沒分田者，得分何區農民所供用的糧食之一部。

（八）地主階級一切公共機關服勞的人，如得分配土地，如農民所得之數，由縣蘇維埃政府決定。

（九）[illegible]

（十）[illegible]

（十一）[illegible]

（十二）[illegible]

（十三）[illegible]

（十四）[illegible]

（十五）[illegible]

（十六）[illegible]

（十七）[illegible]

（十八）[illegible]

（十九）[illegible]

（二十）[illegible]

（二十一）[illegible]

（二十二）[illegible]

（二十三）[illegible]

（二十四）[illegible]

（二十五）[illegible]

（二十六）[illegible]

（二十七）[illegible]

（二十八）[illegible]

（二十九）[illegible]

（三十）[illegible]

（三十一）[illegible]

（三十二）[illegible]

（三十三）[illegible]

（三十四）[illegible]

（三十五）[illegible]

（三十六）[illegible]

（三十七）[illegible]

（三十八）[illegible]

（三十九）[illegible]

（四十）[illegible]

（四十一）[illegible]

（四十二）[illegible]

（四十三）[illegible]

（四十四）[illegible]

（四十五）[illegible]

（四十六）[illegible]

（四十七）[illegible]

（四十八）[illegible]

（四十九）[illegible]

（五十）[illegible]

（五十一）[illegible]

（五十二）[illegible]

（五十三）[illegible]

（五十四）[illegible]

（五十五）[illegible]

（五十六）[illegible]

（五十七）[illegible]

（五十八）[illegible]

（五十九）[illegible]

（六十）[illegible]

（六十一）[illegible]

（六十二）[illegible]

（六十三）[illegible]

（六十四）[illegible]

（六十五）[illegible]

（六十六）[illegible]

（六十七）[illegible]

（六十八）[illegible]

（六十九）[illegible]

（七十）[illegible]

（七十一）[illegible]

（七十二）[illegible]

（七十三）[illegible]

（七十四）[illegible]

（七十五）[illegible]

（七十六）[illegible]

（七十七）[illegible]

（七十八）[illegible]

（七十九）[illegible]

（八十）[illegible]

（八十一）[illegible]

（八十二）[illegible]

（八十三）[illegible]

（八十四）[illegible]

（八十五）[illegible]

（八十六）[illegible]

（八十七）[illegible]

（八十八）[illegible]

（八十九）[illegible]

（九十）[illegible]

（九十一）[illegible]

（九十二）[illegible]

（九十三）[illegible]

（九十四）[illegible]

（九十五）[illegible]

（九十六）[illegible]

（九十七）[illegible]

（九十八）[illegible]

（九十九）[illegible]

（一百）[illegible]

（一百一）[illegible]

（一百二）[illegible]

（一百三）[illegible]

（一百四）[illegible]

（一百五）[illegible]

（一百六）[illegible]

（一百七）[illegible]

（一百八）[illegible]

（一百九）[illegible]

（一百十）[illegible]

（一百十一）[illegible]

（一百十二）[illegible]

（一百十三）[illegible]

（一百十四）[illegible]

（一百十五）[illegible]

（一百十六）[illegible]

（一百十七）[illegible]

（一百十八）[illegible]

（一百十九）[illegible]

（一百二十）[illegible]

（一百二十一）[illegible]

（一百二十二）[illegible]

（一百二十三）[illegible]

（一百二十四）[illegible]

（一百二十五）[illegible]

（一百二十六）[illegible]

（一百二十七）[illegible]

（一百二十八）[illegible]

（一百二十九）[illegible]

（一百三十）[illegible]

（一百三十一）[illegible]

（一百三十二）[illegible]

（一百三十三）[illegible]

（一百三十四）[illegible]

（一百三十五）[illegible]

（一百三十六）[illegible]

（一百三十七）[illegible]

（一百三十八）[illegible]

（一百三十九）[illegible]

（一百四十）[illegible]

（一百四十一）[illegible]

（一百四十二）[illegible]

（一百四十三）[illegible]

（一百四十四）[illegible]

（一百四十五）[illegible]

（一百四十六）[illegible]

（一百四十七）[illegible]

（一百四十八）[illegible]

（一百四十九）[illegible]

（一百五十）[illegible]

（一百五十一）[illegible]

（一百五十二）[illegible]

（一百五十三）[illegible]

（一百五十四）[illegible]

（一百五十五）[illegible]

（一百五十六）[illegible]

（一百五十七）[illegible]

（一百五十八）[illegible]

（一百五十九）[illegible]

（一百六十）[illegible]

（一百六十一）[illegible]

（一百六十二）[illegible]

（一百六十三）[illegible]

（一百六十四）[illegible]

（一百六十五）[illegible]

（一百六十六）[illegible]

（一百六十七）[illegible]

（一百六十八）[illegible]

（一百六十九）[illegible]

（一百七十）[illegible]

（一百七十一）[illegible]

（一百七十二）[illegible]

（一百七十三）[illegible]

（一百七十四）[illegible]

（一百七十五）[illegible]

（一百七十六）[illegible]

（一百七十七）[illegible]

（一百七十八）[illegible]

（一百七十九）[illegible]

（一百八十）[illegible]

（一百八十一）[illegible]

（一百八十二）[illegible]

（一百八十三）[illegible]

（一百八十四）[illegible]

（一百八十五）[illegible]

（一百八十六）[illegible]

（一百八十七）[illegible]

（一百八十八）[illegible]

（一百八十九）[illegible]

（一百九十）[illegible]

（一百九十一）[illegible]

（一百九十二）[illegible]

（一百九十三）[illegible]

（一百九十四）[illegible]

（一百九十五）[illegible]

（一百九十六）[illegible]

（一百九十七）[illegible]

（一百九十八）[illegible]

（一百九十九）[illegible]

（二百）[illegible]

1929年4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江西于都。图为毛泽东根据于都、兴国调查等情况制定的《兴国县土地法》。

农民协会章程*

（1929年5月）

第一条　目的

农民协会之作用，在发动农民、组织农民、领导农民，对地主阶级斗争以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没收地主阶级田地分与农民，扫除农村中一切封建势力为目的。

第二条　会员

（1）农民协会之会员，为雇农、佃农及其他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农民。

（2）农村手工人，尚无工会组织之时，亦得加入农民协会。

（3）革命的农村妇女，必须引导加入农民协会。

（4）会员年龄规定十四岁以上。

（5）一切收租的人、放重利的人及反动分子，不准入会。

（6）非农民之革命分子（赞成土地革命主张不还租、不还债的人）经全乡会员大会五分之三通过亦可入会。

（7）会员入会手续。

（甲）有会员二人介绍。

（乙）执行委员会通过。

（丙）填写入会表。

第三条　乡农民协会

（1）三人至十人成一小组，选举组长一人。每七天开会一次。

（2）三个以上小组，成一乡农民协会。

（3）全乡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每小组派代表一人至三人）选举委员五人至七人，组织执行委员会。

（4）执行委员会，互选委员长一人、组织科长一人（内设雇农、青年、妇女三股）、宣传科长一人、土地科长一人、财务科长一人、粮食科长一人、军事科长一人，聘秘书一人。

（5）执行委员三分之二，及委员长、粮食科长、土地科长、军事科长必须雇农或佃农方能充当。

（6）执行委员任期三月。

（7）乡代表大会每十五天开会一次。执行委员会每三天开会一次。临时会随时召集。

（8）地方过大、人口很多、不便指挥之乡得设立村农民协会，受乡农民协会之指挥。委员会人数及分科，得比照乡农民协会酌量减少，会期与同。

（9）执行委员任期三个月。

第四条　区农民协会

（1）三个以上乡农民协会成一区农民协会。

（2）全区代表会，每乡三人至九人须全部或至少三分之二是雇农、佃农议决。

（3）在有工会的区域内，须组织区革命委员会，不要区农民协会，区内各事，选举委员七人至十三人组织执行委员会。

（4）执行委员会，互选委员长一人、宣传科长一人、组织科长一人（内设雇农、青年、妇女三股）、土地科长一人、财务科长一人、粮食科长一人、军事科长一人、秘书一人。以委员长、组织科

长、土地科长、财务科长、军事科长五人组成常务委员会。

（5）执行委员任期三个月。

（6）执行委员会三分之二及委员长、土地科长、粮食科长、军事科长，均须雇农或佃农方能充当。

（7）区代表大会，每月开会一次。委员会，每七天开会一次。常委会三天开会一次。临时会随时召集。

（8）区农民协会，受县革命委员会管辖（县不设农民协会）。

第五条　农民协会的工作

（1）把革命农民组织于各乡农民协会之内。

（2）对一般农民作普遍的宣传（特别是肃清反动势力、解决土地问题二项）。

（3）对组织了的农民，加以政治斗争的训练。

（4）打击地主阶级。

（甲）对于平素欺压工农、阻碍工农革命运动或经手公款账目不清的土豪劣绅和他们的走狗，一概捉拿起来，依其情节轻重处以死刑、监禁、肉刑、罚款、赔偿、游行示众、写悔过字等刑罚。

（乙）没收收租二百担以上的大地主的谷子、衣服、器具、房屋，以大部分分与贫农，小部分归农民协会应用。勒令收租二百担以下的小地主减轻谷价。

（丙）废除农民对地主的一切债务（商人及工人、农民相互间的债务不在此例）。

（丁）举行群众大会焚毁田契借约（关于地主的）。

（5）组织赤卫队举行游击。

（6）发动没收一切收租田地（大、小地主的，祠堂的，公会的）的斗争，到群众革命情绪高涨时实行没收，分配贫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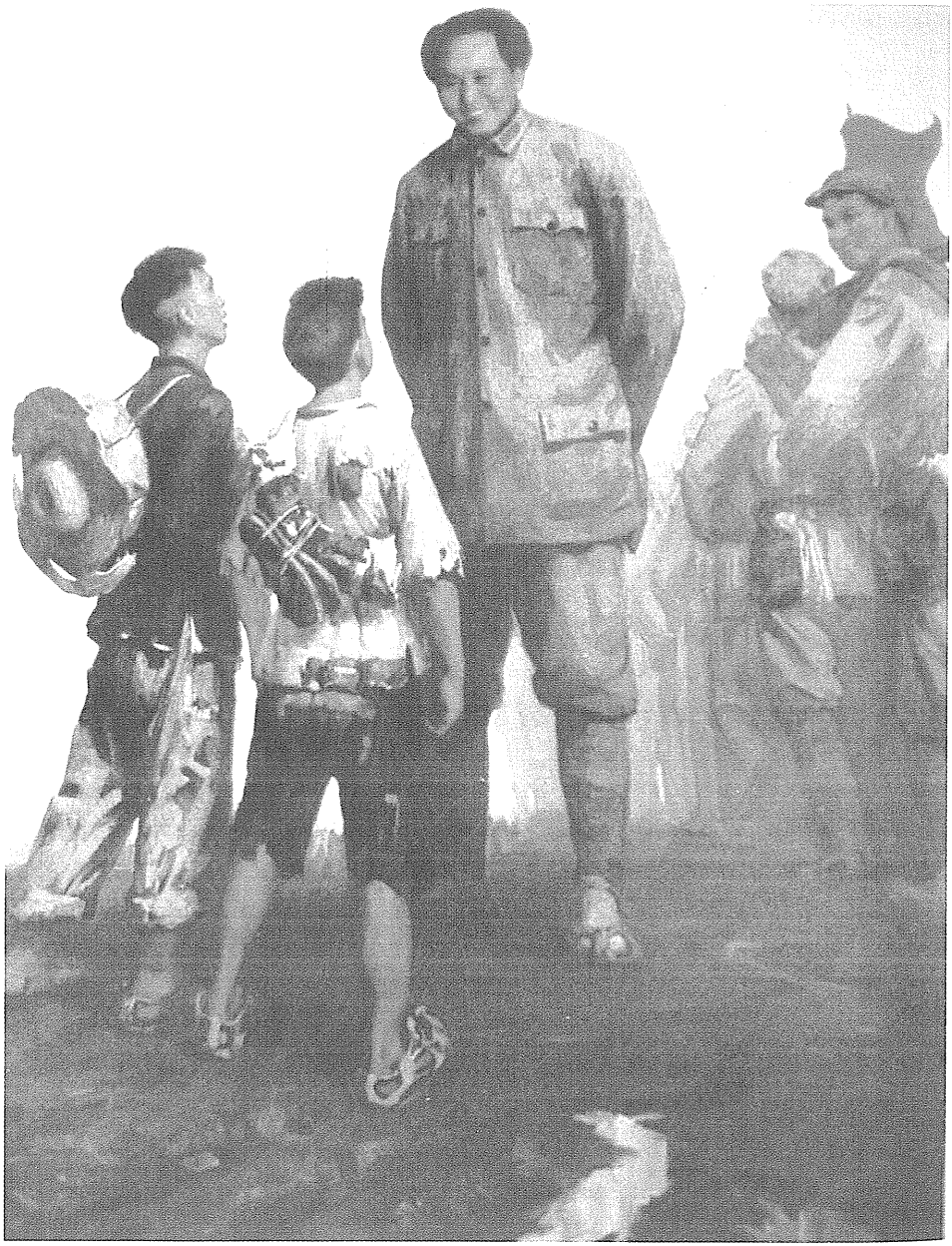
（7）筹备建立区乡两级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

第六条　农民协会与工农兵政府

农民协会是组织群众发动斗争的机关，到了群众的斗争大大发动了，群众大多数有了组织了，此时就要组织区乡两级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以代替农民协会，而于工农兵政府下，设立贫农委员会，为代表贫农利益的机关。

第七条　经费

农民协会经费以会费（会员每人每月出铜元五枚）及打土豪充当。



《贫农的儿子》（油画）

红军第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

（1929年6月1日）

中央：

1. 我军（第四军一、二纵队）由瑞金不攻汀州取道直趋龙岩，五月二十四日到达龙岩城及其附近，坎市之陈国辉部两营，一特务连，一机关枪连，骤不及备，大部缴械，得机关枪两挺，步枪二百余支，子弹三万发，俘营长一，士兵二百余。

2. 因永定有郭凤鸣部黄月波团，有迅速击破之必要，五月二十六日进攻永定，黄团不战而退上杭。

3. 我军现在永定分兵各县城湖雷、金丰等处游击，帮助革命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并去发动群众斗争的新区域，消灭民团势力，刻在工作中。

五日后即移往他县（龙岩、上杭等），闽西党有相当基础，群众也好，各县斗争日益发展，前途希望很大，张贞、陈国辉、卢新铭大部入粤，闽西、闽南空虚，张贞、陈国辉、卢新铭（代郭旅长）三个残部合计五千人，故此时在闽西一带游击，是最好的机会，望省委对这方面工作多加指导。

---

[1] 本文序号不连贯，编者未加改动，均按原文刊印。

4. 我们四月一日退出汀州到瑞金，在瑞金、于都、赣州东乡、宁都、兴国五县做消灭反动武装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共为四十五天，路线是从瑞金到于都到赣州东乡到兴国到宁都，五月十五日再到瑞金，每到一县，每到一地，把队伍分散往各乡，往一乡的队伍再分小支，这样集中分散容易于争取群众、对付敌人，发展亦不至偏于一隅，与中央指示的“分开游击，统一指挥”相合，现在闽西是这样的。

5. 在赣南游击四十五天内朱培德又闹剿匪，一旅由赣州进于都，一旅由泰和进兴国。一路由抚州进宁都，瑞金由抚州来的是王均师李文彬部，我们在瑞金但未游击，我们向龙岩来，他亦进汀州。在此刻军阀发动全国大混战的时候，此一部敌军或无再追我之可能，唯尚不能完全断定刻在探查中。我们对于这等战争强的军队，决采打圈子政策，不到条件具备（如地势与群众）有胜算可操时，决不和他碰头，所以敌也终无奈何我们。

6. 赣南党与群众的基础，以背都兴国及赣州东乡比较好，安远……宁都次之，瑞金刚在开始，石城、广昌、南丰等县无组织，新改组的赣南特委在赣南于都工作人员很缺乏，一部分地方有盲动主义，多部分还有机会主义（不动主义），省委对他们的指挥很稀少，于都、兴国、宁都三县都有了政权机关（工农兵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之下是农会工会。赣南各县地主势力很弱，前有刘士毅、赖世琮（赖世璜弟）两部土著军队，十分为害，刘旅被红军之二次击溃，残部调往沪浙，赖部于四月三十日红军攻克宁都时，又完全消灭（俘赖世琮，缴好坏枪一百余）。此两部既不存在，朱培德军队又决不敢长驶偏僻之赣南，故赣南的前途，亦是很有希望的，因赣南的发展又可与赣西之井冈山（宁冈等六县）、赣东之方志敏部取得联

络，请中央通告江西省委注意这二处工作。

7. 一月二十六日到二十九日井冈山彭德怀同志两连兵抵抗很大的会剿军至四日四夜，终于被敌军攻破之。各县赤卫队及王佐营仍在边界，未受大的损失。彭同志即退来赣南缴得刘士毅部枪百余，四月一日与四军在瑞金会合。前委决定彭同志部及王部改编为第四军第五纵队（第四纵队缺），王佐同志为纵队长，湘赣边界赤卫队为四军第六纵队，贺国中同志为纵队长，共有枪一千四百支，此两纵队战斗力颇强。此两纵队属于彭同志以四军副军长名义（对内彭为书记）指挥，湘赣边界军委隶属于前委，前委不能直接指挥时则受湘赣边特委指挥，游击的区域是以宁冈为中心，边界各县有势力广大的提为斗争区域，注意与赣闽路联系。四月十四日彭同志部从于都出发，往信丰、南康……遂川四边界以后从……抵……积他们的活动……江西省委指挥之下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共有枪约一千支（四军补充五百支，好坏各半），两面战斗力颇好，四团成立不久较差，内部组织也颇健全，党在军事上很能发生作用，他们游击的区域是吉安……泰和、万安、兴国……各县他们工作的方法比前较差，四军的影响须有进步。四军在赣南游击时他们受前委的指挥（与前委的关系不变），与四军一同做发展组织、发动群众斗争的工作，担任的区域是兴国及宁都之一部。四军来闽西后他们仍在那里以兴国为中心向四周各县游击。

9. 我们在宁都时东江特委曾到一信给我们，说东江准备暴动要红军分兵去彼帮助。前委复了他们一信，说不赞成此时举行总暴动，此时只能发动游击战争，红军实不能分兵去助，因彼反动势力很大，且不能很远路线发兵。来到闽西时又去了一信，要他们做群众工作，红军在闽西工作一时期后有向东江游击一时期的可能。东

江特委与闽西特委有联络，与赣南特委尚没有联络，依工作的进展，各特委有密切联系的必要，且有在省交界一带设指导机关之必要，或以前委固定设置于此，望中央讨论指示。

10. 红军第四军一、二、三纵队由大余失败退到赣南时人数由三千六百减至三千，计损失六百（内有百余名受伤与病，现在东固疗养，实际损失二百）。六日大柏地对刘旅一战幸已补充（但因没有兵提，将所有之枪给江西红军第二团去）。三个月来，人数增加一千六百，枪数增加五百（汀州、宁都、龙岩、坎市四役共得枪八百支，三百多等坏些的发给地方赤卫队去了），连原有共计二千。子弹三个月前，平均每枪不到四十发，现亦增加一倍，这是我军的实力。外间所宣传均超过此数甚多，如各地党部甚至有朱、毛，有人两万，有枪一万，这样实情不明，势必在估量上发生错误。现在计在前委管辖下与前委有发生关系的共有三个部队，一是四军一、二、三纵队，枪二千，这是主力，二是湘赣边界部队有枪一千四百，三是江西第二、四团枪一千，共计四千四百枪。这三部分大体都可说是有相当的战斗力的正式军队，都是从最困难的反革命高潮下创造出来的。

11. 红军党的详细概况，已详四月一日在瑞金补抄去年十一月的报告，由福建省委转上谅已达览。去年十月以前全军有军党部，十一月的中央指示后，组织比前妥。前委设军委管辖前委的各级党部兼及地方赤卫队，前委于指导红军之外还有对地方党部指导。今年一月四军从湘赣边界出发向闽赣边境，每日行程或作战，在一种特殊环境之下，应付这种环境，感觉军委之重迭，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前委直接指导之下组织委员会。现在因时间开长而发达红军数量比前大增，前委兼顾不来，遂决定组

织军的最高党部，刘安恭同志为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党内现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

兹将五月份红军第四军一、二、三纵队及军部直属部队党的各项重要统计于下：

（1）党员数量：1329。

（2）职务总计：长官330，战斗力兵734，非战斗力兵188，夫子68。

（3）发展同志统计：官长9，战斗力兵99，非战斗力兵9，夫子10。

（4）年龄统计：十八岁以下95，十九岁至二十三岁644，三十一岁至四十岁179，四十八岁以[1]

（5）成分统计：工人311，农民626，小商人106，学生192，其他95。

（6）处罚同志统计：劝告29，警告96，留察10，开除31，共计166。

（7）活动分子统计：支委委员65，组长123，组员200，共计500余。

（8）伤亡同志统计：官长伤6亡3，战斗兵伤9亡5，

再附上一信后，四月一日在瑞金寄上一信并付上彭同志一信补抄去年十一月份的详细报告，不知均收到中央否？到于都探闻中央告全体同志书、中央通告十五号二十号，当在兴国石印数千份，散发红军及各地党部。刘安恭同志还未办公，听到详细的口头报告。五月二十日在瑞金收到中央军委致前委一信，到龙岩又接到中央通告三十四

[1] 原文如此，疑缺内容。

号，国际职工运动小册子、中央为蒋桂战争告民众书等均收到。

此外尚接到福建省委闽西政治经济状况与党今后方针小册子《烈火》等刊物，我们久处深山穷谷之中，与外界隔绝，最近得到中央及福建省委各种指示，真是意外的欣喜，唯江西省委三年来不曾有一个字给我们。最近二次到赣南，罗受男同志从中央来带往我们的文件，又只见罗空手来，文件被江西省委留住了，这种情形太不好了，请中央通知江西省委千万改正这种状态。

（13）报纸所载我们怎样杀人放火的消息，全与事实不符，如前在汀州十七天，仅向大商人筹款二万，豪绅地主筹款三万，彼就宣传几十万；仅杀五人，都是最反动的（郭凤鸣营的）；长汀革命委员会烧四个，红军烧一个，彼则宣传为五百多间房子；仅杀郭凤鸣死党三四人，彼则宣称为杀千多人，总之全是胡说，不足为信。杀人烧屋，要有群众的基础，已经成了信条之一，军队单纯的烧杀，现在可以说没有了。

（14）现在红军中第一急需的是工作人员，因长期的斗争，损失太多，各级军官、各级政治人员都十分缺乏，唯一的希望是中央派人来。现请中央在最近期内派遣中、下级军官，中、下级政治工作人各一百人，医生及造炸弹师各数名，高级军官、高级政治工作人员各五人，在□个月内赶来。朱、毛同志可以随时离开队伍，只要请中央派人来代替。来人从福建省委转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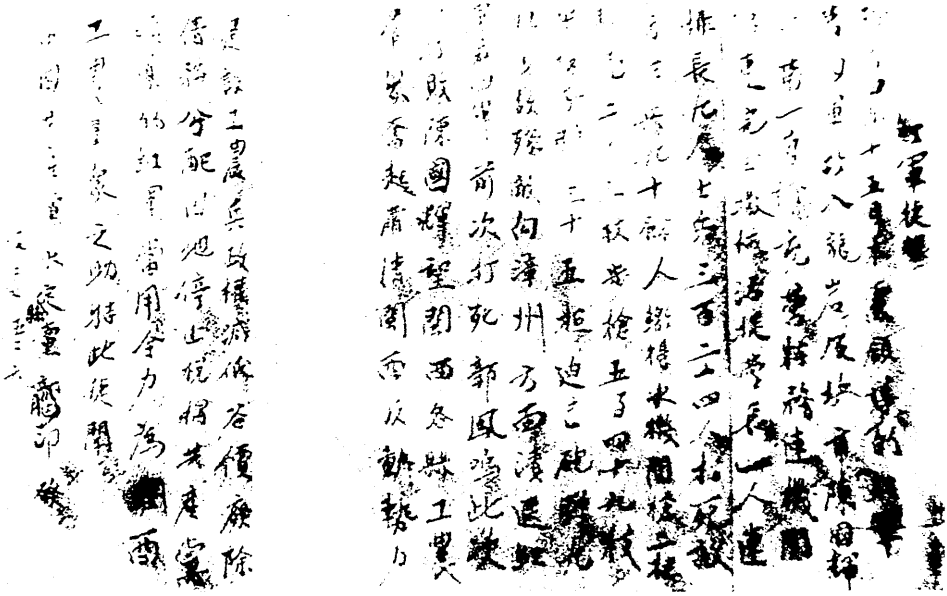
（15）请福建省委负责在厦门设交通机关，专任前委与中央的传达。设立机关经费付上价值一万元的烟土，托龙岩县委转交，如何运送，祈指示龙委。

（16）红军因长期斗争，现有军官及政治工作人不唯知识感特异的饥荒，精神亦表现疲倦，为救济红军的疲计，为造就将来工作人

计，红军第四军派遣留俄学生二十二人候中央派来代替人员到时即动身。二十二人业经前委选定，另用专函连同履历付上盼速复！

宣传情况容后报告！

前委书记　毛泽东



1929年5月至6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攻占永安、龙岩县城，建立了县级革命政权。图为龙岩战斗胜利的捷报。

给林彪[1]的信

（1929年6月14日）

林彪同志：

一、你的信[2]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因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日来才暴露出来。其实从前的隐蔽是错误了，现在的暴露才是对的，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只有赶快调和敷衍了事，抹去了两方的界线，以归到庸俗的所谓大事化为小事才是退步，我想这回是不会发生可怕的恶结果的。白砂会议[3]后不到几天，问题已经在党内群众中热烈地讨论起来了，我想同志们一定要求这问题的彻底弄清楚，一定不肯调和敷衍，模棱两可，是非不分，而且一定能选择并拥护一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前进的意见。四军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四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一极大的进步，这是绝对无

---

[1] 林彪（1907—1971），当时任第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

[2] 指林彪1929年6月8日给毛泽东的信。

[3] 白砂会议，指1929年6月8日在福建上杭白砂召开的中共红军第四军前委扩大会议。

疑的。

二、不明四军斗争的历史，便不明白现在争论问题的来源，不明白它的来源，便不明白自有四军到现在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的全部问题的性质。问题的主要点有以下各端：（一）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二）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三）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四）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五）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六）地方武装问题，（七）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八）对时局的估量，（九）湘南之失败，（十）科学化、规律化问题，（十一）四军军事技术问题，（十二）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十三）分权主义与集权，（十四）其他腐败思想。让我在下面预说出来。

三、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记得的就是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我们记起了这两点，就可以知道一切思想、习惯、制度何以这样的难改，而党的领导与个人的领导何以总是抗分[1]，长在一种斗争状况之中。红军既是从旧式军队变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和一些反对这种思想、习惯、制度的人作斗争，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至今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原因。不但如此，四军的大部分是从失败环境之下拖出来的（这是一九二七年），结集又是失败之前的党的组织，既是非常薄弱，在失败中就是完全失了领导。那时候的得救，可以说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二个原因。明白了这两个原因，我们再来看一看四军党组

[1] 原件在“抗分”后脱漏八九个字。

织以后的历史，更明白个人与党斗争的盈虚消长[1]之机。自四军成立以后，党从连上建设了普遍的基础，现在上级指导机关对于斗争策略的正确（湘赣边界特委，四军军委前委），边界各县地方党部之建立，群众斗争之发展，使得个人作用渐渐减少，党的领导渐渐加强。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四军成立到去年九月重回边界为第一个时期，这时期包括边界迭次战争的胜利和湘南的失败[2]。党在这时期中不能有绝对的指挥权，小团体主义充分存在而发展，党不敢作调动枪枝上的尝试，红军后方兼顾主义与少数同志的红军本位主义是冲突的，军需制度和编制法规未能建立，个人支配政治和武器的事常常有的，这时候的党从连到军从它的实质说是处在一种从属的地位，在某些问题上是绝对听命于个人。

从去年九月重回边界到三月十四日占领汀州是第二时期。这时期内，党能开始在理论上建设[3]小团体主义了（虽然在实际上还不能），军需制度建立，成立了七十五枝长枪一连的制度[4]，然还没有能触及短枪[5]，拨枪交与地方没有第一时期那样困难了。这时期内

---

[1]　原件如此。

[2]　1928年7月上旬，湘赣两省的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会剿”。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不察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期，不顾湘赣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县委联席会议关于红四军继续在湘赣边界巩固根据地的决定，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关于红四军向湘南发展的指示，附和红四军第二十九团欲回家乡（湘南）的思想，于是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九团向湘南冒进，结果造成红四军在湘南和湘赣边界同受严重损失，称八月失败。

[3]　“建设”二字，从上下文分析，疑为“批评”二字之误。

[4]　原件在“制度”后脱漏七八个字。

[5]　原件在“短枪”后脱漏约30个字。

少数同志极力把头低下来，党确处在指挥的地位了，从支部以至前委大体上说来都是如此的。在这时期内有几个显著的特征：第一，是在湘南失败及大余一路逃难形势之下，个人没有显出什么大领导，同时非依赖党的领导就会有塌台的可能，不比第一时期有迭次的军事胜利，这是党的领导抬头的第一原因。第二，这时期内党的组织与同志们的政治程度和斗争经验比起第一时期来确实进步些，少数同志不正确的言论行动比较不容易得到一般人的拥护，因此自己要收敛一些，这是党的领导抬头的第二个原因。第三，这时期内遇到两支新鲜的友军，即五军[1]与二、四团[2]。五军不能给四军以多大的影响，但在打破小团体主义一点上确还给予四军相当的刺激，特别是柏路会议[3]讨论四、五军合编问题时，彭德怀[4]同志的愤激的表示，给了少数同志以颇大的打击。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直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前五册[5]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

---

[1] 指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军第五军，该军1928年12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红四军会合。

[2] 指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1929年2月，红军第四军与第二、第四团在吉安东固会合。

[3] 柏路会议，指1929年1月4日在江西宁冈柏路村召开的中共红军第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军第四军军委、第五军军委等的联席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讨论了如何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和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决定彭德怀率红军第五军和第四军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红军第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实施外线机动作战。

[4] 彭德怀（1898—1974），当时任红军第五军军长。

[5] 原件如此，可能是就花名册说的。

对的党领导。这也可以说是帮助四军党的领导加强的原因。

从汀州到现在是第三时期。这一时期内党及红军的各方面实在都比以前进步了。因一、二、三纵队的编制，小团体主义从事实上开始减弱，[1]纵队委员会比前委要起作用些。各级党部更能无顾忌地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短枪的数目也能规定。政治部成立，司令部的职权也有限制了。这都是关于组织方面的。关于政治路线方面的，六次大会[2]指示的政治任务能在工作上去求实现了，城市政策的执行更好了些，宣传进步了。大规模的游击战术学会了，因时局的开展红军的组织也扩大了。但因为党的意志极大的限度的伸张、个人意志感到从来未有的痛苦，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和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这三样汇合所以爆发了近日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时代军党部要不要的问题，因为少数同志坚决地要军委，遂不得不攻击前委，于是涉及党的机关的本身问题，“党太管多了”“权太集中前委了”就是他们攻击的口号。在辩论中论到支部工作，便有人说出支部只管教育同志的话，这亦是由于党的管辖范围一问题生出来的，因为他们主张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便不得不主张支部工作也是要有限制的了。因为党的意志伸张，个人意志减缩，一切问题都要在各级党的会议席上议决之后，才许党员个人依照决议去执行工作，使得个人没有英雄式的自由，于是从要有相当自由要求出来的“一枝枪也要问过党吗?”“马夫没有饭吃也要党去管吗?”这就成他们嘲笑党部精密细小工作的口号了。以上是他

---

[1]　原件在“纵队委员会”前，有3个字不清。

[2]　指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们在湖雷前委会议[1]时发表的意见，议论问题虽则分成了三个（党的势力所及的范围，支部的工作，个人无自由），但精神是一贯的，就是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争雄的具体的表现。自近日争论问题发生之后，有的同志觉得四军的党到来了一个危机，如果少数同志作的个人主义领导胜利了，那末必至如你的来信所说有一种破坏党的团结一致和不利于革命的前途会要到来。但我相信不致如此的，因为现在的四军的党是比第一、二时期都有显然的进步，各纵队的基础已是不能动摇，个人自私的欲望决定会被群众所拒绝，我们只要看四十一个人会议中三十六票对五票取消那少数同志们硬要成立军委的一件事，就可知道大多数人一定不会拥护他们的“不利于团结，不利于革命”的主张了。个人主义与反个人主义的，亦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下面各项大体说来（均其分支）没有一项不是有正相反对的两种意见，我们试简单举出。

四、四军中向来就有一些同志是偏于军事观点的，与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因长期斗争经验和工农群众的影响，这种单纯观点的头脑，渐渐洗刷了一些，单纯的“打大仗”和“拿几十个州县”的观念比较地减少了，但没有完全消灭，遇有机缘就会发作，特别是在军事失败时候，差不多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枪杆子保存就够了。这些同志在会议时候最厌烦的是讨论宣传和组织问题，在游击工作中发展单纯的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军阀军队残余的小团体主义是造害红军最大问题之一。少数同志们不但不肯努力去消灭小团体

[1] 湖雷前委会议，指1929年5月底或6月初在福建永定湖雷召开的红四军前委会议。

主义，反而有助长小团体主义的倾向。小团体主义不消灭，不能如二、四团一样的完全由集体的党领导，则红军只是一个好听的名称罢了！

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利害的，它的产生是由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作过许多的奋斗，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从前代表这种思想的人，至今还不能说是已抛弃这种思想。流寇思想影响到政治方面的最显明的表现，就是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的不同的见解。我们不要忘记，湘赣边界割据问题在四军党内的一致仅仅是表面的罢了，骨子里面是有一部分同志时时刻刻要脱离边界的斗争，一到危急时候，这些同志马上[1]，参加过湘赣边界斗争的人大家明了的。对于建设湘赣边界武装问题，因为要从红军中拨枪，历来成为一个斗争，这是军事观点群众观点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发生出来不同见解的表现。红军的游民成分产生了流寇思想，同时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负责同志亦显然发出不同的意见，一种以为军纪破坏一些城市破坏一些也没有什么大要紧；另一种则与此相反。对于军纪破坏一事，有同志以为宁可没有这次胜利，不可有这次军纪破坏；还有同志则没有这种深刻的感觉，马马虎虎叹息一下就算了。这是最近的例子，以前的例子很多。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但因一种人主严，一种人主宽，效果便相消了。在群众的心理上，因为多数人做了、少数人做好，结果便发生不良的影响。

对时局的估量亦历来有不同的意见，因此对于红军行动的意见也就不同了，特别在边界时是很显著的。去年七月四军大部往湘南

---

[1] 原件在“马上”后脱漏三四个字。

的一致处，同志们大多数都承认是错了的，沙田的代表会议亦是这样承认，不料近日少数同志之中的奇异见解，却说往湘南是对的，留在边界的倒反是错了。这也是见解上极端相反的证例之一。

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和行动总要稍为科学一点才好，而一部分同志则恰恰与科学正相反对，一篇演说、一个行动已可以找出很多的矛盾出来。说话完全不顾及这话将要发生的影响，不管对不对，乱说一顿便了，“你乱说就是，横直他们只晓得那多”，这是何种非科学的态度！稍为进步一点的军队，就需要规律化，像红军本来这种“烂糟糟的”现象，我们只好认它是一种原始的游民的队伍的现象，要极力和这种现象斗争。然而同志中显然有一部分人是有意无意中在拥护这种现象，至少对此现象没有和它奋斗的决心，遂使红军至今不能建设一规模，比起资产阶级军队还相差得很远，这实是一种可叹的现象。

“烂牛皮不是烂牛皮，烂豆腐不是烂豆腐”，这是朱云卿[1]同志形容四军军事技术太差的愤激话。凡在四军生活过的人，大概没有不承认四军军事技术到了很差的程度了，但是偏有一些同志对于训练军官的本职不愿去管，却天天作些政治上的鼓动，发生什么“土豪不能打还有什么事做”的怪话。这种现象不改变，四军的军事技术问题是没有法子解决的。

五、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显明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少数同志们硬是要一个军委，骨子里是要一个党的指导机关拿在他们的手里，以求伸张那久抑求伸的素志（即与历来指导路线不同的另一指导路线），然而表现出的理由仍然是冠冕堂皇的，可惜完

[1] 朱云卿（1903—1931），当时任红军第四军参谋长。

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罢了。他们说："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这不是完全形式主义的说法吗？现在只有四千多人一个小部队，并没有多数的"军"如中央之下有多数的省一样。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绝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少数同志们对这些实际的理由一点不顾及，只是形式地要于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是什么人都明白在实际上不需要的。然而少数同志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非要设立不可，究竟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呢？要找寻出理由，我只好说这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穴，两个指导路线的最后斗争，我们只要查明了四军的历史，就容易明白这回争论的实际意义了。

为要成立新的指导机关——军委，便不得不搜出旧的理由，攻击旧的指导机关——前委以至支部。他们提出攻击的理由最具体的是：（一）党代替了群众的组织，（二）四军党内有家长制。他们这种攻击又全陷于形式主义。党的组织代替群众组织，自有四军党以来就是严禁的，就前委指导下的工农组织说来，未曾有党的支部代替过工农协会的事，就兵士组织上说，未曾有任何一连的连支部代替过连士兵委员会的事，这是四军中有眼睛的人都见到的。至于党部机关代替了群众机关或政权机关，如纵委代替了纵队士委、纵队司令部、纵队政治部，前委代替了军士委、军司令部、军政治部，亦是从来没有过。但是少数同志的形式主义又要在这里发挥了，他们说党部机关虽没代替群众机关及政权机关，但实际上纵队司令部少向军司令部打报告了，军司令部淡了。少数同志们不知道这种现象是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之不同，纵委或前委的领导加强，一切问题（凡是他们所需要提出的）都能够提出在会议席上讨论决定，然

后通知政权机关负责同志去执行，否则谓之自由行动（如自由支配财政、自由支配枪弹等）。这种表现是党部领导力量加强的证例，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进步的现象。每次会议，政权机关的负责同志都是到会的，而意见也参加了，而且许多问题是要这些负责同志提议才能讨论的（如作战计划、官兵训练计划等），大家都参加了问题的讨论和表决了，会后拿去执行起来，因而觉得行政机关简单了一些，自由了一些，于实际上究竟有些什么要不得呢？军长闲起了，但是党代表（与党部书记是两个东西）的闲起更甚，因为没有下级党代表向他打报告。纵队司令部少有报告打到军司令部了，但是纵队政治部打到军政治部的报告更少。不问后来的状态比从前行政自由支配、比从前报告打得多的热闹的时代——湘赣边界的初期，于工作上是否有效果，于斗争上是否更形便利，不从需要上实际上去估量，单从形式上去估量，这是什么一种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呢?！请问实际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处呢?！至于指责到湘赣边界的行委[1]，不问行委制度在边界斗争中收了多少效果，只是形式上以为是党的机关代替了行政机关而认为要不得，这又是同样犯了形式论的错误。这种形式论发展下去，势必不问一切事的效果，而只是它的形式，危险将不可胜言。边界的行委制度在边界的斗争上有过很大的效果，这是有眼睛的人都明白的，而且行委一面是在内的党部，一面又是公开的行政机关，有什么妨碍行政机关的系统的呢？

至于攻击四军党内的家长制，这个同样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于此我们要先问什么叫做家长制，然后才可以知道四军内是否

[1] 行委，全称为行动委员会。

有家长制，不然随口乱说必定与事实不相符合。家长制的定义是：只有个人的命令，没有集体的讨论，只有上级委派，没有群众选举。如果大家承认是这个定义，那末，我们看一看，四军的党内有没有这定义所说的一样，就可以知道有没有家长制了。四军党的集体的讨论，从支部到前委历来是如此的，各级党部会议，特别是前委纵委两级会议，不论是常委会、全体会，应到委员之外，差不多每次到的有非委员的负责同志参加。假若少数同志们患了善忘病的话，现在各纵队的会议录（三纵委有从去年五月起的全部会议录，不差一次）、前委会的会议录（有从今年起的会议录，不差一次），可以去查。大的问题，如井冈山之出发问题讨论，东固之分兵讨论，此次之争论及分兵问题讨论等等，总是征求群众意见的。说四军党内只有个人命令没有集体讨论，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吧?！说到各指导机关的产生，从支委[1]到纵委、前委是中央委派的，但这不能作为四军党内家长制的证明，四军党内事实上寻不出家长制。为什么少数同志有这种借口呢？这种话有什么客观的来源呢？是的，就是四军中有一种党部书记兼充红军党代表制度，一些同志分不清楚党代表与书记在职务上是两样东西，因为党代表与军官的权限历来没有弄清楚，时常发生争权问题，由是引起了头脑不清楚的人把党代表在那里工作看做是党的书记在那里工作了。三纵队几个连上的同志叫那个连的支书做“老板”，就是这样牵挂来的。要除去此弊，只有使党代表与书记分开，这是应该一面从内部找人，一面从外面多找人来才可以解决的（从前的兼任是因人材太少的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之来源是由

[1]　支委，指红军中的中共支队委员会。支队，当时相当于营。

于游民、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成分中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这与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等是在一条路线基础上的，只是一个东西。这种思想发展的另一方面必定是分权主义——也是代表游民、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而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无论是阶级的组织——工会，与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共产党，或它的武装组织——红军）不相容的。军委、前委分权的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这个理由。

虚荣心、夸大、英雄思想等等腐败思想，都是以个人主义一个为头发出来的。

六、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我现举出了自有四军以来的历史问题的各方面，以证明近日的问题（军委问题，但原则问题）只是历史的结穴，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红军的来源和它的成分，五月份统计，全军一三二四名党员中，工人三百一十一，农民六百二十六，小商人一百，学生一百九十二，其他九十五，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三对百分之七十七。讨论到个人思想时，不要忘记他的出身、教育和工作历史，这是共产主义者的研究态度。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的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1]，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

---

[1] 原件在“奋斗”后脱漏七八个字。

至于我之请求离开前委，并不是消极，不参加这种斗争，乃有以下的理由：

（一）对于与党内错误思想奋斗，两年以来已经既竭吾力了，现在我又把问题的内容提出以后，使多数同志们作不断的奋斗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二）我在四军的日子太久了，一种历史的地位发生出来的影响是很不好的，这是我要指出的中心理由。

（三）我个人身体太弱，智识太贫，所以我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在没有得到中央允许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能因改环境而得到相当的进步。

（四）四军的党已经有了比较坚固的基础了，我去之后，决然没有不好的影响。党的思想上的分化和斗争既已经起来了，决不因我去而不达到胜利的目的，所以你的信上的后面一段是过虑的。自然我的工作我只能提出意见，决定要在党部，我没有离开一天仍旧可以随大家作思想奋斗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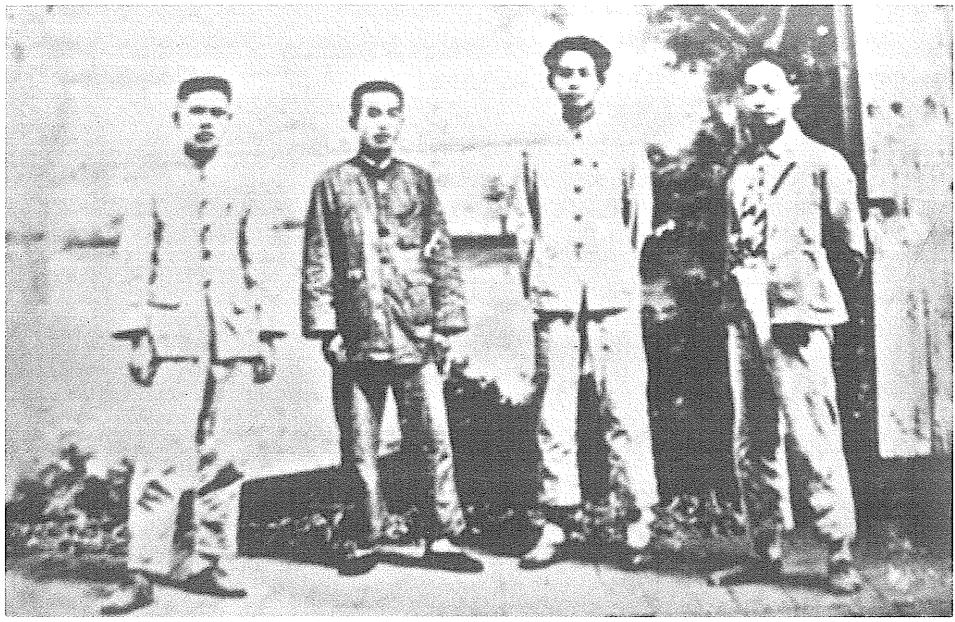
C的敬礼！[1]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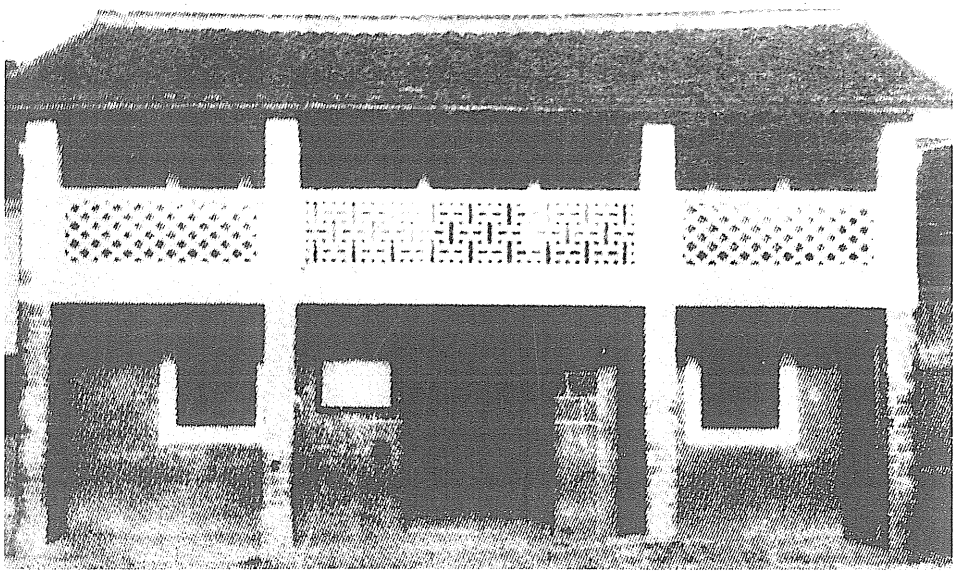
六月十四日于新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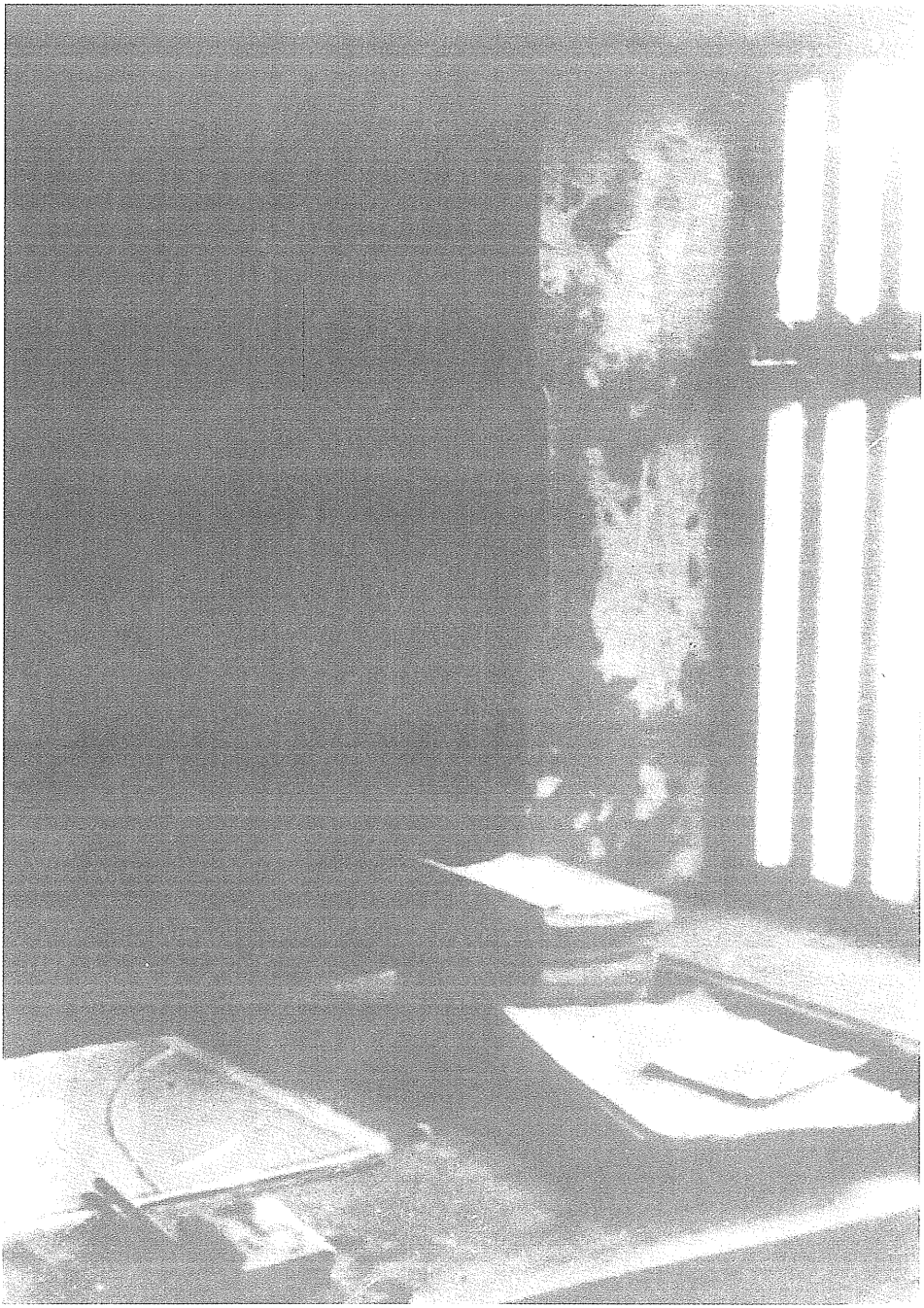
[1] 即共产主义的敬礼。C为英文Communism（共产主义）一词的第一个字母。



1929年6月19日，毛泽东等在福建龙岩。



1929年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大会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毛泽东在会后到上杭地区指导地方工作。图为毛泽东在上杭的住地——上杭古田协成店。



1929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蛟洋举行。图为毛泽东在蛟洋文昌阁的旧居内景。

红军第四军司令、政治部布告

（1929年6月）

为布告事。我们红军受共产党的指导，执行民权革命三大任务，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政府，以帮助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阶级得到解放为宗旨。现在国民党四分五裂，蒋桂冯阎全国混战。反动政府根本动摇。全国工人、农民、兵士及受压迫的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革命，人数越多，势力越大。兵士组织红军，工人组织工会，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各省各县各乡各镇都大大地干起来了。本军来到此地，知道民众痛苦甚深，谷价很贵，利息很高，租谷很重，苛捐很多。土豪劣绅操纵一切，借了祠堂公会，欺压各姓贫民。这种土豪劣绅，百人之中，不过几人。大多数人，应该联合起来，打倒这少数的豪绅，求得多数人的利益。现将急于要做的事开列于下：

（一）收租二百担以上的大地主，家里的谷子及大公会（义仓外）的谷子，一概没收分与贫民，不取价钱。收租二百担以下的小地主，家里的谷子须减价出粜。规定每担谷价照原价减半（但谷米商人从外境转运来的不在此例）。

（二）工人农民该欠田东债务，一律废止，不要归还（但商人及工人农民相互间的债务不在此例）。

（三）从今年起，田地归耕种的农民所有，不再交租与田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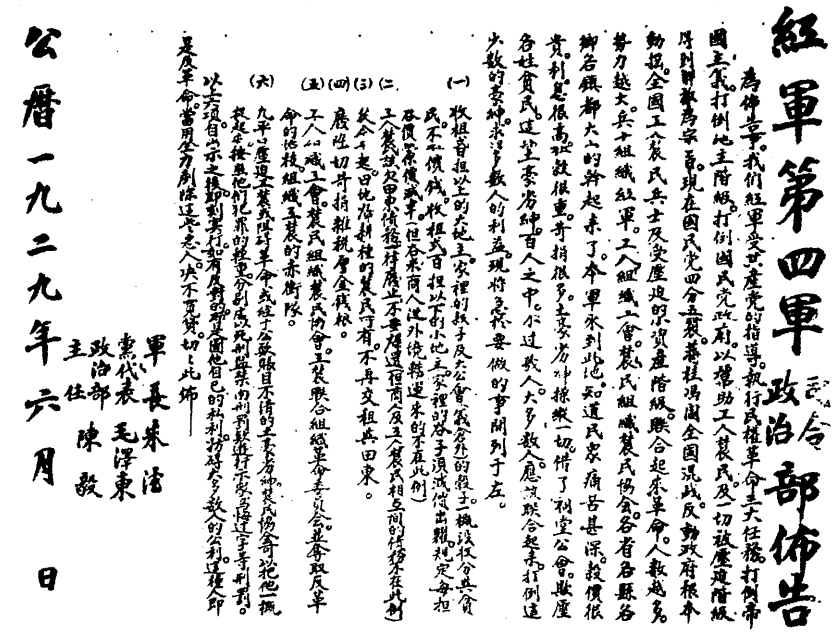
（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厘金钱粮。

（五）工人组织工会，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工农联合组织革命委员会，并夺取反革命的枪支，组织工农的赤卫队。

（六）凡平日压迫工农或阻碍革命或经手公款账目不清的土豪劣绅，农民协会可以把他一概捉起来，按照他们犯罪的轻重，分别处以死刑、监禁、肉刑、罚款、游行示众、写悔过字等刑罚。

以上六项，自出示之后，即刻实行。如果反对的，即是图他自己的私利，妨碍大多数人的公利，这种人即是反革命，当用全力铲除这些恶人，决不宽贷。切切此布。

军　　长　朱　德
党　代　表　毛泽东
政治部主任　陈　毅
公历一九二九年六月　日



紅軍第四軍 司令 政治部 佈告

為佈告事。我們紅軍受共產黨的指導。執行民權革命主大任務。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地主階級。打倒國民黃政府。以援助工人農民。及一切被壓迫階級。序到解放為宗旨。現在國民黨四分五裂。蔣桂馮閻全國混戰。反動政府根本動搖。全國工人農民兵士及受壓迫的貧產階級。聯合起來革命。人數越多。勢力越大。兵士組織紅軍。工人組織工會。農民組織農民協會。各者各縣各鄉各鎮都大小的幹起來了。本軍來到此地。知道民眾痛苦甚深。殺價很貴。利息很高。被債很重。苛捐很多。土豪劣紳操縱一切。借了祠堂公會。壟斷各姓貧民。這些豪劣紳百人之中。不過幾人。大多數人。應該聯合起來。打倒這少數的豪紳。來謀多數人的利益。現將急於要做的事開列于左。

(一) 收租吾祖以上的大地主家裡的族子及公會。義倉等的穀子。一概沒收分與貧民。不收價錢。收租式百担以下的小地主家裡的族子及佃戶。債務常優減半。但若來商人逃外逃。都逃來的不在此例。

(二) 土豪劣紳欠田債逃村廢土不要歸還。但商人及土豪劣紳是例外不在此例。

(三) 從今起田地荒耕租的貧民可有。不再交租與田東。

(四) 廢除切斤捐雜稅厘金釐稅。

(五) 工人組織工會。農民組織農民協會。工農聯合組織革命委員會。共奪取反革命的政權。組織工農的赤衛隊。

(六) 九月二座遇工農武裝暴動。革命或經于分散敗北不清的土豪劣紳。農民協會就地捕獲。各按其他犯罪的程度分別處以死刑與禁閉。用刑到緊迫行不能忍受這字等刑罰。

以上六項自示之後。即實行。如有反對的。是圖他自己的利益。違背大多數的公利。這種人即是反革命。當用全力剷除這些惡人。決不寬貸。切切此佈——

軍長 朱德
黨代表 毛澤東
政治部主任 陳毅

公曆一九二九年六月 日

毛泽东、朱德、陈毅署名的红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

清平乐·蒋桂战争[1]

（1929年秋）

风云突变，
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枕黄粱[2]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3]，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4]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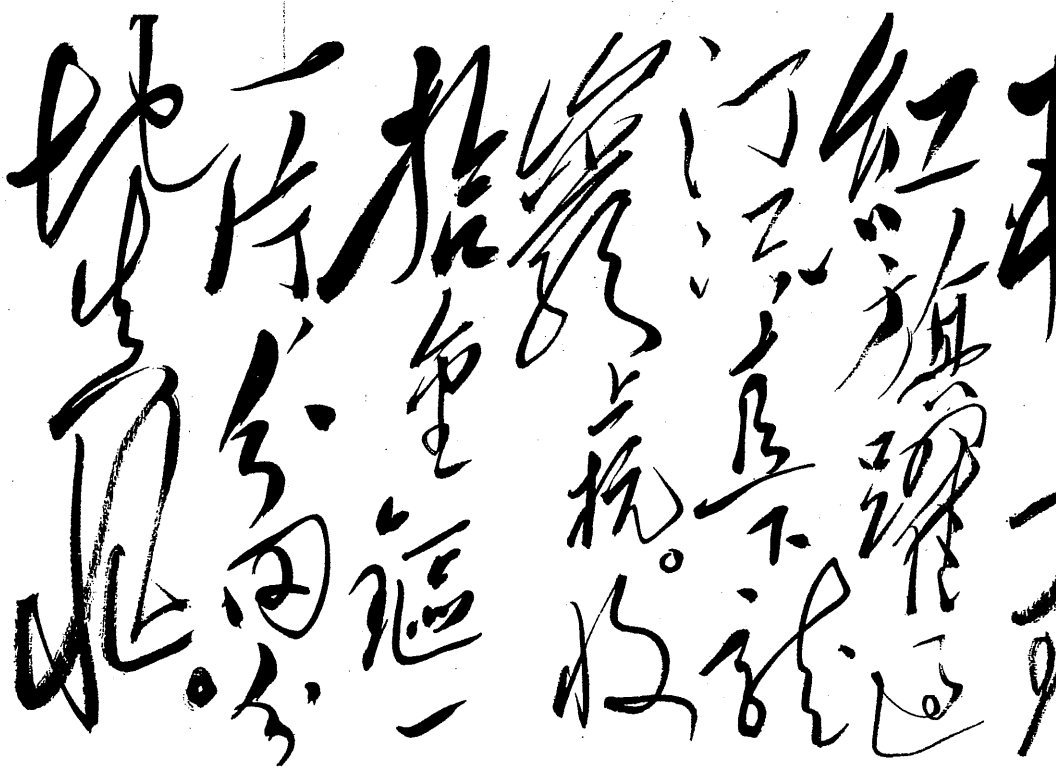
---

[1] 蒋桂战争，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在1929年春为控制两湖而进行的战争。

[2] 一枕黄粱，典出唐沈既济的《枕中记》，讲一个叫卢生的，在旅店向一个道士叹述穷困不得志。道士就拿出一个枕头，说枕在上面就能使他“荣适如志”。卢生在梦中从婚到死，享尽荣华富贵，转了一圈人生，醒来一看，困顿依旧，旅店主人也仍然在蒸黄粱（小米饭）。

[3] 汀江，韩江上游，源出福建省西部长汀，向南流入广东省。

[4] 金瓯，指国土。语出《南史·朱异传》，梁武帝曰：“我国家犹若金瓯，无一伤缺。”



毛泽东手书《清平乐·蒋桂战争》。

風雲突
變黃河
重閘戰
洪流人間都
是英雄挽柔
情難自抑。

《红旗跃过汀江》（诗意画）

采桑子[1]·重阳[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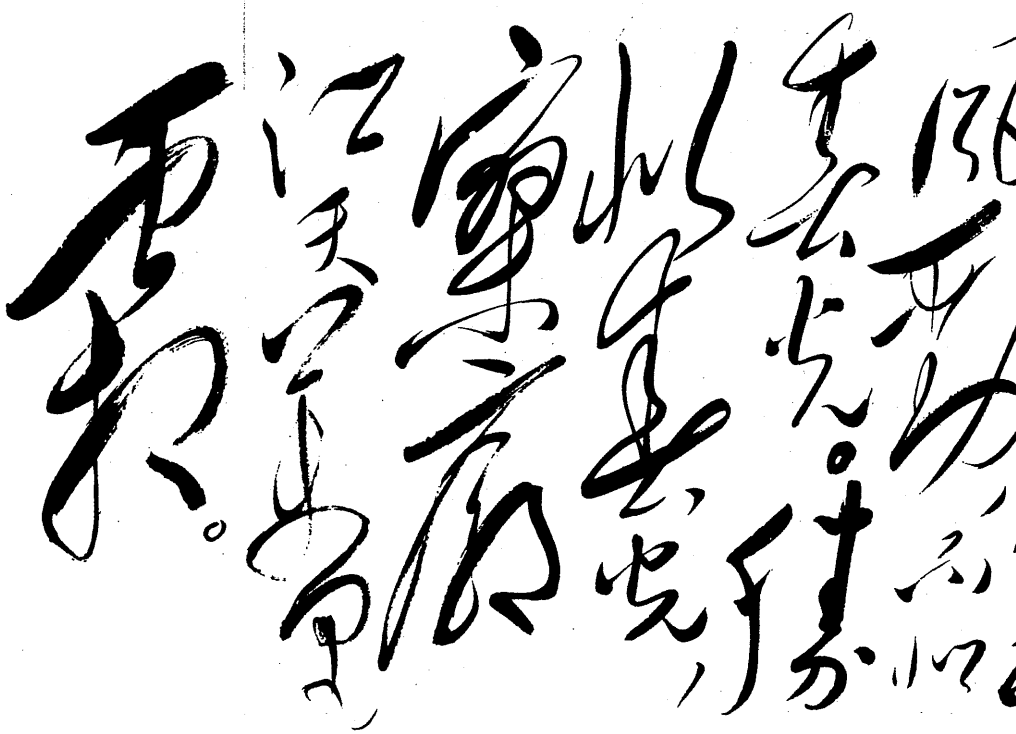
（1929年10月）

人生易老天难老，
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
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
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
寥廓江天万里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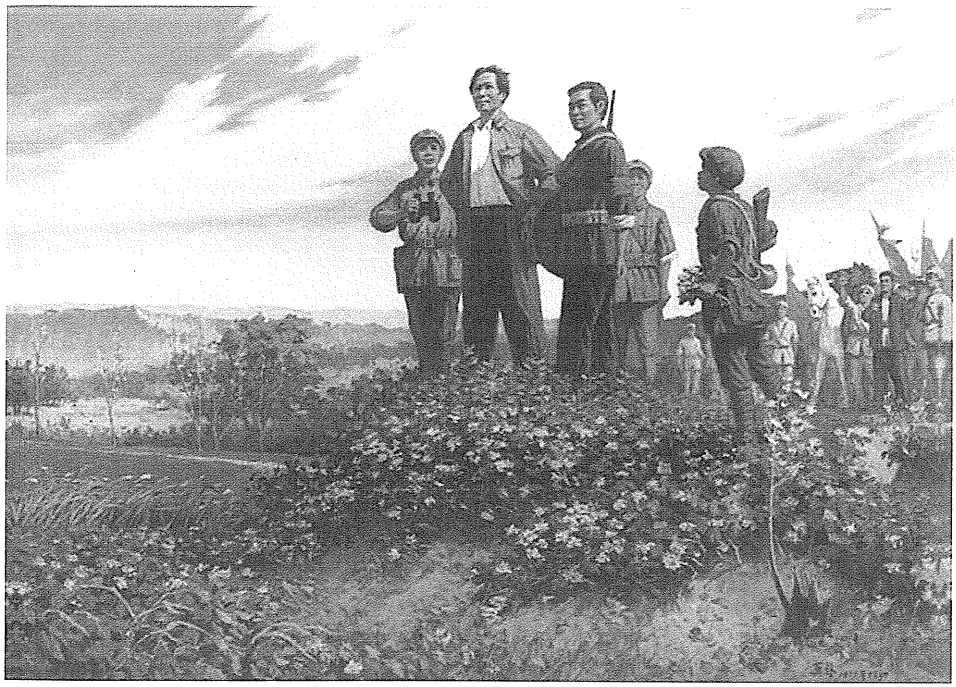
[1] 采桑子，词牌名，本为古乐采桑曲。

[2] 重阳，农历九月初九，传统上文人登高赋诗之日。



毛泽东手书《采桑子·重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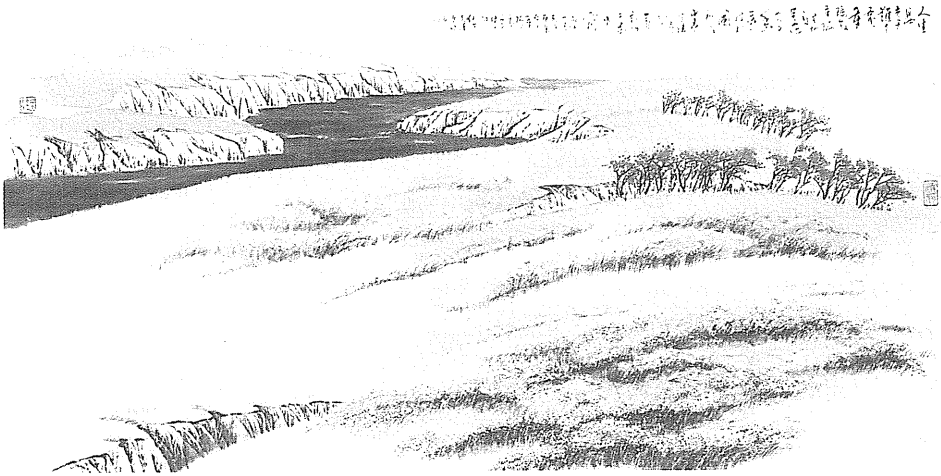
金秋忠
天地光辉，
收获时节。
我们欢度
丰收节。



《战地黄花》（油画）

《战地黄花》（油画）

《历尽艰辛为人民》（中国画）



《重阳》（诗意画）

《战地黄花》（诗意画）

《战地黄花》（诗意画）

《战地黄花分外香》（诗意画）

《战地黄花分外香》（诗意画）

《战地黄花分外香》（诗意画）

《寥廓江天万里霜》（诗意画）

从蛟洋到达汀州后给中央的信[1]

（1929年11月28日）

中央：

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2]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3]，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攻梅县失利，损失虽不小，但士气仍振奋，目前一时期当在福建境内工作。闽西已有八十万赤色群众足以掩护红军，刘（和鼎）金（汉鼎）张（贞）[4]等“会剿”，形势并不严重。现决整理一时期，即向刘、张进击。打破“会剿”局面，才是出路。正在准备一个月给养。

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5]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

---

[1] 1929年6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离开了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福建省上杭县蛟洋等处指导闽西工作并养病。1929年11月26日，毛泽东回到前委。这是毛泽东回前委工作后写给中共中央的信。

[2] 谢，指谢汉秋，1929年10月他被中共福建省委派往闽西巡视工作。

[3] 汀州，旧府名，即福建长汀。

[4] 刘和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六师师长。金汉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师师长。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5] 陈毅，当时任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1929年8月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会后，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带回部队。

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1]，《红旗》[2]，《列宁主义概论》[3]，《俄国革命运动史》[4]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请垫付，寄付地点“　　”[5]。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余详前委报告。

毛泽东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汀州

[1]　布报，即中共中央当时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杂志，1927年10月24日创刊。

[2]　《红旗》，是中共中央当时的机关报，1928年11月20日创刊。

[3]　《列宁主义概论》，是斯大林所著《论列宁主义基础》最早汉译本的书名。

[4]　《俄国革命运动史》，瞿秋白著，1927年7月由新青年社出版。

[5]　现在保存的此信的抄件中，引号内空缺。

1929年9月，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红军行动的策略与建设的正确主张。图为1929年11月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复信。

给李立三[1]的信

（1929年11月28日）

立三兄：

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2]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3]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

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

独秀近来行动[4]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

共产主义的敬礼

毛泽东

邮政通信处“　　”[5]。

---

[1] 李立三（1899—1967），湖南醴陵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

[2] 开慧，即杨开慧（1901—1930），湖南长沙人，毛泽东的夫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岸英，即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

[3] 泽民，即毛泽民（1896—1943），湖南湘潭人，毛泽东之弟，当时负责中共中央出版部的工作。

[4] 指陈独秀当时在党内散布托派观点，成立小组织等反党活动。

[5] 现在保存的此信的抄件中，引号内空缺。

古田会议前夕，毛泽东亲自领导红军在福建连城县新泉村进行整顿。毛泽东亲自深入部队调查研究，为召开古田会议作好准备。

毛泽东在新泉村的住地“望云草室”。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

（1929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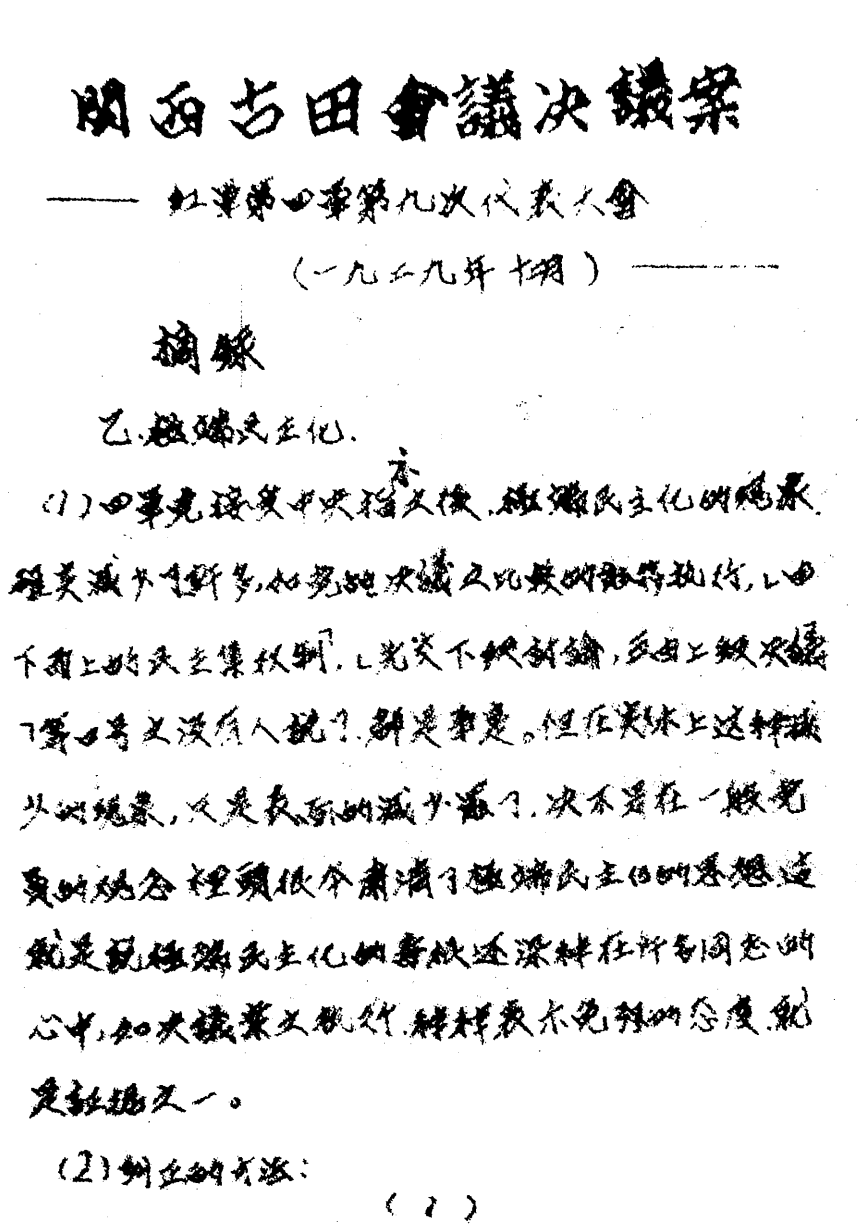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2]的精神，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所写的决议。这次代表大会是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的，所以这个决议又称“古田会议决议”。决议共分8个部分，第一部分经毛泽东校阅，编入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题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2] 九月来信，指陈毅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周恩来多次谈话的精神，为中共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



闽西古田会議决議案

——红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九年十月）——

摘錄

乙、極端民主化。

（1）四軍党接受中央指示文件，極端民主化的現象，程度減少了許多，如党的决議及比較的能執行，「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党内不許批評」，「由上級决議了要四号文没有人說了」，都是事实。但在实际上这种減少的現象，只是表面的減少罷了，决不是在一般党員的观念裡頭根本肃清了極端民主的思想，这就是說極端民主化的毒根还深种在所有同志的心中，如决議案文執行，种种表示免刑的态度，就是証据之一。

（2）制止的方法：

（ 2 ）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福建上杭古田村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并作报告。会上，毛泽东被选为新的红四军前委书记。图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部分）。它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一　关于单纯军事观点

单纯军事观点在红军一部分同志中非常发展。其表现如：

（一）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还有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则更进一步认为军事领导政治了。

（二）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只是单纯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三）因此，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

（四）同时，在宣传工作上，忽视宣传队的重要性。在群众组织上，忽视军队士兵会[1]的组织和对地方工农群众的组织。结果，宣

[1]　红军中的士兵代表会议和士兵委员会是为了发扬军队内部民主而建立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后来被废除了。

传和组织工作，都成了被取消的状态。

（五）打胜仗就骄傲，打败仗就消极。

（六）本位主义，一切只知道为四军打算，不知道武装地方群众是红军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一种放大了的小团体主义。

（七）有少数同志囿于四军的局部环境，以为除此就没有别的革命势力了。因此，保存实力、避免斗争的思想非常浓厚。这是机会主义的残余。

（八）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着幻想。这是盲动主义的残余[1]。

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

（一）政治水平低。因此不认识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不认识红军和白军是根本不同的。

（二）雇佣军队的思想。因为历次作战俘虏兵甚多，此种分子加入红军，带来了浓厚的雇佣军队的思想，使单纯军事观点有了下层基础。

（三）因有以上两个原因，便发生第三个原因，就是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而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

（四）党对于军事工作没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也是形成一部分

---

[1] 1927年革命失败后的短期间，在共产党内曾经出现一种“左”倾盲动主义倾向，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因而不肯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错误地使用命令主义的方法，企图依靠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许多的地方起义。这种盲动主义的行动曾经在1927年年底流行过，到了1928年年初渐渐地停止了下来。但有些党员也还存在着这种情绪。盲动主义就是冒险主义。

同志的单纯军事观点的原因。

纠正的方法：

（一）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的理论根源，认清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同时，还要肃清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残余，打破四军本位主义。

（二）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特别是对俘虏成分的教育要加紧。同时，尽可能由地方政权机关选派有斗争经验的工农分子，加入红军，从组织上削弱以至去掉单纯军事观点的根源。

（三）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

（四）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

（五）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

二　关于极端民主化

红军第四军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后，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减少了许多。例如党的决议比较地能够执行了；要求在红军中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项错误主张，也没有人再提了。但是在实际上，这种减少，只是一时的和表面的现象，还不是极端民主化的思想的肃清。这就是说，极端民主化的根苗还深种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例如对于决议案的执

行，表示种种勉强的态度，就是证据。

纠正的方法：

（一）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其次，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

（二）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线是：

1. 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

2. 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

3. 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

4. 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其办法是开活动分子会，或开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须看环境的可能），派人出席作报告。

5. 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

三　关于非组织观点

四军党内存在着的非组织的观点，其表现如下：

甲　少数不服从多数。例如少数人的提议被否决，他们就不诚

意地执行党的决议。

纠正的方法：

（一）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

（二）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乙　非组织的批评：

（一）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但是红军党内的批评有些不是这样，变成了攻击个人。其结果，不但毁坏了个人，也毁坏了党的组织。这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纠正的方法，在于使党员明白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

（二）许多党员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去批评。这是因为一般党员还不懂得党的组织（会议等）的重要，以为批评在组织内或在组织外没有什么分别。纠正的方法，就是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

四　关于绝对平均主义

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一个时期发展得很厉害。例如：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极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别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点。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要平

均背。住房子要分得一样平，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派勤务要派得一样平，稍微多做一点就不肯。甚至在一副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不愿把一个人抬了去。这些都证明红军官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还很严重。

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

纠正的方法：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

五　关于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至于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

关于党内批评问题，还有一点要说及的，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们不明白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

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

纠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六　关于个人主义

红军党内的个人主义的倾向有如下各种表现：

（一）报复主义。在党内受了士兵同志的批评，到党外找机会报复他，打骂就是报复的一种手段。在党内也寻报复，你在这次会议上说了我，我就在下次会议上找岔子报复你。这种报复主义，完全从个人观点出发，不知有阶级的利益和整个党的利益。它的目标不在敌对阶级，而在自己队伍里的别的个人。这是一种削弱组织、削弱战斗力的销蚀剂。

（二）小团体主义。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红军中历来小团体风气很盛，经过批评现在是好些了，但其残余依然存在，还须努力克服。

（三）雇佣思想。不认识党和红军都是执行革命任务的工具，而自己是其中的一员。不认识自己是革命的主体，以为自己仅仅对长官个人负责任，不是对革命负责任。这种消极的雇佣革命的思想，也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表现。这种雇佣革命的思想，是无条件努力的积极活动分子所以不很多的原因。雇佣思想不肃清，积极活动分子便无由增加，革命的重担便始终放在少数人的肩上，于斗争极为不利。

（四）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见于享乐方面的，在红军中也有不少的人。他们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他们要到大城市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享乐。他们最不乐意的是在生活艰难的红色区域里工作。

（五）消极怠工。稍不遂意，就消极起来，不做工作。其原因主要是缺乏教育，但也有是领导者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

（六）离队思想。在红军工作的人要求脱离队伍调地方工作的与日俱增。其原因，也不完全是个人的，尚有：一、红军物质生活过差；二、长期斗争，感觉疲劳；三、领导者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等项原因。

纠正的方法：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再则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执行纪律要得当。并要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以改善物质条件。个人主义的社会来源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当进行教育的时候必须说明这一点。

七　关于流寇思想

由于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就在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一、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二、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1]、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三、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2]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

纠正的方法：

---

[1]　赤卫队是革命根据地中群众的武装组织，不脱离生产。

[2]　李闯，即李自成（1606—1645），陕西米脂人，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1628年，即明思宗崇祯元年，陕西北部形成农民起义的潮流。李自成参加高迎祥的起义队伍，曾经由陕西入河南，到安徽，折回陕西。1636年高迎祥死，李自成被推为闯王。李自成在群众中的主要口号是“迎闯王，不纳粮”；同时他不准部下扰害群众，曾经提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妇如淫我母”的口号，来约束自己的部队。因此，拥护他的人很多，成为当时农民起义的主流之一。但他也没有建立过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总是流动作战。他在被推为闯王后，率部入川，折回陕南，经湖北又入川，又经湖北入河南，旋占湖北襄阳、安陆等地，再经河南攻陕占西安，于1644年经山西攻入北京。不久，在明将吴三桂勾结清兵联合进攻下失败。

（一）加紧教育，批评不正确思想，肃清流寇主义。

（二）对现有红军基本队伍和新来的俘虏兵，加紧反流氓意识的教育。

（三）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红军队伍，改变红军的成分。

（四）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新的红军部队。

八　关于盲动主义残余

红军党内对盲动主义已经作了斗争，但尚不充分。因此，红军中还有盲动主义思想的残余存在着。其表现如：一、不顾主观和客观条件地盲干。二、城市政策执行得不充分，不坚决。三、军纪松懈，特别是打败仗时。四、还有某些部队有烧屋行为。五、枪毙逃兵的制度和肉刑制度，也是带着盲动主义性质的。盲动主义的社会来源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综合。

纠正的方法：

（一）从思想上肃清盲动主义。

（二）从制度上和政策上纠正盲动的行为。

党的组织问题

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之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之大。大会对于这个问题特作详细的分析与决定。同志们应站在大会的精神之上努力去改造党的组织，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

治任务，才算得到成功。

一　党的组织路线

（一）党员发展的路线，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同时对非战斗兵如夫子、勤务兵等亦不应忽视。

（二）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在党员数量过少的部队，事实上不能每班建立一个小组时，则暂以排为单位建设小组，而把组员有计划地分配到各班，但须明白这是过渡的方法。

（三）红军原有的小组编制法，即干部分子与一般分子，知识分子与劳动分子的混合编制法，是很对的。但还缺乏有计划地将各种出身不同能力不同分子很好地混合编起来，以后此点要多加注意。至于单纯地把干部分子编成小组，那是要不得的。

二　党的组织松懈问题

（一）四军党的组织现状：

1. 党员加入太随便，许多不够党员资格的也拉了进来，特别是官长不要任何条件，一概拉进。因此党的质量就弄得很差了。

2. 各级党部的工作做到了解决问题，但完全忘却了教育同志一个任务。关于训练性质的会议，如活动分子大会，书、宣、组联席会，委、组联席会，支部大会，纵队或支队[1]党员大会等，开得非

[1] 纵队，当时相当于团；支队，当时相当于营。

常少。

3. 一般的纪律松懈。特别在负担重要工作，没有人代替他的情况下，对他所犯错误，往往敷衍下去，不执行纪律。对一人如此，对他人亦不得不如此，因此把纪律一般地放松了。

4. 所有官长既都成了党员，结果所有军事政治机关的工作人员，便很少注意他的社会职业的工作了，都以为社会职业的工作就是党的工作，两者分不开来。如各级军事工作会议、各级政治工作会议几乎完全没有，一切都以为党决定了就完事了，党员在社会职业中起核心作用一件事，简直不谈起了。

5. 上下级的关系不密切。下级的报告，上级少有批答或指示。下级会议上级少有派人出席。这固然是因为上级机关组织不健全，但上级机关工作态度不积极，也是对下级机关指导缺乏或指导不详尽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对于指导实际工作，如一个部队出发游击的工作指导等，一般地缺乏详尽；还有某几个部队，几乎连粗略的指导都没有。

6. 支部大会及小组会，有许多没有按时开。

（二）纠正的路线：

1. 旧的基础厉行洗除。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

2. 以后新分子入党条件：

（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

（2）忠实；

（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

（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

（5）不吃鸦片、不赌博。

以上五个条件完备的人，才能够介绍他进党。介绍人首先要审查被介绍人是否确实具备上列条件，经过必需的介绍手续。介绍入党后，要详细告诉新党员以支部生活（包括秘密工作）及党员应遵守的要点。介绍人对所介绍人应负相当责任。支委要派人对将入党的人谈话，考查是否具备入党条件。

（三）各级党部不单是解决问题和指导实际工作的，它还有教育同志的重大任务。各种训练同志的会议，及其他训练办法如训练班、讨论会等，都要有计划地举行起来。

（四）严格地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

（五）分清党员社会职业与党的工作的性质。每个党员（除开党内负了重要或专门任务的人是为革命职业家外）必须担负一件社会职业，同时即在他的社会职业中担负党给他的工作。

（六）各级党部的工作态度，应该比较从前更积极起来。下级对上级要有详尽的报告，上级对于这些报告要有详尽的讨论和答复，并尽可能派人出席下级会议，不能借口工作人少、工作能力薄弱和工作时间不够，来掩护自己的不积极，而把这些工作疏忽起来。

（七）支委会及支委以上各级党部，应该有计划地每月规定支部大会及小组会讨论的材料，并规定会期，严密地督促开会。

三　怎样使党员到会有兴趣

（一）党员到会少兴趣的原因：

1. 不明白会议的意义。支部会议的重要意义，第一是解决问题。一切斗争的问题、内部的问题，都要在会议上集中讨论去解决它。若不到会或到会不积极发表意见，就是他不了解会议的政治意

义，就是他对斗争没有兴趣，凡是对斗争积极的人，他一定是热心到会、热心发言的。第二是教育同志。会议不仅解决了问题，而且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要考察问题的环境，要参考上级的指示，这样就发动了同志们的心思才力。因会议的政治化与实际化，同志们每个的头脑也都政治化、实际化了。每个同志都政治化、实际化，党的战斗力就强大起来了。这就是会议的教育意义。红军党员因为不明白这些意义，所以成为不爱到会或到会少兴趣的第一个原因。

2. 决议案决议了不执行，或对上级请求事项很久得不到答复，因此减少讨论的兴趣。

3. 负责人事前没有很好地准备。不准备议事日程，对问题的内容及环境不明了，问题应怎样解决也没有准备一点意见。

4. 主席轻易停止党员发言，发言偶出题外，便马上禁止他，他便挫兴不做声了。如发言有错处，除停止外还讥笑他。

5. 封建式的会场秩序，死板无活气，到会如坐狱。

（二）纠正的方法：

第一，会议要政治化、实际化。

第二，要把会议的重大意义时常对同志们提醒，尤其是新党员及工作不积极的党员。

第三，决议不要轻易，一成决议，就要坚决执行。

第四，上级机关要勤快答复下级机关的问题，不要拖延太长，失了热气。

第五，负责人事先要准备议事日程，议事日程要具体化；对问题的内容和环境先要调查清楚，并对于怎样解决先要想一想。

第六，主席指导会议要采用很好的技术，要引导群众的讨论潮

流奔赴到某一问题；但有重要意义的超出题外的发展，不但不要大煞风景地去喝止他，而且要珍重地捉住这一发展的要点，介绍给大众，成立新的议题。这样会议才有生趣，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同时会议也才真正实现了教育的意义。

第七，废止封建的会场秩序。共产党的会场要反映无产阶级之积极活泼的爽快的精神，把这些做成秩序。

四　红军党内青年组织及其工作

（一）军队中青年利益与成年利益不能划分，团没有特殊的工作对象。又党的小组以班为单位建设方才有利斗争。因此党的支部里头无设立团的小组的必要。

（二）党员中青年部分因其有比成年不同的情绪，除一般地接受党的训练外，还有特别受一种青年教育之必要。又因争取青年工农群众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须有专门组织去担任这种工作。因此，应在支部中划出年在二十岁以下的青年党员（有特别情形如担任党的重要工作的除外），成立青年工作会议。这种会议，除以大队[1]为单位经常有计划地召集开会外，支队及纵队亦各应酌定时间，召集开会。

（三）为计划对青年党员的教育，计划争取青年工农群众的方法，并指导青年工作会议，前委及纵委[2]里头各设立五人之青年工作委员会，支队委及支委则各设一个青年委员，在各级党部的指导

[1] 大队，当时相当于连。

[2] 即中共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和各纵队委员会。

之下从事工作。

五　政治委员与党内工作关系

大队支队两级党部的书记，以不兼政治委员为原则，但在工作人缺乏的部队，仍可暂时兼充，没有担任党的书记责任的政治委员，上级党部应察看情形，在条件适合的环境之下得委为党的特派员，有指导该级党部的工作的任务。

六　直属队最高党部问题

军及各纵队的直属队，均组织直属队委为最高党部，委员人数五人至七人。

七　士兵会党团[1]问题

大队士兵会不设党团，工作由支委[2]指导。纵队士兵会要设党团，此党团受纵委指导。

---

[1]　党团，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规定："在非党组织（如职工会、农会、社会团体及文化组织等）之各种代表大会和会议上及机关中，凡有党员三人以上者均成立党团。其任务在于非党的组织中，加强党的影响，实行党的政策，并监督党员在非党组织中之工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将"党团"改称"党组"。

[2]　支委，指红军中的中共支队委员会。

党内教育问题

一　意义

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大会规定用下列的材料和方法去教育党员，党的指导机关，要有更详细的讨论，去执行这一任务。

二　材料

（一）政治分析；

（二）上级指导机关的通告的讨论；

（三）组织常识；

（四）红军党内八个错误思想[1]的纠正；

（五）反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问题的讨论；

（六）群众工作的策略和技术；

（七）游击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

---

[1]　指本篇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指出的关于单纯军事观点等8种错误思想。

（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

（九）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

（十）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问题。

以上十项除一部分（如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事实上限于适用于干部分子外，其余都适用于一般党员。

三　方法

（一）党报；

（二）政治简报；

（三）编辑各种教育同志的小册子；

（四）训练班；

（五）有组织地分配看书；

（六）对不认字党员读书报；

（七）个别谈话；

（八）批评；

（九）小组会；

（十）支部大会；

（十一）支部委、组联席会；

（十二）纵队为单位组长以上活动分子会议；

（十三）全军支书以上活动分子大会；

（十四）纵队为单位党员大会；

（十五）纵队为单位各级书、宣、组联席会议；

（十六）全军支队以上书、宣、组联席会议；

（十七）政治讨论会；

（十八）适当地分配党员参加实际工作。

红军宣传工作问题

一　红军宣传工作的意义

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

二　红军宣传工作的现状

（一）宣传内容的缺点：

1. 没有发布具体的政纲（从前发布的政纲如四言布告等均不具体）；

2. 忽略群众日常斗争的宣传与鼓动；

3. 忽略城市贫民之取得；

4. 忽略对妇女群众的宣传；

5. 对青年群众的宣传不充分；

6. 对流氓无产阶级的宣传不充分；

7. 极少破坏地主阶级武装组织（民团、靖卫团[1]等）的宣传；

[1] 民团、靖卫团，都是反动的地方武装。

8. 宣传没有时间性、地方性。

（二）宣传技术的缺点：

1. 宣传队不健全。

（1）宣传员由每大队五个缩小到三个，有些只有一两个，有些只有一个，有少数部队连一个都没有了。

（2）宣传员成分太差，俘虏兵也有，火夫、马夫也有，吃鸦片的也有，有逃跑嫌疑便把他解除武装塞进宣传队去的也有，当司书[1]当不成器便送入宣传队去的也有，因残废了别的工作机关不要塞进宣传队去的也有，现在的宣传队简直成了收容所，完全不能执行它的任务了。

（3）差不多官兵一致地排斥宣传队（同时也是因为宣传员成分太差，工作成绩少，引起一般的人对它的不满），“闲杂人”“卖假膏药的”就是一般人送给宣传员们的称号。

（4）宣传队没有够用的宣传费。

（5）对宣传员的训练没有计划，同时对他们工作的督促也不好，因此宣传队的工作简直随随便便，做一点不做一点都没有人理它。

2. 传单、布告、宣言等陈旧不新鲜，同时散发和邮寄都不得法。

3. 壁报出得很少，政治简报内容太简略，又出得少，字又太小看不清。

4. 革命歌谣简直没有。

5. 画报只出了几张。

---

[1] 司书，即连队中担任文字书写的人员。

6. 化装宣传完全没有。

7. 含有士兵娱乐和接近工农群众两个意义的俱乐部没有办起来。

8. 口头宣传又少又糟。

9. 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现在的纪律比以前松懈了，因此给了群众以不好的影响。

10. 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这些都是红军宣传工作的一种，现在也做得不充分。

11. 群众大会很少开，又开得不好。

12. 对白军士兵的宣传方法不好。

三　纠正的路线

（一）宣传的内容方面：

1. 发布一个具体的政纲，名曰红军政纲。

2. 宣传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除一般地发布暴动口号外，还要有适合群众斗争情绪尚低地方的日常生活的口号，以发动日常斗争，去联系着那些暴动口号。

3. 城市贫民（中小商人与学生）是民权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相当的力量，忽视了这个力量之争取，就无异把这个力量送给豪绅资产阶级。以后对城市中小商人及学生群众，要有深入的宣传工作去取得他们。

4. 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以后对妇女要有切实的口号，作普遍的宣传。

5. 劳苦青年群众占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在斗争中他们又是最勇敢最坚决的。因此对取得青年群众的宣传，是整个宣传任务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6. 中国广大的游民群众若站在革命阶级方面，就成了革命的工具，若站在反动阶级方面，就成了反革命的工具，因此从反动阶级影响之下夺取游民群众，是党的宣传任务之一。执行宣传工作时，须注意各部分的游民生活和性质之不同，分别地对他们宣传。

7. 地主阶级武装组织之破坏及其群众之争取，是农村中土地革命胜利条件之一，以后关于对民团、靖卫团等团丁群众的宣传工作特别要注意。

8. 到一个地方要有适合那个地方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又有依照不同的时间（如秋收与年关，蒋桂战争[1]时期与汪蒋战争[2]时期），制出不同的宣传和鼓动口号。

（二）宣传的技术方面：

1. 宣传队问题

（1）意义

红军的宣传队是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宣传队若不弄好，红军的宣传任务就荒废了一个大的部分，因此关于宣传队的整理训练问题，是目前党要加紧努力的工作之一。这个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从理论纠正官兵中一般对宣传工作及宣传队轻视的观点，“闲杂人”“卖假膏药的”等等奇怪的称呼，应该从此取消掉。

---

[1] 蒋桂战争，指1929年三四月间蒋介石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

[2] 指1927年10月宁（南京）汉（武汉）对立期间，国民党新军阀何应钦、李宗仁同唐生智之间的战争。

（2）组织

甲、以支队为单位，军及纵队直属队均各成一单位，每单位组织一个中队，队长队副各一人，宣传员十六人，挑夫一人（挑宣传品），公差二人。每个中队的宣传员分为若干分队（按照大队或其他部队与机关的数目，定出分队的多少），每个分队有分队长一人，宣传员三人。

乙、各支队宣传队，受支队政治委员指挥。各大队分开游击时，每大队应派去一个宣传分队随同工作，受大队政治委员指挥。直属队宣传队，受政治部宣传科长指挥。全纵队各宣传队受纵队政治部宣传科指挥。全军宣传队受军政治部宣传科指挥。

丙、宣传队的用费，由政治部发给，须使之够用。

丁、改造宣传员成分的方法，除请地方政府选派进步分子参加红军的宣传队之外，从各部队士兵中挑选优秀分子（尽可能不调班长）为宣传员。政治部应经常地做出训练宣传队的计划，规定训练的材料、方法、时间、教授人等，积极地改进宣传员的质量。

2. 传单、布告、宣言等宣传文件，旧的应加以审查，新的应从速起草。宣传品分布的适当有效，应是宣传队技术问题的重要一项。邮寄宣传品，从邮件中夹带宣传品，或在邮件上印上宣传鼓动口号，政治工作机关应该注意去做，且要做得好。

3. 壁报为对群众宣传的重要方法之一。军及纵队各为一单位办一壁报，由政治部宣传科负责，名字均叫作《时事简报》。内容是：（1）国际、国内政治消息；（2）游击地区群众斗争情形；（3）红军工作情形。每星期至少出一张，一概用大张纸写，不用油印。每次尽量多写几张。政治简报的编印，应注意下列各项：（1）要快；（2）内容要丰富一点；（3）字要稍大点，要清楚点。

4. 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督促及调查之责。

5. 军政治部宣传科的艺术股，应该充实起来，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画报。为了充实军艺股，应该把全军绘画人才集中工作。

6. 化装宣传是一种最具体、最有效的宣传方法，各支队各直属队的宣传队均设化装宣传股，组织并指挥对群众的化装宣传。

7. 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会内建设俱乐部。

8. 宣传队中设口头宣传股及文字宣传股，研究并指挥口头及文字的宣传技术。

9. 严格地执行三条纪律[1]。

10. 上门板、捆禾草等项是从行动中扩大红军影响、增加群众对红军信仰的良好方法，应当好好地去执行。

11. 政治部及宣传队要有计划地、有组织地召集各种群众大会，要预先规定开会秩序、演说人、演说题目及时间。

12. 对白军士兵及下级官长的宣传非常之重要，以后要注意下列的方法：

（1）宣传文字要简短，使他们顷刻间能看完，要精警，使他们一看起一个印象。

（2）除有计划地在敌人经过道路两旁多写切合某现实部队的标语之外，还要将传单存储于沿路党部及群众机关手中，候敌军经过时，巧妙地传达给他们。

（3）从俘虏官兵中及邮件检查中调查敌方官兵的姓名及所属部队番号，邮寄宣传品去，或写信给他们。

---

[1] 当时红军三大纪律的内容是：一、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二、打土豪归公；三、一切行动听指挥。

（4）优待敌方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优待俘虏兵的方法：第一是不搜检他们身上的钱和一切物件，过去红军士兵搜检俘虏兵财物的行为要坚决地废掉。第二是要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俘虏兵，使他们感觉得精神上的欢乐，反对给俘虏兵以任何言语上的或行动上的侮辱。第三是给俘虏兵以和老兵一样的物质上的平等待遇。第四是不愿留的，在经过宣传之后，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去，使他们在白军中散布红军的影响，反对只贪兵多把不愿留的分子勉强地留下来。以上各项，对于俘虏过来的官长，除特殊情况外完全适用。

（5）医治敌方伤兵，亦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对于敌方伤兵的医治和发钱要完全和红军的伤兵一样，并且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把上好了药发给了钱的伤兵送返敌军。对待敌方受伤官长亦然。

士兵政治训练问题

一　材料问题

下列各项应很艺术地编制课本，做对士兵的训练材料：

（一）目前政治分析及红军之任务与计划；

（二）土地革命各方面；

（三）武装组织及其战术；

（四）三条纪律建设的理由；

（五）早晚点名口号；

（六）识字运动；

（七）怎样做群众工作；

（八）红军标语之逐个解释；

（九）各种偏向之纠正；

（十）苏俄红军；

（十一）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

（十二）红军白军比较；

（十三）共产党国民党比较；

（十四）革命故事；

（十五）社会进化故事；

（十六）卫生；

（十七）游击区域的地理及政治经济常识；

（十八）革命歌；

（十九）图报。

二　方法

（一）上政治课：

1. 分普通、特别、干部三班。普通班分两种形式，一个支队在一起时，以支队为单位上课，教授以支队政治委员为主任，大队政治委员分担各课，除战斗兵须到课外，传令兵、勤务兵、长夫、马夫、火夫须均到课。普通班之目的在使一般兵士得到初步政治常识。

2. 特别班以支队为单位，从各大队士兵中考选稍识文字及略有政治常识者五十名编成，支队政治委员为主任教授，大队政治委员分担各课。特别班之目的在造成较普通班高一级的政治常识人才，以备将来升当下级干部之用。

3. 干部班以纵队为单位，军直属队另成一单位，以大队长、大

队副，中队长、中队副，各级军佐[1]及其他指定人员编成。目的在提高现任下级干部的政治水平线，使能领导群众，以预备将来能充当中级干部。由纵队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纵队司令官及其他有适当能力的人担任教授。

4. 以支队为单位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以支队各政治委员并军事长官中能任政治训练者组织之，以支队政治委员为主任，其任务为讨论在一个支队内关于执行士兵政治训练的种种问题。

5. 军及各纵队直属部队的政治训练，由军及各纵队政治部宣传科负责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执行之。

6. 教授法：

（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

（2）由近及远；

（3）由浅入深；

（4）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

（5）说话要明白；

（6）说话要有趣味；

（7）以姿势助说话；

（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

（9）要提纲；

（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

（二）早晚点名说话：

1. 说话时间每次最多不得过半小时。

2. 材料：

---

[1] 军佐，是旧军队中对辅助指挥员管理行政事务的人员的统称，如军需、军医等。这里毛泽东是沿用旧军队中的这种称呼。

（1）报告政治消息；

（2）批评日常生活；

（3）解释每周政治口号。

（三）集合讲话：

1. 支队每星期一次，纵队每半月一次，全军不定期。

2. 每次讲话须要有计划地由政治工作机关（支队由政治委员）商同军事工作机关规定讲话内容，指定讲话人，并分配讲话时间。

3. 每次讲话除任勤务的以外不准不到。

4. 每次讲话内容及对于群众的影响，下级政治机关须报告上级政治机关。

（四）个别谈话：

1. 对下列各种人须和他作个别谈话：

（1）有偏向的；

（2）受了处罚的；

（3）伤兵；

（4）病兵；

（5）新兵；

（6）俘虏兵；

（7）对工作不安的；

（8）思想动摇的。

2. 谈话前须调查谈话对象的心理及环境。

3. 谈话时须站在同志的地位，用诚恳的态度和他说话。

4. 谈话后须记录谈话的要点及其影响。

（五）游艺：

1. 以大队为单位充实士兵会娱乐部的工作，做下列各种游艺：

（1）捉迷藏等；

（2）踢足球；

（3）音乐；

（4）武术；

（5）花鼓调；

（6）旧剧。

2. 于每个宣传队下设化装宣传团。

3. 游艺设备费由公家支给（大队由纵队政治部批准）。

（六）改良待遇：

1. 坚决废止肉刑；

2. 废止辱骂；

3. 优待伤病兵；

4. 恢复每月发草鞋钱大洋四角的制度。

（七）怎样做新兵及俘虏兵的特别教育：

1. 把红军的生活习惯，如（1）官兵生活平等（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2）三大纪律及其理由，（3）士兵会的意义和作用，（4）红军中的经济制度（经济的来源、管理经济的组织、经济公开主义及士兵审查制度），（5）经济委员会管理大队伙食和分伙食尾数，（6）废止肉刑辱骂，（7）优待俘虏事项，讲给新兵们、俘虏们听。

2. 讲述红军斗争略史。

3. 红军的宗旨：

（1）红军与白军所以不同，此点对俘虏兵要详细讲；

（2）红军与土匪所以不同；

（3）红军三大任务。

4. 讲述红军组织系统。

5. 普通政治常识，如：（1）国民党与共产党；（2）英日美三大帝国主义侵略中国；（3）各派军阀受帝国主义指挥到处混战；（4）分田；（5）苏维埃；（6）赤卫队等。

（八）青年士兵的特别教育：

1. 各纵队政治部负责编制青年士兵识字课本（以商务馆小学教材、平民千字课、龙岩文化社教本等作参考）。

2. 每个纵队内设立青年士兵学校一所，分为三班至四班，每个支队一班，直属队一班，每班学生不得超过二十五人。以政治部主任为校长，以宣传科长为教务主任。每班设一主任教员，每班以授足九十小时为一学期。

3. 由公家出钱置备纸笔墨等用具发给学生。

废止肉刑问题

一　红军中用肉刑的效果

各部队中凡打人最厉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最显著的例子，如三纵队第八支队部某官长爱打人，结果不仅传令兵、火夫差不多跑完了，军需、上士及副官都跑了。九支队第二十五大队曾经有一时期来了一个最喜打人的大队长，群众送给他的名字叫作铁匠，结果士兵感觉没有出路，充满了怨恨空气，这个大队长调走了，士兵才得到解放。特务支队第三大队打人的结果，跑了四个火夫，一个特务长，两个斗争好久的班长，其中一个名萧文成，临走留下一封信，申明他不是反革命，因受不起压迫才逃跑。四纵队初

成立时，一、二、三纵队调去的官长，一味地蛮打士兵，结果士兵纷纷逃跑，最后这班官长自己也立不住脚，都不得不离开四纵队。二纵队逃兵比任何纵队多，原因虽不止一个，然二纵队下级官长的大多数打人的习惯最厉害，乃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二纵队曾发现过三次自杀事件（排长一士兵二），这是红军最大的污点，意义是非常之严重的，这也不能不说是二纵队打人的风气特别浓厚的一种结果。现在红军中一般士兵的呼声是“官长不打士兵，打得要死!”这种群众的不平和怨愤的表露，实在值得我们严重地注意。

二　肉刑的来源和废止它的理由

封建阶级为了维持它的封建的剥削，不得不用最残酷的刑罚做工具，以镇压被剥削者的反抗和叛乱，这是肉刑所以为封建时代的产物的理由。经济的发展进步到资本主义制度，它便需要提出自由主义，以发展工农士兵群众的个性，增强他们的劳动能力和打仗能力，以造成资本主义发展之条件。因此，凡资产阶级的国家，一般地废止肉刑，在军队中亦早就没有什么打人的怪事了。至于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的诞生，阶级斗争的激进，工农阶级要推翻统治阶级的权力和依于这个权力的剥削，便要发动自己阶级的广大群众的力量，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苏维埃政权，是最进步阶级的政权，它的下面，不应有一切封建制度的残余存在，因此苏联不但红军中老早就没有肉刑，在一般法律上亦通通严禁肉刑的使用。红军第四军产生于封建剥削制度尚未肃清的中国，它的主要成分，又多是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转变过来的，一般封建的制度、思想和习惯，仍然很浓厚地存在于一般官长士兵之中，由是打人的习惯和非打不怕的

习惯，还是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的习惯一样。虽然老早就提出了官长不打士兵的口号和规定士兵会有申诉他们的苦痛的权利，但简直没有什么效力，其结果造成官兵间的悬隔，低落了士兵以至官长的情绪，逃跑的数目日多，军中充满了怨恨的空气，甚至发现自杀事件，这是与红军的斗争任务完全背驰的现象，如不赶快纠正，危险不可胜言。

三　纠正的方法

（一）坚决地废止肉刑。

（二）举行废止肉刑运动。这个运动，要从官兵两方面工作，使“废止肉刑，方才利于斗争”的意义普及于官兵群众之中。这样才能使官长方面不但不至因废止肉刑觉得兵带不住了，而且了解废止肉刑之后将要更利于管理与训练；士兵方面不但不至因废止肉刑更顽皮了，而且因废止肉刑增加了斗争的情绪，撤去了官兵的隔阂，将要自觉地接受管理训练和一般的纪律。

（三）肉刑废止之后，因为历史的习惯的原因，发生一些临时不良现象是会有的，这应该加紧我们的责任，努力于说服精神和自觉遵守纪律精神的提倡，去克服这个违反斗争任务的最恶劣的封建制度。决不能借口有些不良现象，便掩护了他的封建制度打人习惯。凡那些借口临时不良现象，反对废止肉刑或对废止肉刑怠工的，客观上便是妨碍革命斗争的发展，也就是帮助了统治阶级。

（四）四军废止肉刑的法律程序：

1. 修改红军惩罚条例；

2. 由最高军政机关会衔发布废止肉刑的通令，并颁布新的红军

惩罚条例；

3. 通令发布后，一方面由军政机关召集官长会议，详细说明废止肉刑的理由，使全体官长拥护这个通令的重大改革，良好地努力地在部队中执行起来；一方面由士兵会召集士兵代表会议，除拥护这个改革以后要自觉地遵守纪律外，并要森严群众的纪律制裁，以达到肉刑废止后的良好的收获。

优待伤病兵问题

一　伤病兵痛苦的现象及影响

（一）全军各部队卫生机关不健全，医官少，药少，担架设备不充分，办事人少与不健全，以致有许多伤病兵不但得不到充分治疗，即大概的初步治疗有时都得不到。

（二）全军军事政治机关对伤病兵的注意不充分，如：

1. 对于卫生机关的健全，不但没有尽得最大的努力，而且简直不加注意。各种会议对卫生问题讨论很少。

2. 官长对于伤病兵没有尽其可能去随时安慰他们，如官长替伤病兵送茶水、盖被窝、随时慰问等习惯，在红军中简直没有。官长对伤病兵，采一种不理问态度，甚至表示讨嫌他们的态度。

3. 行军时官长以至士兵对在沿途落伍的伤兵完全不表示一点同情，不但不为他们想法子，反而一味地怒骂，或无情地驱逐他们。

（三）重伤重病兵给养和用费不够，伤兵伤后，七八天还没有衣服换，调养费病官有，病兵没有。

（四）蛟洋医院的缺点：

1. 无组织状态；

2. 医官和药太少；

3. 医官卖私药；

4. 不清洁；

5. 御寒衣服、被窝不够；

6. 看护兵太少；

7. 饮食恶劣；

8. 房子窄；

9. 与当地群众关系不良，以致伤病兵看医院如牢狱，不愿留在后方。

上列各种对伤病兵待遇不良，便发生下列的影响：

1. 使士兵不满意红军，“红军好是好，就只不要带花，不要病”，这种舆论简直普遍全体士兵以至下级官长之中；

2. 士兵对官长不满意，越发增加官兵间悬隔；

3. 士兵及下级官长都怕带花，因此，减少红军战斗力；

4. 逃兵多；

5. 影响工农群众，减少他们加入红军的勇气。

二　解决的办法

（一）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像从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问题。

（二）卫生机关的组织应特别使之健全，办事人要找有能力的，不要把别地方用不着的人塞进卫生队去，并要增加办事人达到照料完备之目的。医生少和药少的问题，要尽可能设法解决。对于医生

应注意督促他们看病详细一点，不要马马虎虎。

（三）官长，特别是和士兵接近的连上官长，应当随时看视伤病兵，送茶水给他们吃，晚上替他们盖被窝，他们觉得冷，要替他们想办法，如向别人借，增加衣服。以上这些招呼伤病兵的方法，要定为一种制度，大家实行起来，因为这是最能取得群众的方法。

（四）对行军时沿途落伍的伤病兵：

1. 禁止任何人对他们的怒骂或讥笑；

2. 要伤病兵让路的时候，要好好对他说，不要一把推开他；

3. 无论哪一个部队或机关，凡有因病因伤落伍下来的，不论是战斗兵非战斗兵，均要立即派一个人去招呼他，如系重伤重病，并要尽量设法雇夫抬来；

4. 每次行军，后卫要耐烦带上落伍的伤病兵，必要时还要替他们背回枪弹。

（五）发给伤病兵零用钱，要酌量伤病的轻重，重伤重病的要比轻伤轻病的多给一点。调养费一项，对于特别重伤重病的，应该不分官兵夫酌量发给。

（六）伤病兵衣服、被窝问题，除公家尽力置备外，应该在各部队官兵中发起募捐，此外还应该在各部队官兵中发起募款，这不仅为了增加伤病兵的零用钱，而且是唤起全军互助济难精神的好方法。

（七）蛟洋后方医院许多缺点，应该有计划去纠正。此外还应该在闽西工农群众中发起募捐（衣被、现款、粮食），以密切联系工农群众与红军。

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

一、在高级地方政权机关没有建设以前，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

二、红军与群众的关系：

（一）凡有全军意义的事项，如发布政纲等，军事政治两机关会衔发布。

（二）群众工作，如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设政权以及没收、审判、处罚、募捐、筹款、济难等事之指挥监督，在地方政权机关没有建设以前，均属政治部职权。

（三）凡没有建立政权机关的地方，红军政治部即代替地方政权机关，至地方政权机关建设时为止。凡地方政权机关已经建设的地方，应以使地方政权机关独立处理一切事情，在群众中巩固其信仰为原则。只有在地方政权机关还不健全，及红军与地方有关系的事项，得用地方政权机关和红军政治部会衔的方法处理之。

（四）帮助地方武装之建立与发展，这个责任是政治部的。帮助地方武装之平时的军事训练及战时的作战指挥，这个责任是司令部的。但均须尽可能地经过地方政权机关的路线，极力避免直接处理。

三、红军里面用人、行政，军事政治两个系统各有独立的路线。彼此有关系时，如人员等之互相调动，消息之互相传达等，则用公函平行通报。

四、礼节及军风纪之执行，军事政治两个系统相互间均应用阶级[1]服从原则，不得借口系统不同，有所怠慢或不服指挥。

五、凡给养、卫生、行军、作战、宿营等项，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之指挥。凡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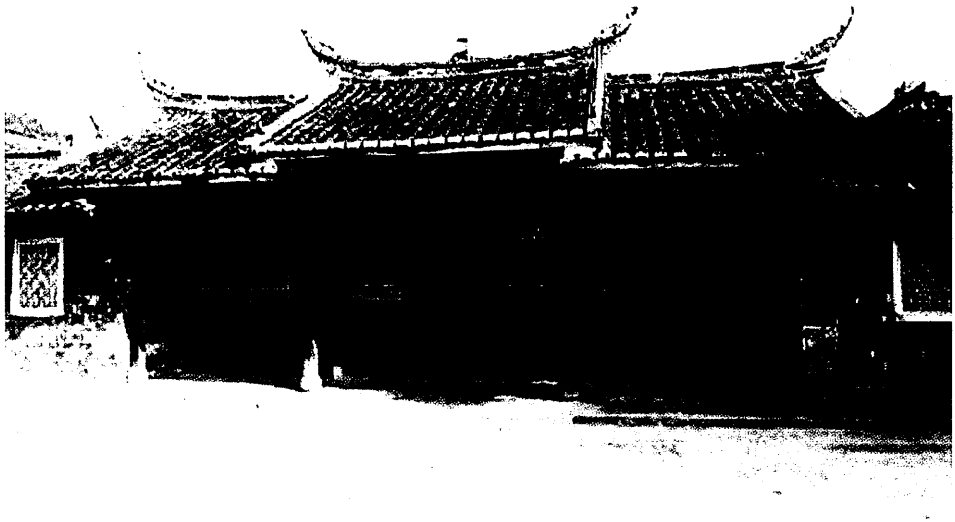
---

[1] 这里的“阶级”，指军队中官阶的等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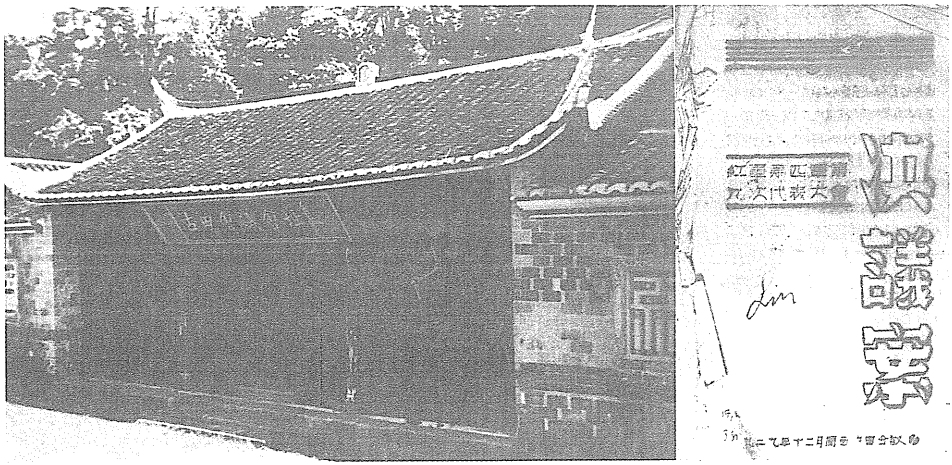
治系统之指挥。但指挥的形式，只能直达对方机关里头的从属机关（总务科或副官处等）。

六、凡红军筹款的指挥及政治工作用费之决定与支出，均属于政治部，军事机关不得干涉（取款的手续，政治部直接军需处），党部用费由政治部支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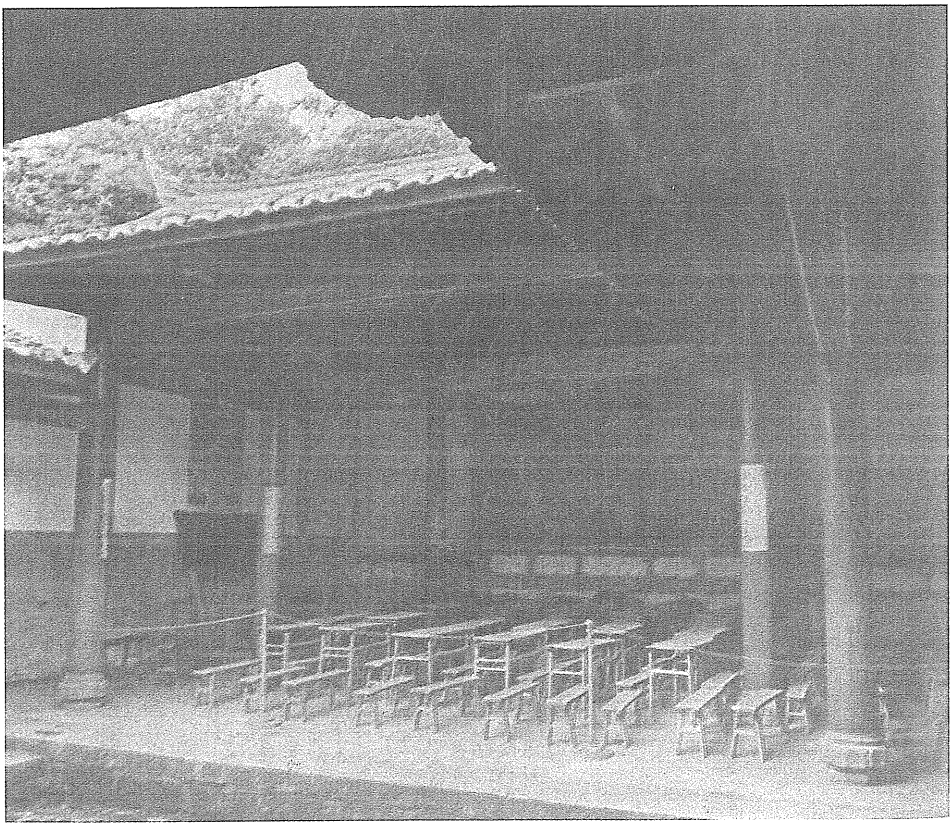
七、军事机关的一切命令，除政治委员须副署外，政治部主任无须署名。政治机关的一切命令，政治部单独行使，政治委员无须副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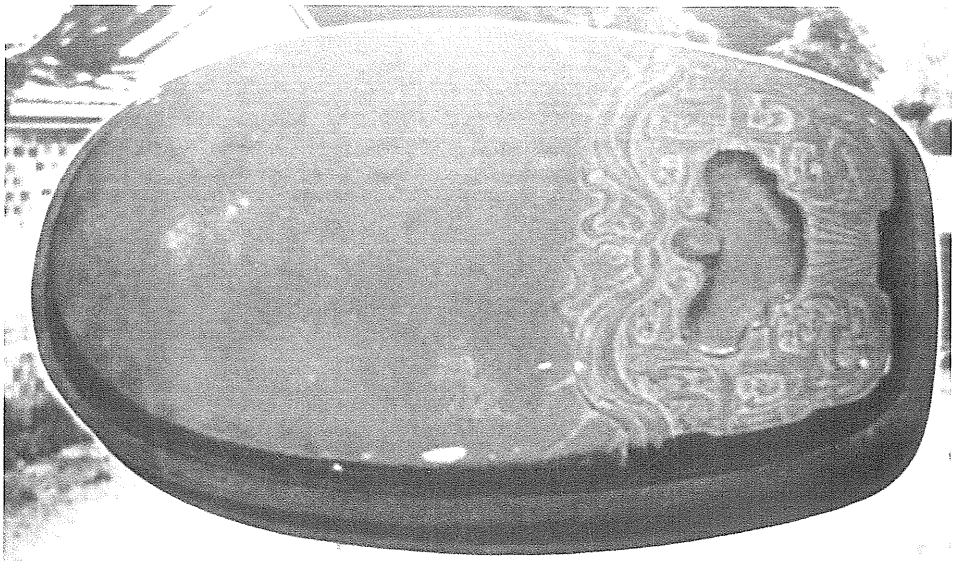
红四军前委、政治部旧址——松荫堂，前委书记毛泽东在此起草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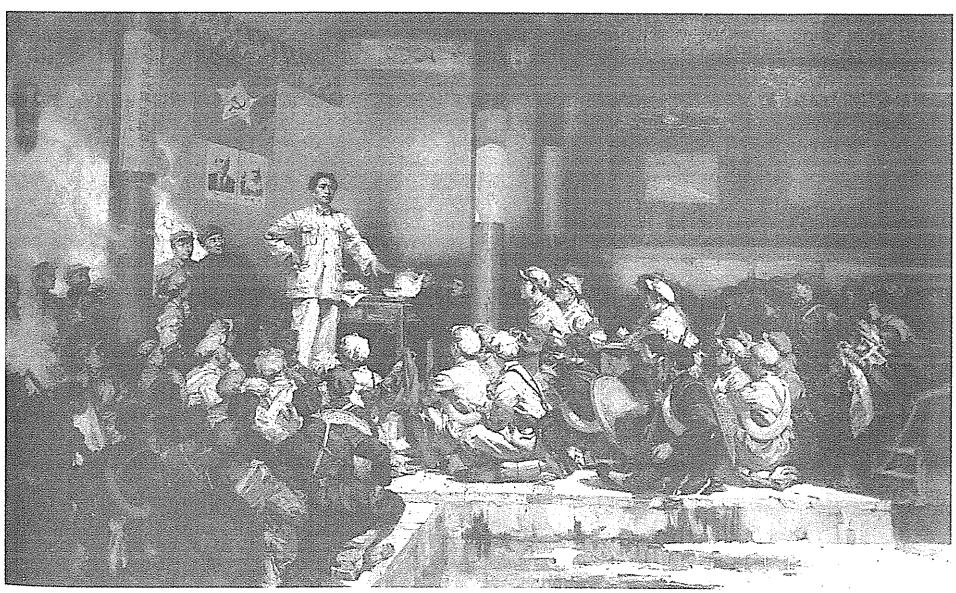
古田会议旧址和红军时期印行的古田会议决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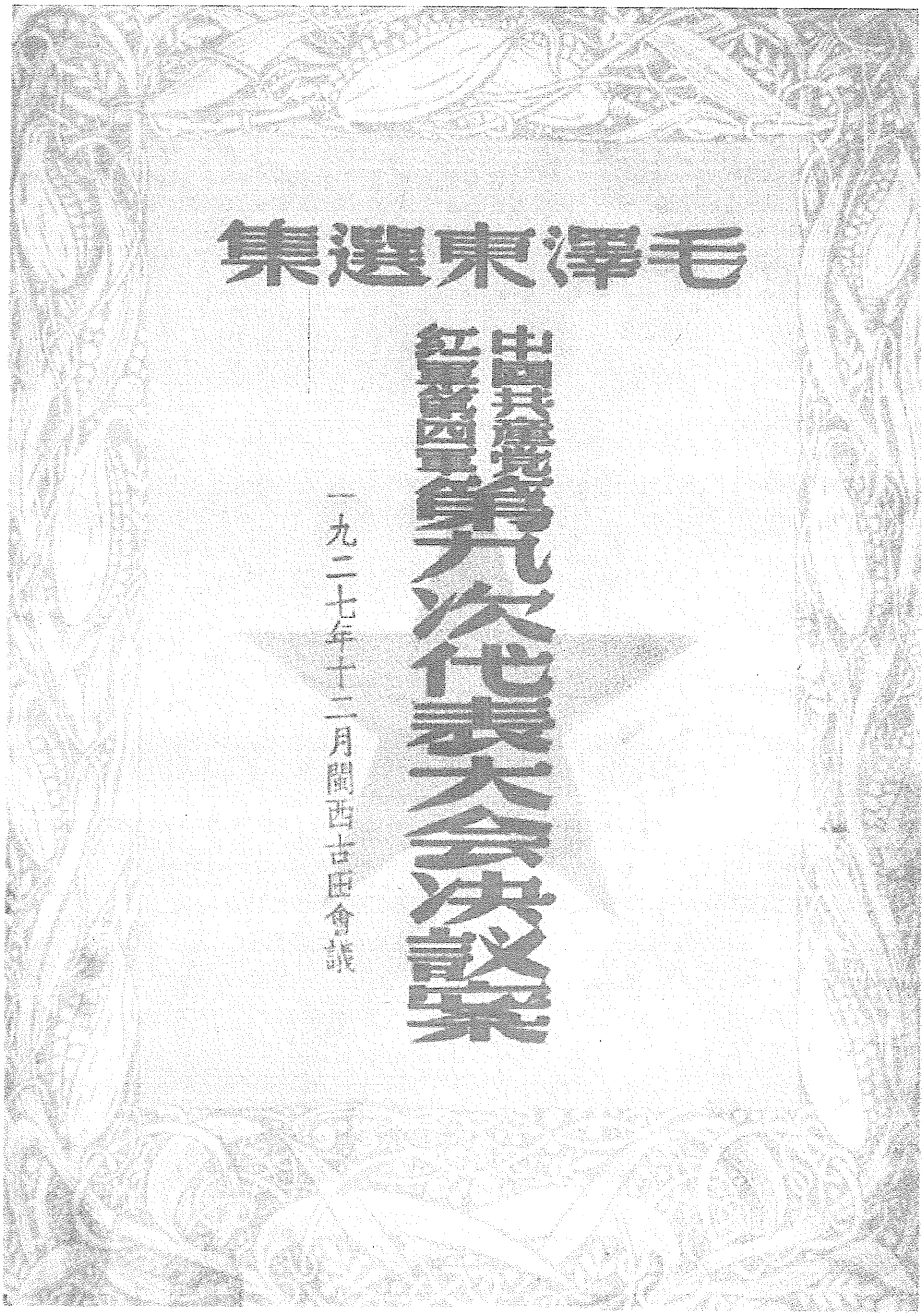
古田会议会场内景。



毛泽东在古田时使用的砚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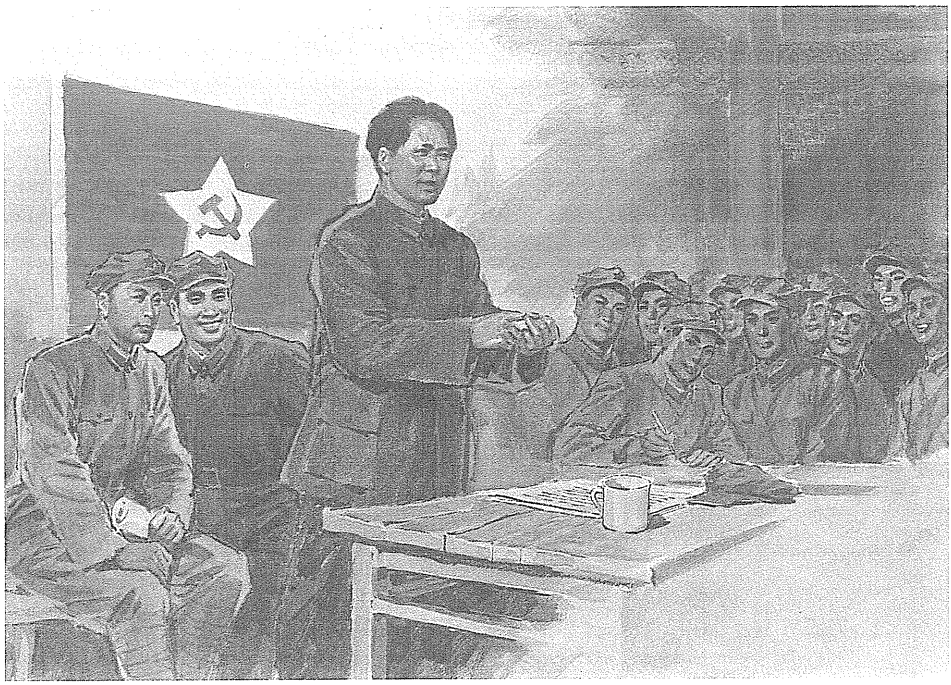


《古田会议》（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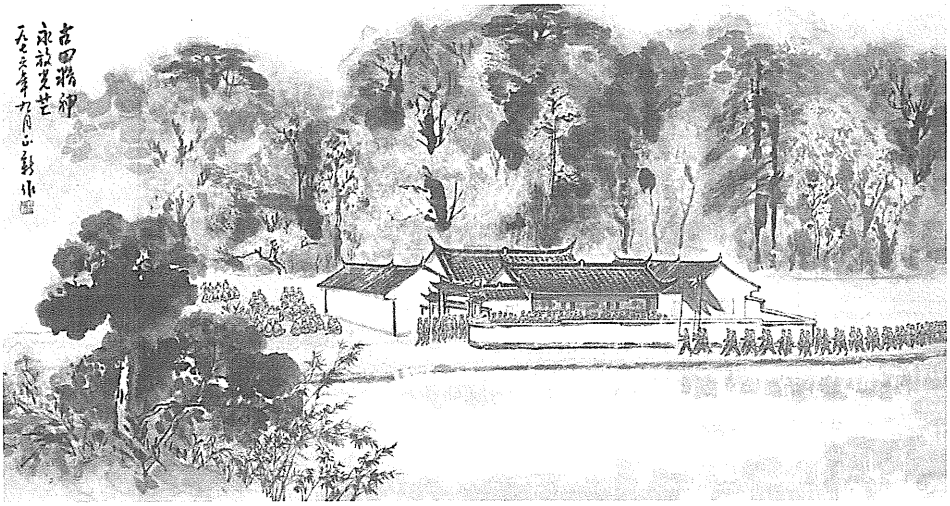


1948年1月，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毛泽东在连队中建党》（油画）



毛泽东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油画）



《古田精神》（中国画）

《人民军队党指挥》（油画）

《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油画）